



共同谱写文博事业科学发展新篇章

日前,《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正式发布实施。《规划》是根据国家“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系统回顾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一五”历程和经验、科学展望发展远景的基础上制定的。《规划》汇集了全国文物系统和中央、地方有关部门的共识,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未来五年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战略安排和行动纲领,必将为促进文化遗产事业科学发展,推动文化遗产强国建设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回首“十一五”,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全国文物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积极投身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为传承中华文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取得了显著成绩,基本实现了《国家文物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确定的主要任务,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法规体系,基本形成了适应我国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和类型特点的保护管理体制,在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事业发展道路上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展望“十二五”,文物博物馆事业前景更加广阔,任务更加艰巨。纵览世界,文化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文化遗产的价值作用被广泛认同。着眼国情,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入融合,文化遗产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遗产工作越来越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同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日益旺盛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制约和影响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依然突出。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既面临着重大战略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我们的使命光荣而神圣,我们的信心豪迈而坚定。

神州铸伟业,《规划》展宏图。“十二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为主线,以加强能力建设为支撑,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着力点,深入贯彻《文物保护法》和文物工作方针,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管理水平,为实现文化遗产事业新发展、新跨越,建设文化遗产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雄关漫道,创新可越。实现《规划》中的宏伟目标,落实《规划》中的各项任务,既需要坚强的组织领导,也需要扎实的基础工作;既需要科学鲜明的思路,也需要开拓创新的路径。要大力推进观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保护传承方式创新、科技创新、传播手段创新,促进文化遗产事业在参与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践中焕发活力,实现文物本体保护好、周边环境整治好、经济社会发展好、群众生活改善好,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

百舸争流千帆竞,风好正是扬帆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一致,开拓进取,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扎实的工作作风,奋力开创文化遗产工作新局面,为实现“十二五”目标,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摘自《中国文物报》2011年6月24日第一版时评)

特
载

目錄

CONTENTS

江 阴 文 博 俞伟超题

2011年第2期

·总第26期·

(内部刊物)

特载

共同谱写文博事业科学发展新篇章《中国文物报》时评

考古报告

青阳悟空村明墓发掘简报高振威 周利宁(02)

文物研究

文徵明“一诗三改”的行草诗轴武宝民 薛金花(05)

浅谈中国古代银铤林嘉华(08)

博物馆学

适应时代需求 提升服务品质孙 军(10)

博物馆文物外展工作刍议陈健智(12)

博物馆电器照明维修之浅见张焕兴(15)

历史研究

毛泽东播火江阴程以正(18)

注重考证提高《江阴市军事志》质量徐泉法(21)

《后汉书》有关江阴季子祠的记载徐 敏(28)

澄江人物

江阴近现代名人与无锡的简要关系朱昱鹏(32)

师生谊 战友情

——革命前辈管文蔚对钱振标烈士的缅怀沈俊鸿(38)

缪荃孙与《常州先哲遗书》刘徐昌(40)

拜谒吕斯百墓陶 泓(42)

陈继儒与江阴名士江 沙(45)

徐学研究

徐霞客李寄诗歌之比较研究翁雪花(47)

半农研究

中国文物保护先驱者——刘半农唐雷霞(52)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的江阴贡金城(55)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先生到江阴陆云湘(59)

文化遗产

江阴城南的老街旧景车导明(61)

花山与余城古城遗址唐汉章(66)

谱牒研究

江阴姓氏源流考略(八)吴氏刁文伟(69)

非遗拾珍

谈二胡在江阴的嬗变邵振良(73)

文博信息

第七批江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测绘(14)

江阴博物馆参加良渚论坛·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三届年会(44)

2011 中国徐霞客学术研讨会在江阴举行(60)

考古资讯(77)

2011 年文博大事记(79)

主办单位:

江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江阴市文广新局

江阴市文化艺术集团

江阴市博物馆

顾 问:倪颖伟 龚振东

黄 磊 王建炜

刘卫星

主 任:钱 晴 董录科

副 主 任:杜颖波 韩 锋

翁雪花

编 委:刁文伟 高振威

邬红梅 孙 军

武宝民 唐汉章

主 编:唐汉章

编:邬红梅

编 务:符 蕴

美 编:孙 军

《江阴文博》编辑部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 128 号

邮编:214431

电话:0510-86862683

电子邮箱:jymuseum@sina.com

印刷:无锡市海得印务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苏出准印 JSE-001654

出版日期:2011 年 12 月



青阳悟空村明墓发掘简报

高振威 周利宁

2011年3月与4月,江阴市青阳镇悟空村泗州大圣宝塔塔基遗址西南150米,村路修建时两次发现明代墓葬(图一),江阴市博物馆考古部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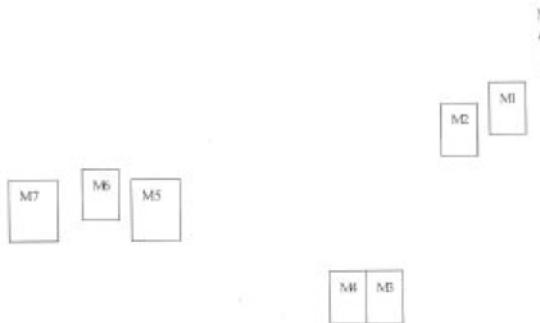


图一 墓葬位置图

一、墓葬形制

这两次发现的墓葬共7座,按照发现的顺序依次编号,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在东面,南

北向排列。M1为最北,M2在其西南1.9米,M3、M4并排,位于M2西南约10米。第二组位于第一组西约30米,东西向排列,从东到西依次为M5、M6、M7。(图二)



图二 墓葬相对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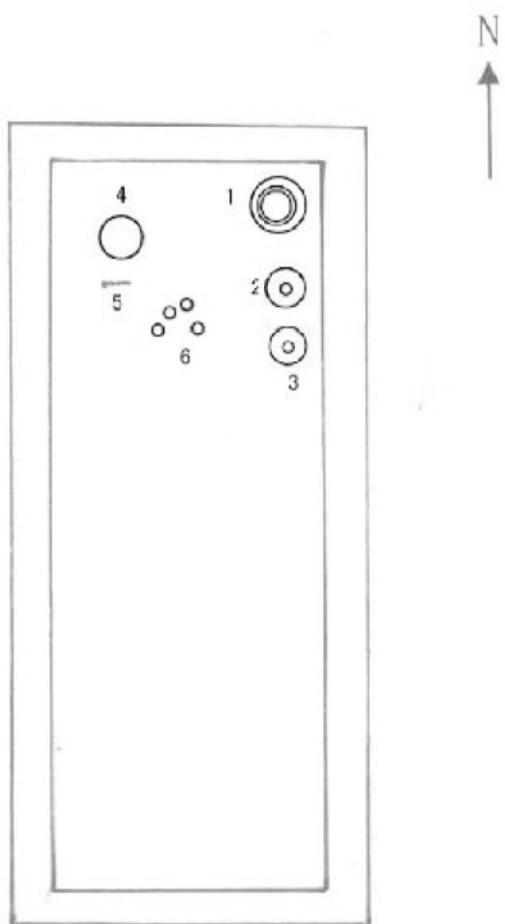
第一组墓葬M2、M3、M4保存完好,M1被盗。第二组墓葬都已被破坏。

M1 M1为土坑竖穴,外有石椁,椁盖已缺失。石椁每周由2块叠压的金山石拼合,南北向椁板1.8米,厚0.1米,东西向椁板宽0.75米,



厚0.15米，深0.8米。底部也用一块金山石铺底。填土松软，夹杂大量建筑垃圾。木棺已不存，椁内北部出土铜镜一面。

M2 M2形制与M1相同，椁盖为两块方形金山石，一块已经缺失，地表土侵入椁室，夹杂砖块和木块。南北向椁板长2.5米，厚0.15米，东西向椁板宽1.1米，厚0.1米，深0.9米。椁内贴近西椁板有一段长约0.8米的腐朽棺木残板，椁室东北角出土陶罐1件，西北角出土铜镜一面，铁簪1枚，椁室中部偏东北出土瓷碗2只，椁底淤泥中出土铜钱4枚。（图三）



图三 M2 平面图

1.陶罐(M2:1) 2、3 瓷碗(M2:2、3)
4.铜镜(M2:4) 5.铁簪(M2:5) 6.铜钱(M2:6)
M3、M4 M3、M4并排而建，石椁形制大小相同，长3米，宽2米，深0.9米。顶部各用两块边长1.5米、宽1米的金山石块覆盖。M4西侧椁板底部偏北有个长8厘米、宽5厘米的长方

形的窟窿^①。椁内棺木已经腐朽，底部有小半坑积水和淤泥。M4出土铜镜一面，M3无出土物。

M5、M6、M7 这三个墓并排而建，形制相同。土坑竖穴，从外到内依次是浇浆、石椁和木棺，M5、M7石椁盖已无存。M5墓圹长3.4米、宽2.1米。内有石椁长2.4米，宽0.83米。石椁内木棺已无存，外包裹浇浆。M6在M5西2.2米，墓圹长2.7米、宽2米。石椁内木棺已无存，外包裹浇浆。M7位于M6西1.6米，墓圹长3.7米、宽2.8米，内有石椁长2.6米，宽1.1米。石椁内木棺已无存，外包裹浇浆。这三个墓石椁内填土松软，无出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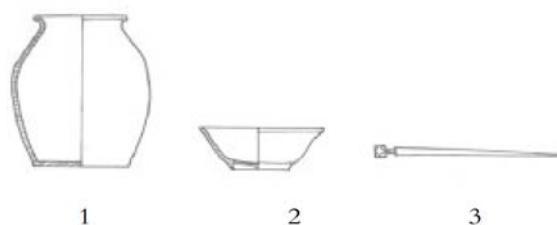
二、出土器物

这两组墓出土器物较少，类别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等，介绍如下。

(一)陶器 1件，编号为M2:1。夹砂陶，圆唇外翻，束颈，鼓腹，下腹斜收，平底。施酱色釉，不及底。口径8.4、底径9.4、最大径13、高14.6厘米。（图四：1）

(二)瓷器 2件。编号为M2:2和M2:3。形制大小相同。侈口方唇，斜腹，圈足内收，施白釉，底部有刮釉痕迹。圈足底部不施釉，中间有乳突，有明显的跳刀痕。口径12.4、底径5.5、高4、圈足高0.6厘米。（图四：2）

(三)铜器 有铜镜和铜钱两种。



图四 出土器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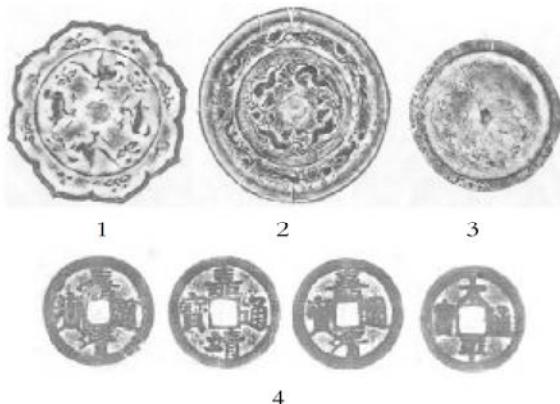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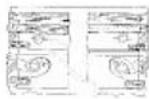
1.陶罐(M2:1) 2.瓷碗(M2:2) 3.铁簪 M2:5
(1、2为1/4, 3为1/1)

1.铜镜 3件。

M1:1 雀绕花枝镜，锈蚀较严重。此镜为八瓣菱花形镜，内区有圆钮，四鸟环钮一周，鸟之间配以花枝，外区花瓣内有蜂蝶花枝纹饰。直径11厘米，厚0.8厘米。（图五：1）

M2:4 神兽镜，圆形，边缘突起，略有残损。内区桥形钮，一周有四只神兽，奔驰状，神兽间有花枝。外区一周有六只奔驰的神兽，中间有花

考古报告



图五 出土器物(二)

1. 雀绕花枝镜(M1:1)
2. 神兽镜(M2:4)
3. 素面镜(M4:1)
4. 铜钱(M2:6)(1、2、3为2/5, 4为1/1)

枝。直径10.5厘米,厚0.8厘米。(图五:2)

M4:1 素面镜,圆形,锈蚀严重。桥形钮,缘宽0.7厘米,直径8.4厘米,厚0.4厘米。(图五:3)

2.铜钱 4枚,编号为M2:5。分别为明代隶书“嘉靖通宝”3枚(M2:5-1、2、3),宋代隶书“太平通宝”1枚(M2:5-4)。(图五:4)

(四)铁器 1件,编号为M2:5,为铁簪,有锈蚀,长9厘米。(图四:3)

三、结语

1954年与1976年,悟空村曾两次平整土地,破坏了第二组墓葬,出土物大都散佚,仅M5出土的25件金银饰品,连同一合墓志辗转被江阴市博物馆收藏^②,从墓志得知,墓主为夏谅^③之妻邹氏^④。由1976年参加平整土地的村民指认,M5即邹氏墓。M6在1954年被挖,出土有墓志,记载墓主为夏谅,现已佚。笔者到达现场在M7旁发现被盗出的一丛头发和一块盆骨,墓主为女性,推断为夏元贞生母李氏^⑤。

这两组明墓都是南北方向,从出土器物的

位置和以往发掘的明墓来看,头向应向北。笔者考察两组之间的地层,发现地层已经被破坏,地下近2米还可见到砖块。据村民所言,此地在是原先的村落所在地,地层在打地基的时候被破坏,两组墓之间是否还分布有墓葬已经无法得知。据村民反映,第二组墓上面原先是三个大坟冢,高出地面,第一组墓上堆土与地面持平,无踪迹可寻。虽然第一组墓没有发现墓志之类的材料可以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但这两组墓墓向相同、年代相近,且相距不过三十米,这两组墓有可能属于同一个墓群,即夏氏涤塘墓地。

(拓片:符蕴)

(作者:江阴博物馆考古部)

注释:

①江阴明代带石椁的合葬墓分隔木棺的石椁板底部一般有长方形或壸门形的窟窿,M4为特例,疑为下葬时 失误所致。

②唐汉章、翁雪花:《江阴长泾、青阳出土的明代金银饰》,《文物》2001年5期。

③夏谅(1485—1539),字元贞,号秋涯,江阴长泾夏氏十一世,夏顺(字良惠)之三子。由邑庠生例贡入太学,授福建建宁府瓯宁县主簿,致仕。

④邹氏(1484—1521),无锡泰伯乡邹智卿之女,敕封孺人,无子,以夏谅兄仲仁四子舆为养子。

⑤《习礼夏氏宗谱》卷三十:“(夏谅)葬涤塘本生母莹昭穴”。卷五十八《秋涯公配邹孺人行状》:“举柩厝于涤塘之新阡,从李夫人兆之昭次”。邹氏墓志铭记载“元贞先是葬李母于涤塘之原,令人(按明代礼制,为九品孺人,墓志铭称为令人,未知是失误或特意)今从之。”昭为左,与分布位置相符。



文徵明“一诗三改”的行草诗轴

武宝民 薛金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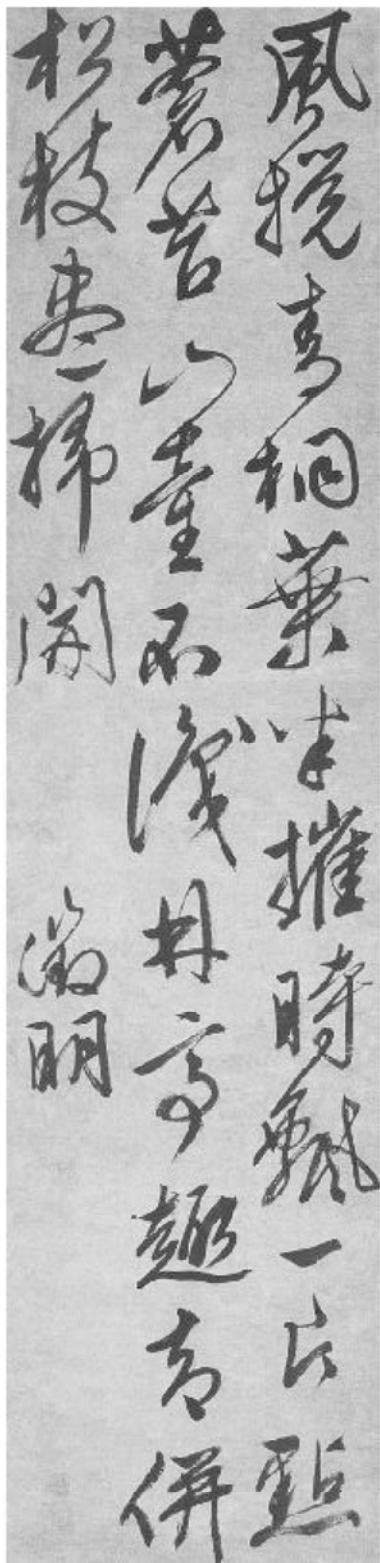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42岁后以字行;因先世为衡山人,故自号衡山;更字征仲,私谥贞献先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贡至京师,授翰林待诏。少拙于书,刻意临学,亦规模宋、元,既悟笔意,遂悉弃去,专法晋、唐。其小楷虽自黄庭、乐毅中来,而温纯精绝;行草深得智永笔法;大书仿黄庭坚者尤佳;隶书法钟繇,独步一世。生平雅慕赵孟頫,每事多师之,论者谓诗、文、书、画虽与赵同,而出处纯正若或过之。山水师沈周得其仿佛,益以神采,更出周上,然不肯规规模拟。遇古人妙迹,惟览观其意而师心自诣,辄神会意解,至穷微妙处,天真烂漫,不减古人。人称其兼有赵孟頫、倪瓒、黄公望之体,又善写花、鸟、竹、果。大图小轴,莫非奇致。海宇钦慕,缣素山积,寸图才出,千临百摹。家藏市售,真赝纵横。所刻印章虽不能法秦、汉,然雅而不俗,清而有神,得六朝陈、隋之意,苍茫古朴,略有不逮。卒年90。著《莆田集》。

江阴博物馆所藏的这幅文徵明行草自作诗轴,见图(一),纸本,明代,132厘米×31.5厘米,落款为行草“徵明”二字,钤有一方朱文“征仲”印。用笔老成,率意洒脱,充满朝气。平和中不乏恣放,沉健中更见劲拔,将生辣纵情于隽雅之中,“如风舞琼花,泉鸣竹涧”,妍媚流畅,如米、赵复出。与其诗云“风搅青桐叶半摧,时飘一片

点苍苔,山童不识林亭趣,却併松枝尽扫开”的意境一样纵横驰骋,尽展性灵。笔画起止之处多露锋,如“青”、“摧”、“亭”等字;而使转偏于方折,如“风”、“摧”、“飘”等字;其上下结构的字,如“苍”、“苔”、“亭”、“却”、“尽”等字具有方圆兼收、清劲雅秀的特点,笔画线条充满张力,给人一种精气神十足的感觉。整幅作品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奔放之势,却有晋唐风韵,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风格,应似为晚年力作,然文氏暮年转学黄庭坚,此幅行草作品较为罕见。在作品右上角起首处钤有“宋季心赏”之印(朱文);左下角钤有“铁梅真赏”(白文)和“吉林宋季子古欢室考藏金石图书之印”(朱文)两方收藏印,右下角钤有“怀民”(朱文)一方。就所钤收藏鉴赏印来讲,此幅作品先为民国宋小濂^①(1860—1926)所藏,因家遭不幸,所藏珍品流散尽失。后经现代著名画家兼收藏家周怀民先生^②(1907—1996)审定或收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由陶白先生有幸得之。

无独有三,在文徵明的传世作品中,以这首自作七言诗为内容的,目前还能找到另外两幅。一幅为浙江省平湖市博物馆藏,见图(二)。明代,纸本,156厘米×70厘米。诗云:“风搅青桐叶半摧,时飘一片点苍苔。山童不识林堂趣,却併松枝尽扫开。”落款为行草“徵明”二字。另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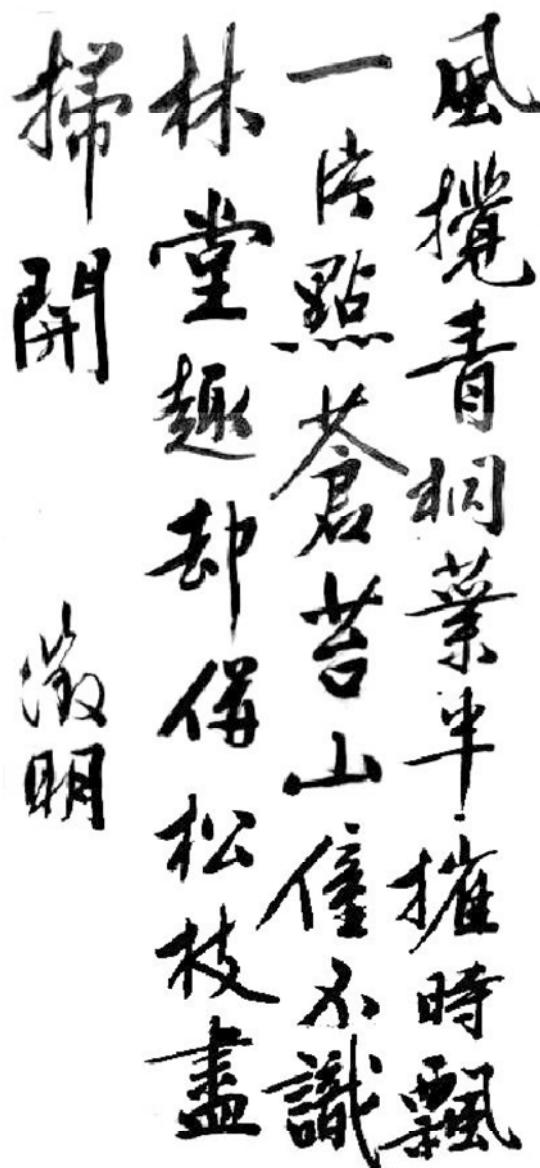
文物研究



图一

在博宝拍卖网上,见图(三)。泥金纸,扇面。17厘米×52厘米,落款行书“徵明”二字,并有袁中颐珍藏印。内容为:“风搅青桐叶半摧,时飘一

片点苍苔。山僮不识林亭趣,却併松枝尽扫开。”这两幅作品与图(一)相比较,在书写风格与诗文内容上均有差异,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徵明在艺术发展上渐进演进的轨迹:图(二)拟黄山谷笔法,应为其中晚年所作。图(三)行书作品已初具个人风貌,然诗文第三句“山僮不识林堂趣”中的“堂”字改为“亭”字,保留“僮”字。堂,指屋或厅堂之意。用“亭”字取代“堂”字,辄即带来意境的改变,使其视野由狭窄走向空阔。再看图(一)的作品,江阴博物馆所藏的这幅文徵明行草诗轴,不仅在用笔上老辣娴熟,达到炉火纯青



图二



图三

的地步,具有强烈鲜明的艺术个性,而且在诗文用字上又进一步提升,在图(三)诗文的基础上,把诗文第三句“山僮不识林亭趣”中“僮”改为“童”,写成“山童不识林亭趣”。僮,本意作“童”,指未成年人,但包含有“奴婢”之义。“亭”字保留。此处一字之改,更加体现了人格的升华。由此,全诗意境豁然深化,与其“生辣沉健,纵情隽雅”的书写风格浑然一体,相得益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文徵明严谨的治学态度。可见其在诗书画造诣上能立身明代艺坛,成为吴门书派、吴门画派、吴门诗坛领军人物,独占鳌头,与其高尚的情操也不无关系。也就印证了他孤芳高洁的品德:“生平三不肯应,宗藩、中贵、外国也”,“而贫交往往持以获厚利,至有待而举火者”。

文徵明的行草在总体风格上,“以其清雅、纯正、醇和的品格,表现了文人士气与隐逸之风。”“在当时不仅名动海内,而且海外诸国如日本、朝鲜亦知宝藏他的墨迹。朝鲜中期前,大抵为赵孟頫书风一统天下局面,自文徵明书法

传入后,朝鲜书坛亦曾出现过学习文徵明的倾向。”由于文徵明的影响,文氏家族累代善书画者,见于著录竟达30多人,绵延到清中叶,堪称历史上最大的书画世家。

(作者:江阴博物馆藏品保管部)

注释:

①宋小濂(1860—1926),字铁梅,又作友梅,晚号止园。祖籍河北,后至吉林。清末举人,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工诗善书,被喻为“吉林三杰”之一。民国时做过吉林省主席,国会议员,曾出版过《宋小濂藏书画录》。因家遭不幸,所藏珍品流散尽失。

②周怀民(1907—1996)曾用名周仁,江苏无锡人,擅国画。1934年起,相继在北平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和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58年被聘为江苏省美术馆宋元明清画展鉴别艺术顾问,苏南文管会鉴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出版有《周怀民画辑》、《周怀民藏画集》等。



浅谈中国古代银锭

林嘉华

用银制成的块状物叫银锭，银锭俗称“元宝”，属银质货币，是中国旧时银两的主要形式。明代后期，白银已成为普通的货币。明代的银质货币以各种形式的大小银锭(元宝)流通，是一种计重货币。

用银块铸造出各种形状的银货币，其名称和形式，种类繁多，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第一种是大铤(铤)，叫做大元宝，普通叫做宝银，也叫马蹄银，因为像一只马蹄。大元宝每只重五十两，这种元宝也有各种形式，所谓方鑄、长鑄就是根据它的形式而起的名称。第二种是中铤，每只重约十两，也有各种形式，多为锤形，也有似马蹄形的，叫做小元宝。第三种是小锞或锞子，像一只馒头，正面如圆形碗口，底部呈馒头形，蜂窝状。但也可以随意铸成各种形式，每只重一、二两到三、五两，也叫小铤，1983年12月初，江苏省吴江县西门蚕种场基建工地就发现窖藏银锞。第四种是碎散的银子，有滴珠、福珠等名称，重量在一两以下。

“铤”即“铤”，从习惯来说，铤的外形，是两头弧形，两侧内缩成反弧形，这是明、清时期银铤形式的样子。“铤”据隋代陆法言撰《广韵》谓：“有足曰铤，无足曰鎔”，是用以荐熟食之器，后来取其形，用之于货币，故称“银铤”。1984年江苏省镇江市出土的全国极为少见的“卷足银铤”，1975年12月浙江长兴县唐代窖藏中也出

现过这种银铤，还有，1980年12月在陕西蓝田县汤峪公社杨家沟村以及1979年江苏省扬州市北郊梅岭大队等地也先后出土过，这种“卷足银铤”应是原始形的“铤”，从发展情况推测，最早应是直足，呈“几”形，可能由于铸造地点不一，重量大小，都不雷同，对储存和携带都不方便，因此将足内卷；在一定时期以后，银铤已成固定的流通货币，就干脆将足削平，便于铸造、储存和携带。

从出土的实物来看，我国早在春秋时代就开始铸造固定形态的银质货币了。1974年河南省扶沟县发现的银质币18块、金质币392块，是贮藏在一个铜鼎内的，形状均与铜布币相同。

魏晋南北朝，虽民间买卖以铜钱、帛为本位，作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但大宗交易多用金、银，这时“金、银除铸成饼和铤的形状外，也有铸成钱形”。根据《晋书·石勒》记载，晋代已有使用银币者。《隋书·食货志》说：“梁初，交广，西域全以金银为货币”。北周武帝时，河西一带均用西域的金银币。

由此可见，我国货币除使用钱、帛外，黄金与白银一直占着重要的地位，因为钱币、布帛价值较低，不便用于大宗交易，只有金、银这两种贵金属货币的职能，才适合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以及储藏手段，从而使白银逐渐升为主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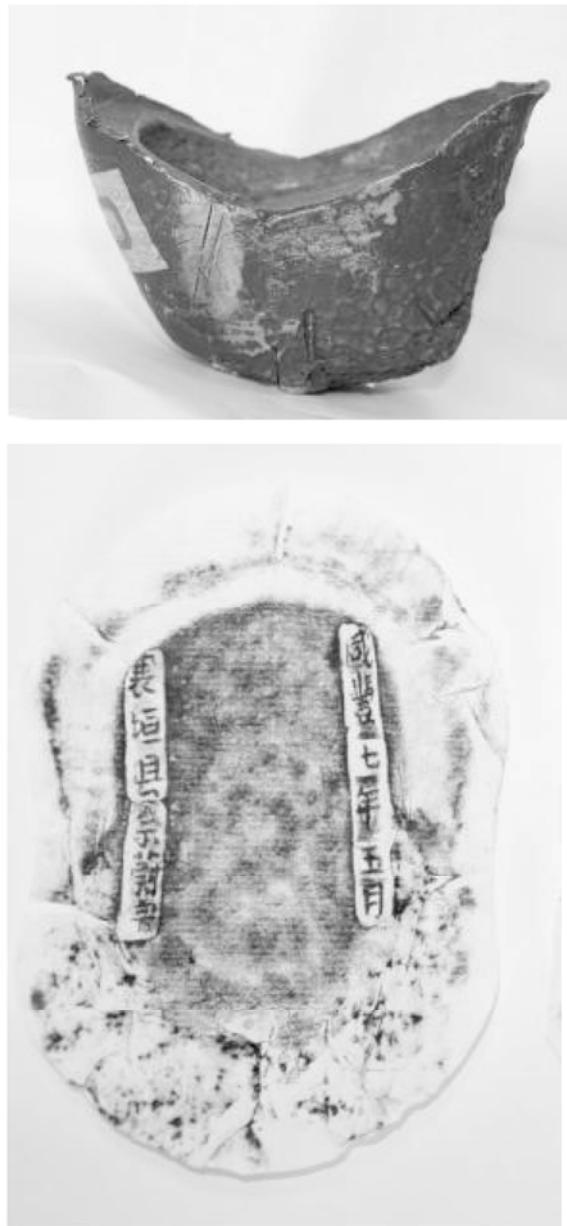


我国盛唐时期的版图空前广大，西越葱岭，与中亚各民族的政治经济交往十分密切，大量的胡商来中国西北和长安经商，同时我国南方海运大开，西亚、南亚各国的商人也乘风破浪，纷纷来到我国东南沿海城市同我国进行贸易，而西亚、中亚各民族是使用白银作货币的，这时的银质货币就更为流通，正如韩愈谓“五岭买卖——以银元”。国内外贸易的兴盛，需要单位较大的货币，因而银的重要性大大增加，朝廷赏赐多用铤形的生金銀，或用金银钱，公私收付也沿用前代的各种形状的金银制品，如铤（铤）、饼（钣）、笏、筭等，这时不仅固定的银质货币在流通，而且金、银器饰也可用来流通转让，唐人诗中也常有反映，大家熟知的杜甫诗：“……囊虚把钗钏，米尽折花钿……”就是当年长安兴旺的金融市场的生动写照。

到了宋仁宗景祐年间，银铤取得了合法地位，每铤50两，值钱百贯（每贯一千文），纳税，官俸和岁币均用银。白银的货币地位显得日益重要。元代首创银元宝制度，有元朝宝货之意，以银为钞本发行银钞。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规定公私收付均用银铤，明嘉靖八年（1529），正式确立了银两制。清朝加以充实，直到1933年南京政府废两改元、统一币制，共行了405年。外国银元最早在明朝已流入中国，清朝中叶大量涌进，也逐渐成为主要银质货币。

1989年4月，江阴市云亭镇陈家村农民陈年宝在帮邻居建房挖地基时，于地表下60厘米处挖出一只粘满泥土的银铤。目击者报告给江阴市公安局，公安局收缴后移交给江阴市博物馆收藏，随后博物馆派笔者前往调查采访。据了解，这只银铤埋藏在地主陈召祥的住宅内，土改时，陈召祥的房屋由人民政府分给了贫苦农民。

该只银铤，铸成为中间凹，两头翘，底部（背面）密布着蜂房形状的微小空洞。底部（背面）长7厘米，宽4.5厘米，腰高4厘米；两头翘的部位通高7厘米，通长11.3厘米，腰宽6.3厘米，净重1870克（因底部留有被锯一小槽和被凿掉一小块等痕迹，其原本重量应是1872克），属于银元宝中的大型银铤，含银成色为95%。上部椭圆凹面上铸有两行铭文，右边铸“咸丰七年五月”，左边铸“襄垣县余蔚宗”。襄垣县，在今山



西省，为地名，余蔚宗可能为工匠姓名，也可能是钱庄或银号主姓名。该只银铤上铸有工匠姓名，这是表明银铤的成色重量可以得到保证。

该件银铤和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甘肃庆阳县、贵阳北横巷以及江苏省昆山花桥乡石头四队等地出土（发现）的银铤相比较，就其格局、大小都是很相近的。据我们初步考证，都可称为“元宝”。该件银铤的出土，对于清代乃至我国货币形态及有关度量衡制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拓片：符蕴）

（作者：江阴博物馆藏品保管部原主任）



适应时代需求 提升服务品质

孙军

博物馆在当今社会发挥着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博物馆是一个城市文化底蕴的再现，是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标志，参与社会，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新时期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适应时代需求

博物馆事业为经济社会服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产业和旅游发展不可多得的资源。近几年，由于旅游事业的发展，在旅游线上各种类型的博物馆蓬勃兴起，构成了一幅美丽文化图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思想品德、文化素质和陶冶情操服务；为在校学生校外教育、成人的终生教育服务；为科学的研究和旅游观光、文化休闲服务，有助于人的发展和愉悦，从而为经济社会做出贡献。二是为经济社会服务，彰显着宣传教育功能。今年我市将建成博物馆群，有企业和个人的专题博物馆都是经济建设与文博事业相互映衬的良好发展，专题博物馆建设成为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品质生活、扩大城市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像长泾的明清古街的建立，各类文保单位的修缮，和私立博物馆的相继建立，都为江阴历史文化名城的争创和投资环境的优化起到重要作用，也是现代经济转

型升级的重要助推器。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市场需要决定企业产品。同样，文博事业未来的发展也要考虑时代发展的因素，要有特色。全国各地、城市都有较厚重的文化积淀，有鲜明的历史文化特点，包含了历史文化积淀的有形的物质成果，也包括了无形的文化风格与个性。准确把握地域历史文化内涵，不仅可以区别于其他博物馆，形成百花齐放的陈列格局，也有利于形成自身个性，因此未来的发展必须结合时代的步伐，结合地方特色。经济发展，城市进步，国际接轨这是必然的趋势，这在一年比一年多的涉外接待中得到了体现。因此二十一世纪博物馆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除了弘扬民族文化、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文化教育作用，提高大众的文明素养和审美情趣外，它更是一个城市作为对外交流的文化名片，同时博物馆简单的开门迎客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而是愈来愈体现了文化休闲、社会教育、技术支持等社会功能。

二、提升服务品质

要完善博物馆的功能与社会接轨这一时代的要求，未来博物馆的发展和提升服务品质，在



传承现有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可以在四个方面加大力度，加以拓展：

1、做好人才队伍的建设

江阴博物馆在全国县级馆中，硬件设施是一流的，一流的设施更需要一流的团队。就目前而言我馆的人才队伍结构还有待提升，专业人员的比例还太少，专业团队比较薄弱，只有继续加强人才队伍的培训，才能适应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人们对文化品位需求的不断提高。博物馆专业性很强，各个岗位都有专业知识，加强队伍建设笔者以为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输出人员。可以结合工作的需要选派人员到专业培训班进修，到相关博物馆学习培训，二、引进专家。引进文博专家，引进行业泰斗进行业务讲座，解疑答惑，这些都是较快提升博物馆人员业务能力直接途径。三、加强自我学习。我们要积极响应市委、政府和集团争创学习型单位，学习型个人的要求在工作中不断自我完善，把培训和讲座的知识运用于日常工作，在工作中学习才能更快更主动更熟练的掌握技能，学以致用。目前县市级博物馆都有着人员紧张的现象，在全馆开展非固定岗位的轮岗，促使一人多专，一专多能，一方面可以解决人员不足现象，另一方面可以加速队伍建设，形成博物馆事业和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

2、完善藏品结构，加强学术研究

藏品是博物馆工作的原水，是一切工作开展的根基。目前虽然江阴博物馆藏品有一万三千余件，但是只有不断增加藏品数量和质量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我想解决藏品数量和质量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继续加强考古发掘，9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高城墩遗址出土文物232件，祁头山遗址三次试掘出土文物244件，都说明考古是博物馆藏品来源的主要途径，同时还要主动的同各乡镇文化中心联络，积极参与城市建设、水里建设，及时掌握和处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避免文物的流失；二、积极争取市委、政府的支持，利用国家和省文物局的政策，和博物馆等级达标等要求，加强藏品建设，提升藏品的质量，形成品牌效益，集中资金提升和解决某一门类的藏品数量和质量的不足，形成区位优势，体现藏品特色，强化行业优势。三、要经

常性的为各类协会、藏家、捐赠者举办活动，积极让社会和捐赠者参与其中，体现捐赠者的社会价值，展示博物馆的行业优势，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争取获得更多社会团体和捐赠者的支持，获取藏品的捐赠。

另外博物馆不是库房，收藏的目的最终是服务大众，藏品研究是体现博物馆综合实力的工作，加强同周边学术界的协作，从纵向和横向研究江阴地域文化，使研究成果及时全面的转化为服务项目，博物馆的社教功能才能更好的形成实效。

3、提升服务的品质，拓展功能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文化建设的深入，大众文化消费档次越来越高，人们对博物馆的要求也有了新的认识，提升服务品质是当今博物馆必须开展的重要工作。

首先，博物馆要走展览的精品之路。博物馆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古代文化，而且是人类文化从古到今的延展路径，是文化的积淀，必须让人们在现代氛围中去追溯古代。笔者认为要在藏品的引进上推敲，要在对外宣传上下功夫。立足自身，依托集团加强外宣，通过全省、全国的馆际交流形成精品战略，打破地域的局限。要加大“请进来、走出去”的办展理念，像今年，开展名家走进江阴的活动，不仅可以使江阴百姓欣赏到高端的艺术，还可以通过办展增加博物馆现代藏品数量，为以后的发展提供藏品资源。继续引进像《大风歌——两汉文明》的展览，一个月吸引了江阴5万余观众的流量，这对博物馆功能的彰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今年《奢华的艺术——馆藏金银器展》被列入2011年全省7个巡展项目之一，相继在连云港、南京、仪征、盐城展出，不仅仅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更重要的是在展出过程中，形成了馆与馆之间的人员的交流，以及在办展中宣传模式、展示手段、工作作风、工作态度上的互补。

其次，博物馆功能的拓展性服务。博物馆是个服务性的行业，是公益性的服务性行业，服务是教育的延伸。博物馆可以根据观众需要，借助博物馆这一品牌，广交文博专家，在文博知识、文博讲座、文物鉴赏上下功夫，拓展深度和宽度。今年我市将建成博物馆群，（下转第51页）



博物馆文物外展工作刍议

陈健智

当前，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意识到文物对外展览的重要性，文物展览从走向国门的出国展到国内各地区的巡回展活动也是日趋频繁，精彩纷呈。2011年，我参与了江阴市博物馆的精品文物在江苏省内4个城市的巡回展览，颇有感受。外展结束后，结合自身工作中所获得的一些心得再参考国内其他博物馆成功的外展案例，在此简单展开谈谈博物馆的文物外展工作。

一、博物馆举办文物外展的意义

1、办文物外展，有利于促进外交、外宣工作，宣传民族文化，提高本国和本地区的知名度。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党中央就提出了“文物外交”的战略思路，文物展览就先后赴法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地展出，成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1978年开始，我国的文物大省陕西省就先后组织了珍贵文物青铜器、秦兵马俑、汉代陶俑砖瓦、唐金银器等频频走出博物馆大门，甚至走出国门举办展览。这些以文物对外展出为主体的交流活动，在对配合国家改革开放，对外交往，对外贸易以及促进陕西省政治经济发展，树立陕西对外形象等方面都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大到国家小到城市地区通过组织文物外展，不仅增长见识，搞活文物事业，更能进一步的对外宣传自我，有形无形起到了“文化大使”

的作用。2011年，笔者亲身经历了的江阴市博物馆馆藏金银器精品在江苏省内的巡展，展览先后在连云港、南京、盐城等城市展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进一步提高了江阴市博物馆的社会形象的同时，更好地对外宣传了江阴市丰富的历史内涵，提升城市知名度，文物外展无疑是城市的一张“名片”。

2、办文物外展，有利于更深层次地认识文物价值，拓宽文物学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中写到自己在鉴赏古镜时的感想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体现出他的历史眼光，由此可见通过对文物的鉴赏，不仅可以体味文物本身的艺术价值，还可以联想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和时代精神，文物对解读历史，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能够起到证史、补史、正史等作用。文物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而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文物则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使人们了解到当时的真实情况。文物的外展能使更多的人通过鉴赏了解，去感受文物带来的特殊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同时，在文物外展活动过程中，博物馆业务工作者有机会开阔眼界，得到锻炼，能够更好地提升文物的陈列展示、科学研究、保护管理等业务工作。



我国的陕西、河南等文物大省就多次组织文物的出国展览，从最初的通过文物展览达到自我宣传的作用外，在文物展览的同时，专家互访，人才培训就更加频繁，从而能进一步学习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文物陈列、保护等技术。2011年江阴博物馆的金银器到南京市博物馆展出，在展览的接展布展中就学习到了许多先进的有关金银器文物的展陈与科学命名的知识，而南京市博物馆的这些先进工作经验也是得益于他们多年文物外展的成果。同时以文物展览为契机，能进一步激活学术交流活动。文物外展期间如果能够共同配套组织讲座、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就起到了“展览搭台，学术唱戏”的作用，以学术促展览，以展览助学术交流，拓展了文物展览的广度和深度，为专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创造了条件。

3、通过文物外展丰富充实博物馆自身活动内容，更好地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大部分博物馆自身办展经费有限，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文物外展后采取互换展览的方式得以弥补。“走出去，请进来”这种双向交流的办展模式越来越受到各大博物馆的青睐。根据《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全国博物馆年均陈列展览达到1万个以上，年接待观众达到5亿人次以上。每年在国外举办120个中国文物展览，每年引进50个国外文物展览。这为馆际展览交流工作不断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放眼全国来看，这种交流展成功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比如2006年12月至2007年10月，由中国文物对外交流中心在首都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河南博物院、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组织举办的《西天诸神——古代印度瑰宝展》；2004年河南省博物院引进的规格高、影响大的外国一流文物精品展《古罗马文明展》。同时国内不同地区博物馆之间馆际展览交流活动也是接二连三，非常频繁。今年江阴博物馆就通过外展的渠道，先后引进了南通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吴江博物馆、华侨博物院等兄弟博物馆的精品展览。

4、办文物外展，有利于带动当地的经济得以全面发展。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人

们越来越多地追求精神享受，旅游观光业日渐兴旺，博物馆是旅游参观的一个重要场所。政府可以在在协助支持博物馆文物外展的同时，加强宣传自我，招商引资，逐步改善旅游投资环境，以旅游带动农业、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全面发展。

二、如何做好博物馆文物外展工作

1、开拓文物外展的市场，确定目标，主动出击。博物馆根据自身文物特点，确定目标，开发拓展好展览市场。譬如亚洲许多国家的国民熟悉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很感兴趣。因此，在选择文物出展国家时，就可以以东亚文化圈为核心，重点选择日本等国家地区进行展出。同时，要全方位多渠道的开拓展览市场，要把文物展览融入到政府的时事政治经济活动中去。

2、提升展览质量，丰富展览内容，打造精品展览。一个好的展览，不仅仅在展出期间产生较大影响，展览结束后仍常常被人们提起，有的甚至持续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展览主题的确定与文物的挑选在外展中非常关键。一个好的主题，对举办文物外展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开阔思路，不断创新，针对不同城市地区和国家的民风、民俗、民趣以及展出文物的种类、级别、确定展览主题，使每次展览都能做到主题鲜明，文物精美，科学有趣，富有内涵，以吸引更多的观众。

3、外展协议的签定要多方斟酌，严防疏漏，考虑周全。尤其是涉外谈判和协议的签定要更为慎重。虽然，国家文物局有对外展协议书的范本供我们参照，但是，对于某一展览的具体条款仍会出现考虑不周或协议的某一方面会有瑕疵与疏漏的情况。譬如展品起运前承运公司必须对承运中的时间安排、运输车辆、保卫措施、存放地点、环境状况、安排通关、航空运输等方面提供详细的操作方案，并得到博物馆方的认可，以确保展品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对于博物馆人员赴外的各种费用，也要尽可能在协议书中写清注明，避免发生误解与纠纷。

4、外展的包装与运输应将文物安全放在首位。文物自身的历史价值决定了它的不可再生性，因此，不管是内展还是外展都要将文物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每一位博物馆工作者的



职责。外展文物内匣与外箱是文物长途运输的安全保证,在箱匣制作与文物装箱运输过程中,要严格把好质量关,按照操作规程进行装箱,做到万无一失,确保的文物安全。因此文物保管员不仅要从事正常的藏品科学保护管理与研究外,还要学习一些包装技术,以应付各类外展。

文物展品的包装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现在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近年来中国的文物艺术品的包装正在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形成一个完整的集包装、装箱、运输、报关、保险等一条龙服务的产业链,大多数博物馆已经将对外展览的包装、运输、报关等工作全部委托给有信誉的大型国际运输公司来办理,这样不仅可以将包装与运输的责任捆绑在一起,避免因包装与运输脱离而导致展品出现事故时无法分清究竟是包装的责任还是运输的责任问题,而且还可以减轻筹展人员的劳动强度与工作量。

5、文物点交记录要清楚,责任应明确。对外展览的文物点交工作是确保文物安全的重要一环,也是分清双方责任的关键。外展的文物点交记录不仅要文字描述清楚,文物特殊部位的完残情况也应该有影像记录。用摄像与拍照记录的文物完残情况比较直观,也便于对方的认同。

双方在点交单上认可签字后,点交单就具备了区分展品完残责任的法律凭证。故点交单应及时存档、妥善保管、随时备查。

6、外展结束后的资料汇总整理移交应及时。每一个外展从筹备、送出到结束大都需要经历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外展所涉及的协议书、请示、批复、保险单(副本)、文物点交清单等一系列的资料都应该及时移交存档。相关工作人员应该注意展览资料的搜集,从筹备到开幕以及展出情况都应该有文字资料与影像资料,并且及时汇总存档。资料的整理与汇总过程,也是我们对展览的过程的回顾总结,从中发现不足,收获经验。

总之,伴随着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步伐,博物馆文物外展活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好时机,文物外展在今后将成为文化交流中最有影响、最受欢迎的活动,也同样是会展经济中最具特色、最有吸引力的一项内容。当今世界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借鉴,在一定意义上更有利子增进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友谊,更有利子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作者:江阴博物馆陈列宣教部)

第七批江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测绘

为加强全市不可移动文物管理,完善文保单位档案信息,为今后文保单位的修缮提供准确依据,江阴市文广新局委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对第七批江阴市级文保单位进行测绘。在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及相关乡镇文化中心工作人员的协助和引导下,27名师生兵分四路,从8月20日开始,历时8天,对分布在全市10个镇(街道)的21处文保单位进行实地踏勘、测量,记录原始数据,绘制草图,并将数据进行整理,绘制结构平面图,测绘工作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 (宋荔)





博物馆电器照明维修之浅见

张焕兴

博物
物
馆
学



博物馆已成为一个地区的综合实力的象征,发挥着保护和展示文化与自然遗产,开展社会教育、提供休闲和娱乐功能、成为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丰富,人们重新认识了博物馆的价值,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了博物馆,博物馆的文化需求群体日渐扩大,如何为观众提供丰富的展览,让观众能在安全、亮丽舒适的环境中欣赏藏品,拉近博物馆与观众的距离,已成为博物馆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江阴博物馆把安全、亮化、创造出精品特色的点、块、厅作为基本工作,以此吸引博物馆的人气,提升知名度。笔者有多年电器维修工作经验和技术特长,一直承担着博物馆的电器照明及日常维护与检修的工作。通过平时对电器状态维修经验及江阴博物馆电器照明的基本特点进行粗浅的分析,发表一些浅见,供广大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江阴博物馆作为建筑面积约16000平方米



的新型综合博物馆，它的各项功能配套设施规划齐全。而电器线路这一块国家有规定，博物馆用电是根据一级用电负荷单位设计，它既复杂又繁琐，对安全可靠性有极高的要求，细化性较强。例如：强弱电源专线有动力专线、普通照明专线、工作机房专线、应急照明专线、警卫照明专线、值班照明专线、区域分块照明专线、双电源专线、障碍照明专线、应急备份照明专线、消防专线、通信网络专线、监控双向网络储存传输专线、应急技防网络专线等等系列专线，而规定一些专线的施工要求是隐蔽的。另一些专线是明排的，这些专线像一个蜘蛛网一样，分布在地面、墙体及吊顶中，而吊顶的材质是导电的轻钢龙骨，穿线的管材是铁质的，各展厅柜的材质是易燃物质。江阴博物馆新馆自开馆六年以来，电器线路逐渐出现的一些问题，笔者进行了总结。

一、电器的跳闸现象及后果：

在博物馆正常开放期间，时有部分展厅有

局部线路跳闸和局部整体跳闸现象的出现。经抢修发现照明线路发生短路，电路电阻急剧下降，电流急剧增大，若分路开关不及时跳闸，可能烧毁电线或电器设备，甚至引起火灾。原因主要有：由于超负荷或受机械损伤摩擦震动等损坏绝缘层，散热不良，导线碰触金属外壳引起短路；房屋失修漏水，展厅柜灯具的线路日久失修，造成灯头受潮，绝缘不良，相通短路；安装不合规格，导线未拧紧绝缘材质未按要求包扎；出现个别线路和用电设备存在漏电现象，部分初装的人员未按照做起来“宁肯崩，绝不松”的原则工作，造成隐患，责任心不强等。例如，博物馆巡查人员反应，书画馆局部线路跳闸，送电无效，经抢修发现是室内除湿机的冷凝水流到一路照明线过线盒内，引起短路跳闸，经处理后正常。还有刘氏故居与曹颖甫故居在大风大雨时也出现同样类似情况，动物标本馆北国森林柜其中一次跳闸也是同样原因，这些现象的时常

表一

展品类别	照度(LX)
丝，棉麻等纺织品，织绣品，中国画，书法，拓片，手稿，文献，书籍，邮票，图片，壁纸等各种纸制品，笔画，彩塑，彩绘，陶俑含有机材质底层的彩绘陶器，彩色皮革，动植物标本等。	50 色温≤2900K
漆器，藤器，木器，竹器，骨器制品，油画，蛋清画，不染色皮革等	150 色温≤4000K
对光不敏感的展品如：青铜器，铜器，铁器，金银器，各类兵器，各种古钱币等金属制品，石器，画像石，碑刻砚台，各种化石，印章等石制器物，陶器，唐三彩，瓷器，琉璃器等陶瓷器，珠宝，翠钻等宝石玉器，有色玻璃制品，搪瓷，珐琅等	300 色温≤5500K

表二

辐射敏感度	展示物
特别敏感	丝，棉麻等纺织品，织绣品，中国画，书法，拓片，手稿，文献，书籍，邮票，图片，壁纸等各种纸制品，笔画，彩塑，彩绘，陶俑含有机材质底层的彩绘陶器，彩色皮革，动植物标本等。
敏感	漆器，藤器，木器，竹器，骨器制品，油画，蛋清画，不染色皮革等



发生不利于博物馆按计划正常开放。

二、灯光照明的合理布局及效果

博物馆参观人数的多少与节假日、天气的变化、重大活动、学生团体、旅游团队有较大关系。有时参观人员较少,有时较多。灯光照明的合理设置,不仅起到节约能源的作用,而且有利于展厅文物的保护。

博物馆电器线路在突出展览的亮点和效果的同时,制定出一套既能给馆节约电能,减少灯具维修次数,又能不失展室华丽、整齐、突出特色的展览效果。而且又不影响到安保技防监控的质量。

对展品的保护是在展览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某些外界条件,如照明辐射光,温度,潮气以及大气中的活动性气体污染等都可能对展示物品造成一定的损伤。展厅长时间的灯光照射,会使部分纸质文物发生起皱、变色、脱落、干燥、卷起等现象,对展示柜、展板等亦有影响。道易定律认为:在某一给定的光源下,对被照射物体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曝光时间与照度两者的乘积是一个定值,时间越长,则允许的照度应越小。对博物馆内的照度及曝光时间加以限制,展品表面的照度高低也要考虑光和热的影响,展品暗时则照度要高一些,还要使观赏者在馆内参观时感到安定,舒适,疲劳少,应尽量设计成不单调而舒适的照明环境。

照度推荐值见表一:

光的作用分为光化学作用与热作用两种。光化学作用变质程度主要决定于:照到展品上光的辐射能强度(照度)的大小,辐射能的光谱特性,展品照明时间的长短和展品材料本身吸收和抗辐射能力的大小。下表列出了各种展示物品对光作用的敏感程度(表二)。

应对展厅内展览时和非展览时的全部光照及总曝光量进行控制,对光特别敏感的展品总曝光量控制在小于 $120000\text{LX}\cdot\text{h}/\text{年}$,对光敏感的展品控制在总曝光量小于 $360000\text{LX}\cdot\text{h}/\text{年}$ 。

笔者认为,博物馆应改变原有早晨开展厅巡视时开启电箱总开关,闭馆结束巡视后只关电器总开关,其余分路均不操作的习惯,而是应根据天气情况参观人数的多少,各文物及板块

说明的光照度要求制定出各分路的开关时段,并做好标签贴上,同时制订开启照明的动态和静态相结合,手动与自动的相结合,声控和光控的相结合,应急照明与普通通道照明相结合的四结合方法。笔者利用对平时各展厅维修的机会更新优化布置应急照明和普通通道照明的位置,使之更趋于合理化,其效果非常明显:照明灯具使用率提高了,维修周期变长,从而维修基金也相应减少,而各文物及板块说明的光照辐射度明显得到改善,以前有的不良现象明显没有了,也符合安保技防监控的 24 小时全方位光亮度的各项要求。

三、散热不良的原因分析与改进措施

电器照明的散热不良,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笔者在一次例行照明巡检中,发现在古代通史馆的陶杯柜温度极高,四周全部封闭顶上面的灯线已发烫,约有 30 厘米导线已几乎软化短路,手却无法接触,幸好及时发现彻底解决,否则后果不可想象,因为展柜四周全是易燃材料构成,象这样的情况在其它展览中也时有发现,都得到了及时解决,还在这些展柜的四周做了通风散热孔。

四、常规的巡视检查处理的措施

在对博物馆内所有库房展厅的应急照明情况检查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应急照明逆变器已失效无法正常工作,还有发现几处应急照明的专用电源线与普通照明线混接,有两处还无电源、电源线接错等现象,对这些不安全的隐患进行了更换和彻底解决。另外,博物馆各个展厅的控制箱有好几处没有细化分路,也及时进行了分化标注好。在刘氏故居和曹颖甫故居,对各线路的分路进行统一识别做好标注,便于管理。曹颖甫故居的一只电箱由于运行时间长,配件买不到,电箱内线路老化严重,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整改更新,现已投入使用。

博物馆的电器照明维修工作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责任重大,细致繁琐,只要带着认真负责的心态去做,才能有效的保障博物馆的各项功能的正常发挥。

(作者:江阴博物馆安保部)



毛泽东播火江阴

程以正

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曾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燃起过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被破灭了，复辟称帝的袁世凯死后，出现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素称“鱼米之乡”的江阴，全县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归于地主所有，生产力停滞不前，旱涝灾害频仍，“糠菜半年粮”就是大多数农民生活的写照。1921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江阴早期革命波澜壮阔，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曾亲手为之播下革命的火种。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毛泽东时为中共中央局委员、中央局秘书，参加了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毛泽东与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等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上海执行部设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它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苏、浙、皖、赣、沪等地工作，毛泽东担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事实上成为中共在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他以上海执行部名义通过《民国日报》登载启事征求国民党员。正在丹阳任教师的进步青年江阴人钱振标和同事戴益天利用暑期前往上海执行部接洽，受到毛泽东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热情接见。钱振标、戴益天与顾山的周水平本是省立无锡第三师范的同窗好友，三人才华出众，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常锋芒毕露撰文抨击时弊，有“三师三杰”之誉，也分别经受五四大潮的洗礼。毛泽东、胡汉民同意介绍钱振标、戴益天参加国民党并为他们办理了入党手续。随后，两人按照毛泽东指示分赴丹

阳、镇江、常州、金坛、江阴等地发展国民党组织，把仍处在军阀统治下的革命青年吸引到拥护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来。

秋天，钱振标回到江阴，与好友云亭小学教师孙选会合，孙选本名孙逊群，出生东北乡中兴的贫农家庭，县乙种师范毕业后在三甲里、云亭等地任教。他已在南京参加暑期讲习班时由省党部侯绍裘介绍入国民党。钱振标在华墅发表《国民和国民会议》演讲，与孙选借城中昆仑学社征集同志筹组党部，当场签名入党的有堵铁君、朱杏南、徐鸿英、吴增铣、朱士能等40余人，多为教育界的精英，澄南小学的青年教师大多加入国民党，因该校地处较为隐蔽，钱振标择此作为秘密活动的联络点。是年冬，也在校内设立国民党江阴区分部。1925年1月，上海执行部派中共党员刘重民到江阴以检查国民党党务为名物色建党对象。3月，孙中山逝世。钱振标由恽代英、侯绍裘介绍入共产党，任上海引翔港党支部书记。不久，钱振标与宣侠父参加赴北省支部，受中共北方区党的领导人李大钊的派遣，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至西北冯玉祥的国民军做政治工作，任甘肃省军务督办公署政治处少将副处长，远征甘肃。5月，孙选在上海小沙渡加入共产党，任中共江阴支部书记，并被选为国民党江苏临时省党部委员。江阴支部成为中共江浙区委直接领导的外埠11个支部之一。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孙选等以学生、教员联合会为基础，联合各界团体成立江阴“五卅”惨案后援会，举行罢课、罢业和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6月13日上海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张庆孚应邀返澄，在江阴各界



54个团体公祭“五卅”惨案遇难烈士的5000余人大会上,作了悲壮激昂的演讲,听者无不动容。人民大众反帝爱国热情空前高涨。随后,萧楚女受团中央委托来江阴会晤孙选,布置共青团的组织发展工作。中共党员、上海大学附中教员周水平奉侯绍裘之命回江阴,协助孙选成立国民党江阴临时县党部。江阴的国民党组织是钱振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一手创立的,其后许多人经受考验被吸收入党,有的成了党的骨干。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因积劳成疾已于年前回到仍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的湖南老家养病,没有继续当选。春夏间他在韶山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受饥荒的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9月,毛泽东来到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被推荐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的。1926年1月,他获悉周水平在江阴创办《星光》报,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号召实行减租,被军阀孙传芳以“宣传赤化”密令斩决,对此深为关切。3月19日,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这是面向全国招生的第六届农讲所,目的是为党“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江阴独支书记孙选经江浙区委推荐前来参加。这届农讲所共有来自20个省区的327名学员(其中江苏9名),5月3日举行开学典礼。共开设25门课程,讲习内容有中国农民问题、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等,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教员有萧楚女、周恩来、恽代英、彭湃、阮啸仙等人。对中国农民问题这门课,毛泽东从6月初开始用23课时亲自讲授,对第一个为农民运动捐躯的周水平事迹也结合讲到。8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东江农民运动开展得最为成功的海丰等地考察实习两周。9月11日举行毕业典礼。

江阴独支书记孙选回到上海,11月被任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返江阴领导农运工作。曾在澄南小学任教后在无锡艺芳小学入党共产党的周庄人陈叔璇,参加江浙区委举办的农训班结业,也以省党部农运特派员身份回江阴。孙选作为毛泽东的学生,以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的革

命实践为榜样,深入沙洲农村,实地调查农民情况。他每天只吃两餐,早出晚归,访贫问苦,写出了《江阴沙洲农民现状的报告》,指出“目下沙洲多数农民十之八九已至断粮地步”,“福善乡南段,有一户农民家里,因没有钱买米而断炊,父母饿倒于床上,奄奄一息,小孩号哭,路人过其地,奇之,即推门而入,设法救济,其父母亲未救活”。“又有一个农民,因索债账者相逼而来,一家妻儿复啼饥号寒,处于万分困苦的境地,毫无法想,持菜刀到旷野自刎,所以沙洲农民的吃饭问题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为了解决眼前的生活救济,孙选“指导农民组织救荒会,联合没有饭吃的农民请求董事将积谷发赈。此办法农民异常赞同,但地主阶级大起恐慌,造谣说:‘你们起劲去签名入会啦,将来要捉你们去打仗的!’斗争一时虽受影响,但已成立了两个村会共50余人,都是异常勇敢觉悟的农民,正由他们努力向外发展”。孙选通过实地考察,深感从事农运工作,必须从农民的痛苦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才能有力地推进农民运动。

1926年的10月,毛泽东在广州送走农讲所的学员,于中下旬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接到中共中央任他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通知,他不愿只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为了提高党内同志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希望从各地的实际考察中引出较为详细的具体资料,特于11月3日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开了“前往长江北方各省调查农民状况”的正式介绍信。踏上北上之路。首先抵达上海,这时中共中央及中共江浙区委、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机关都设在租界中。他会见了江苏省党部农民部长、共产党员戴盆天,后对江浙邻近沿长江的崇明、慈溪、无锡、江阴等地的农民情况,作深入考察了解,以润之具名撰成《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发表于1926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174期《向导》周报上。他在引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那种“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地,农民并无多大痛苦,不过是凭空想象,完全是不明白江浙农村实际情况之谈。我们试一考察江浙农村之实际状况,便知道实际情形与悬想完全相反。以下所述各县具体事实,已足证明江浙农民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太平富庶无多痛苦的农民了”。毛泽东在这篇考察报



告中为“江阴”单立一节，浓墨重彩记述了周水平为领导农民减租而英勇献身，当地农民正在继续奋斗的情况。他写道：

“江阴从无锡乘轮船前往，到一处地方，叫顾山镇。顾山镇介在江阴、常熟、无锡三县之间，三县大地主很多，压迫佃农很厉害。去年秋天，有一个日本留学生顾山人叫周水平（周原在省立无锡师范毕业），回到本乡看不过眼，乃劝佃农组织团体，名曰‘佃户合作自救会’。周往来各村，宣讲农民痛苦声泪俱下，顾山农民从者极众，江常锡三县交界各地农民都为煽动，如云而起，反对为富不仁之劣绅大地主，一致要求减租。但当农民尚未完全联合起来之时，劣绅地主早已联合起来，江阴、常熟、无锡三县绅士地主同时动作。文电如雪片告到孙传芳，孙传芳那有不听劣绅地主的话，于去年十一月便把佃户合作自救会解散，把周水平捕获，今年一月便将他杀害了。减租运动算是一时镇压下来。当周水平灵柩回到顾山安置在他家里时，农民们每日成群到他灵前磕头，他们说：‘周先生是为我们死的，我们要给他报仇！’今年大旱，稻收不好，农民又想起来要求减租。可见他们并不怕死，他们知道只有团结奋斗，以减少贪暴地主的剥削，才是他们的出路。又江阴东乡有一个名叫沙洲的地方，亦有农民反对地主的事。此地主旧例为交上期租，江苏人所谓寅交卯粮，是一件于农民经济上很痛苦的事。现在农民要求种出还租，正在那里奋斗。”毛泽东在文中高度赞扬了农民运动的先驱者江阴周水平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也热情肯定了江阴人民前仆后继的大无畏气概。11月15日，中共中央局批准了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制定的《目前农运计划》，将江阴列入江苏农运中应予注重的县份之一。

1927年初，国共合作组成的北伐军兵分三路向长江下游胜利进军。以孙选为首的江阴独支为策应北伐军，加紧进行工农群众的组织发动工作，建立县以下4个区党部及县农民协会。3月19日，盘踞在城内的军阀孙传芳所属联军第一师白宝山部，开始仓皇渡江北去。孙选趁县城一片混乱之际，带领朱松寿、茅学勤等一批农运骨干关闭四城门，搜捕县知事吴鹏，收缴县城4个警察分驻所的武器，组成以长山采石工人

为主的农民自卫军，在城头上扯起青天白日旗，吓得别处退下来的残余联军绕城而走，完全占领了江阴城。孙选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派出代表去黄山炮台接洽守军投诚事宜，由夏港朱杏南赶赴焦溪迎接北伐军前锋，发动群众箪食壶浆沿途欢迎北伐军。3月21日下午，北伐军第十四军第一师官兵由师长熊式辉率领，一路高呼“为周水平烈士报仇”等口号进入江阴城，孙选以国民党江阴县党部名义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有数千人参加的庆祝北伐胜利大会。接着，在文庙隆重举行周水平烈士追悼大会，为周水平平反昭雪，缉拿周案要犯，城乡封建势力头面人物威风扫地。未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熊式辉执行蒋介石“清党”政策，下令通缉孙选、陈叔璇等领导人，改组国民党江阴县党部，解散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朱士能等遭杀害，一时江阴监狱关满工农运动的骨干。孙选被迫转移到无锡，改名王津民，任中共无锡县委书记兼代无锡地委书记。陈叔璇和其弟蒋云（陈叔文）避居乡区。

正在西北创建中共甘肃、宁夏党组织的钱振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礼送”出境，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回到上海与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王若飞接上关系，被任为临时省委委员。“八七”会议后，钱振标以中共江阴县委书记、省委特派员身份派回江阴，领导秋收起义。择定东北乡的大镇后塍为突破口，成立以钱振标为司令，茅学勤为副司令的江阴农民革命军，于11月15日、12月21日成功地举行了两次后塍暴动，1928年1月初，在周庄耿家住基召开了中共江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蒋云为书记的新的县委领导机构，并将江阴农民革命军改为江阴红军，在2月26日的杨舍暴动时，亮出了红军的旗号，上海《申报》亦作过披露。江阴农民暴动规模之大，历时之久，震动大江南北。6月，蒋云、朱松寿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7月，江苏省委为加强沪宁沿线各县的武装斗争，建立京沪特委，钱振标任特委的军委书记，即红军总司令。虽然在斗争中孙选、钱振标先后英勇牺牲了，但在困难条件下，毛泽东为江阴革命播下的火种并没有止熄，而是薪尽火传，蓄势待发。

（作者：原江阴市文化局调研员）



注重考证提高《江阴市军事志》质量

徐泉法

去年秋天,我应邀参与《江阴市军事志》的编纂工作。在一年多时间里,把上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江阴人民革命史》和《江阴市志》翻了个烂,在广泛汲取其史料营养的同时,也发现了书中的某些史实错误。现在择要记下来,希望引起史志界的注意,不要再重复这些错误,以不断提髷新编史志著作的质量。

一、放进篮里的菜该不该拣一拣

我最早见到的军事志已经是初审稿,不久又打出了复审稿。最早参加军事志编纂的几个人,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从讨论提纲、收集资料到编写文稿、打印成册,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其中两位七旬以上教育界前辈,遇难而上,不辞劳苦,呕心沥血,令人钦佩。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怎样鉴别史料的真假,剔除不实资料。在讨论时有一个问题比较敏感,就是从《江阴人民革命史》、《江阴市志》等已出版史志著作中吸收过来的史料,是否也要核实鉴别。这是前志的编写者们已经核实过的史料,难道还存在不真实的记载吗?而且,如果真要核实,那需要多大的精力和多长的时间呀!在讨论时,我们举

了一个实例,就是《江阴人民革命史》和《江阴市志》记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0 兵团先头部队横渡长江的时间(1949.4.21 凌晨)和江阴要塞国民党官兵起义时间(1949.4.21 凌晨),经党史界反复核实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记载,正确的时间分别是 1949 年 4 月 21 日傍晚和 4 月 22 日凌晨。这个实例告诉我们,1991 年出版的《江阴人民革命史》和 1992 年出版的《江阴市志》,限于当时的种种局限,确实存在少量的错误记载。现在编纂《江阴市军事志》,完全有责任对来自上述史志著作的史料逐一考证核实,发现和剔除可能存在的不正确记载,借以保证新编志书的质量和对历史负责。有人风趣地说,即使放进篮子里的菜,回到家还应该拣一拣,把夹杂里边的杂草枯叶挑出来,这完全符合生活常识。负责军事志编纂的江阴市人武部领导同意我们这样做。认识统一以后,我们就投入这一“挑挑拣拣”的工作。

二、典型错误实例分析

- 抗战初期,江阴存在两道长江封锁线吗?
- 在《江阴市军事志》的初审稿、复审稿所立

历史研究



“江阴江面阻塞作战”一目中，都记载 1937 年 8 月，在江阴江面由国民党海军部构筑了两道封锁线，一道在江阴长山至靖江罗家桥港江面，另一道在“双山沙最狭处”。对此，军事志编辑室工作人员从未产生过怀疑，推而广之，江阴史志界也从未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而且，我们从《江阴市志》25 页查到了依据：1937 年“8 月 12、13 日，海军部长陈绍宽抵江阴，监督 12 艘旧军舰、23 艘商船，在长山江面和双山沙江面横江自沉，构成水下封锁线两道”。《暨阳档案——江阴人文掌故》96 页也作了相同的记述：“第一道封锁线在江阴长山到靖江芦家桥的江面下，第二道封锁线在双山沙江面的最狭处”。而更让人觉得不可动摇的是《沙洲县志》632 页的记载：“民国 26 年 8 月，国民党政府海军部为配合陆军拱卫南京，保卫长江运输线，实施沉船封江，设封锁线两道：一道在长山江面，一道在双山沙最狭处”。上述 3 书都是权威史志著作，《江阴市军事志》采纳两道封锁线之说，决无半点风险。但是，我隐隐有所怀疑，原因有二，一是 2003 年 9 月我前去江西彭泽考察马当要塞遗址，当地史志工作者介绍 1938 年国民党海军部在此构筑一道长江封锁线，借以阻止日本海军溯江西上进犯武汉。马当要塞只设一道封锁线，江阴要塞为什么会设两道呢？二是双山沙是江中之岛，岛南为南汊，岛北为长江主航道，封锁线设在“双山沙最狭处”，没有具体写明是“南汊”最狭处，还是岛北主航道最狭处？或者是南汊和主航道的最狭处都设封锁线？这两个疑问，最有说服力的主要是第二个疑问。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查到“双山沙最狭处”之说的资料源头。

资料堆积如山，茫茫如海，要查到“双山沙最狭处”的源头，并非易事，而且军事志编纂的时间又紧，不可能旷日持久地去查找。编辑室多次准备放弃考证，照抄前志，既省时间，又省精力。正在动摇之际，得到江阴市委办公室徐建平的支持，他将 10 多年前编纂《江阴市志》时抄录的军事资料卡片借给我使用，这样缩小了查找范围，很快查到“双山沙最狭处”的最早源头是 1982 年 10 月内部出版的《江阴文史资料》第 3 辑沈松寿的一篇文章，该文题为《抗战时期长江水下封锁线》，文中写道：“八·一三上海炮火打

响后，江防司令部就动员了几百名船工构筑水下封锁线两道：第一道在江阴长山到靖江芦家桥，第二道在双山沙最狭处。”经过反复比对，可以认定《江阴市志》、《沙洲县志》、《暨阳档案》在记述第二道封锁线“双山沙最狭处”的最早资料依据就是沈松寿的这篇文章。

沈松寿的这一结论能否站住脚呢？由于沈的文章不是第一手资料，必须查找当年构筑长江水下封锁线的第一手资料来印证。在《南京保卫战》一书中，刊登着七八位当年参与构筑水下封锁线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他们分别是原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海容舰舰长欧阳景修、宁海舰前段指挥陈惠、第二舰队司令部副官刘崇平、江阴要塞司令部探照灯台台长杜隆基等，都说到在江阴长山江面构筑一道长江封锁线，没有一人提及在双山沙还建有第二道封锁线。接着又查到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马骏杰《指挥江阴血战的海军名宿陈季良》一文^①，该文对当年构筑江阴长江封锁线的时间、地点及具体经过都有详细记述，比如写到地址时是这样说的：“选定的封锁位置，位于福姜沙（现名双山沙）上游 6 公里，南岸长山和北岸罗家港之间，这里长江狭窄，设有炮台，可以控制下游水道。”该文清楚地记载在江阴长江江面，只构筑一道封锁线。可以说，这是一篇在占有许多档案资料写成的权威学术文章，应该是可信的。为了谨慎起见，我又自费购置《民国大事日志》，从中查到 1937 年 8 月 13 日中国海军在江阴长山港江面建成“第一道长江封锁线，以阻敌舰上驶”。^②这样，我们把收集到的 10 余份权威资料与沈松寿的那篇短文对比，发现沈松寿当年既不是构筑江阴长江封锁线的参与者，解放后又不是研究江阴国民党抗战的专门学者，他所写的在“双山沙最狭处”建有封锁线，可信程度不高，应予舍弃。这是我们在编纂《江阴市军事志》过程中对前志纠误取得的一个重要收获。如果盲目相信前志记载不会错的话，那么，“双山沙最狭处”那条并不存在的长江封锁线，在江阴、张家港两地的史志著作中，或许还会长时间地存在下去。

2、解放初江阴军管会成立日期到底是哪一天？

如果留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江



阴军管会成立日期的话,那么可以发现,成立日期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1949年4月22日下午,这是《江阴人民革命史》上的记载^③。这一说法的出处至今还没有查到,但对江阴解放这段历史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解放军31军是4月22日下午4时占领江阴县城的,当时军情紧迫,仓促间立即成立江阴军管会是不可能的。第二种说法是4月25日,这是《芙蓉春秋》上的记载^④。这一说法有当年担任江阴县委副书记焦康寿的回忆作依据,而且4月25日是江阴人民政府正式对外办公的日子,在这天成立江阴军管会的可能性较大。不过,焦康寿的回忆在日期上没有完全确定是4月25日,还拖带了4月26日。这说明4月25日只能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日子^⑤。第三种说法是4月28日,这是《江阴市志》、《澄江志》上的记载^⑥。这一说法有江阴市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原始档案为依据,全文如下:“谨启者:本会奉命成立,业已于四月廿八日正式开始办公,兹附去本会各种印信印鉴一份请存照。此致 江阴县委员会 江阴要塞区军事管制委员会 四月廿八日”。加盖的印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区江阴要塞区军事管制委员会”。那么,1949年4月28日是不是江阴军管会成立的正确日期呢?依然不能完全确定,从上述档案的文字看,这一天应该是江阴军管会“正式开始办公”的日子。

现在,我们来看《江阴市军事志》(复审稿)是怎样记载江阴军管会成立日期的呢?在“复审稿”39页上有这样一行文字: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阴要塞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很显然,这是采纳《芙蓉春秋》上的记载。上文已经交代,这一日期是当年担任江阴县委副书记焦康寿回忆出来的,许多事实证明,在事隔几十年后,当事人回忆的日期不太可能十分精确。曾经当面采访过焦康寿的党史工作者李正昌,在综合各种资料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后,“认定江阴军管会成立于1949年4月26日,而不是4月22日,于4月28日正式开始办公”。^⑦我在1983~1984年间与李正昌共过事,当时他担任江阴县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工作一丝不苟,治史严谨负责,他所下的结论应该是最接近实际成立日期的,如果不能发现当年成立

江阴军管会第一手资料的话,那么,认定4月26日成立要比4月22日、25日、28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怎样找到60多年前的有关江阴军管会成立日期的第一手资料呢?我从李正昌所写的《解放初期的江阴军管会》知道,当年参与讨论成立江阴军管会的有三野副司令员粟裕、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三野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瑞龙以及陈锐霆、张凯、唐君照、纪乐天、焦康寿、刘孟溪、王鹏等人,如果能够找到他们中一人或几人当年所写日记,那么,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一天,我看到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渡江战役》一书,收录了刘瑞龙《我的日记——淮海、渡江战役支前部分》,心里非常惊喜,于是仔细查找有否写到江阴军管会成立的经过。谁知,一连翻阅几遍,都没有发现所需要的资料。从本书所加编者注里,我才知道,刘瑞龙的日记“选入本书时作了部分删节”。要解决问题,还必须找到刘瑞龙的这本书。经过一番曲折,我终于购买到了这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的《我的日记——淮海、渡江战役支前部分》,很快就查到了江阴军管会的成立日期。书上是这样记载的:(1949年)“4月27日 江阴江阴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张凯同志为主任,刘孟溪为副主任,下设各部。开始工作的方针是军事管制与解决军事供应要结合起来。……”^⑧直到这时,困扰江阴史志界数十年的江阴军管会成立日期,终于得到了圆满的答案。为考证这个问题,虽然花费了许多精力与时间,但与收获来比,那是非常值得的。

3、江阴史志著作记载的粟裕视察黄山炮台的时间一定正确吗?

《江阴市军事志》(复审稿)记载“三野副司令员粟裕视察黄山,并接见要塞起义有功人员”的时间是1949年4月24日。江阴史志界对此记载从未产生过什么疑问,因为打开本地任何一本史志著作,几乎都是这样记载的。我们先查《江阴市志》: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前委委员张爱萍,中共华中市委书记陈丕显,由特种兵司令陈锐霆陪同,视察黄山炮台,接见江阴要塞起义有功人员”。^⑨再查《江阴人民革命史》:“4月24日,人



民解放军三野副司令员粟裕视察了黄山，接见并表扬了唐秉琳等策动起义的有功人员。”¹⁰又查《暨阳档案》，也记为粟裕等人在陈锐霆陪同下于1949年4月24日视察黄山炮台，接见江阴要塞起义有功人员¹¹。我多年从事史志内容的考证工作，一般都是从怀疑开始的。可是，几本地方史志著作在粟裕视察黄山炮台的时间上保持高度一致，我自然没有怀疑的理由。如果没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决不会去改动粟裕视察江阴黄山炮台的时间的。

2010年4月的一天，江阴市人武部接待了从北京来澄旅游的老干部鞠开。鞠开从1948年至1962年曾担任粟裕的秘书，对粟裕在渡江战役期间的军旅生涯十分熟悉。他听说市人武部正在编纂《江阴市军事志》，就对陪同他的江阴市人武部军事科科长祁林说：1949年4月25日，粟裕一行从靖江南渡江阴，登山视察黄山炮台，并接见要塞起义有功人员，建议将此载入军事志。第二天，祁林就向军事志编辑室转告了鞠开的建议，并附上一张整理好的文字。我们一看，发现与原来记载的时间迟了一天，要求祁林与鞠开核对。几天后，鞠开从北京打电话给祁林说：“1949年4月24日白天，粟裕还在泰州白马庙，晚上才到达靖江县城，24日怎么可能视察黄山炮台呢？”接着又嘱咐说：“我著有一本《在跟随粟裕的日子里》，可以让军事志编辑人员看一看。”听鞠开的口气不容置疑，我们应该冷静地去考证核实。让这位80多岁的老干部亲自寄书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可是编辑室又没有这本书，我决定自己购置一册。10多天后，我收到了书，打开一看，在1949年4月25日日记中，有如下文字：“上午，粟裕首长率三野指挥机关，离开靖江县城，和陈丕显、张震、钟期光同志一道在大雾弥漫中，乘汽艇由八圩港渡江，到达对面的江阴县城，住在原国民党要塞司令部。”¹²为了印证鞠开日记的真实性，我又查阅了《粟裕年谱》：1949年4月25日，粟裕“率领三野指挥机关离开泰州白马庙渡江南下，途经江阴时接见策动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唐秉琳等同志。”¹³后来，我在《陈丕显在苏南》等著作中，又查到粟裕、陈丕显、张震等领导人确是在4月25日渡江前往江阴，于是在《江阴市军事志》中修改了

粟裕视察黄山炮台的时间，定为1949年4月25日。到此，可以肯定地说：《江阴市志》、《江阴人民革命史》等史志著作所记粟裕视察黄山炮台的时间是错误的。

这里顺便纠正一个错误记载。《暨阳档案》记载三野“特纵”司令陈锐霆在1949年4月21日下午到了江阴要塞黄山总台指挥所¹⁴。不熟悉江阴渡江战役的读者如果引用此说，那就会以讹传讹。其实，江阴对岸10兵团开始渡江，要到4月21日傍晚7时30分后，这天下午10兵团尚未发动渡江，江阴要塞国民党官兵还没有起义，作为三野“特纵”司令的陈锐霆是决不可能前往黄山总台指挥所的。在编纂《江阴市军事志》时，我看到陈锐霆的一份手迹复印件，上写：“记得我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二日午前和胡炳云军长梁灵光参谋长同船过江的。”笔者经过考证，认为应该以陈锐霆所记时间为准。

4、申港、八圩港国民党官兵是投降还是起义？

《江阴市军事志》记载1949年4月22日在渡江战役中，除江阴要塞国民党官兵起义外，还有两支国民党陆军部队举行起义，其一是国民党21军230师少将师长骆周能在申港率部2000余众起义，其二是国民党21军145师驻守长江北岸八圩港所部官兵起义。我经过核对，发现江阴几部史志著作对这两支军队起义一事并无记载。于是扩大查找范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查到，我28军在攻占申港战斗中，“以3个团前后夹攻申港守敌，歼其两个团，俘第230师少将师长骆周能以下2000多人。”¹⁵在《靖江人民革命斗争史》、《靖江县志》上查到，在渡江战役中，靖江八圩港口守敌国民党21军145师投降¹⁶。应该说，所查的3部著作都是很权威的党史、军史、地方志，但与《江阴市军事志》所记事件性质完全不同，前者记为“俘”，后者记为“降”，都没有记为“起义”。因此，必须认真对待。

那么，《江阴市军事志》所记两支国民党军队起义，它的资料依据是什么呢？

先说21军230师少将师长骆周能在申港率部起义的资料依据。2005年12月团结出版社出版《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册）



1801~1802页,明确写道:骆周能“1948年1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二三〇师少将师长。1949年4月率部于江苏江阴起义,是年9月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学习。”2007年1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民国人物大辞典》(下册)2594~2595页明确记载:骆周能“1949年4月,率部在江阴起义”。

再说21军145师驻守八圩港部队起义的资料依据。2005年7月22日,《现代快报》发表专访抗日老兵陆人达题为《中国海军血战长江卫国魂》的长篇报道,后附“新闻人物陆人达”,在230余字的介绍中,专门写到“1949年4月22日,陆人达所在部队在苏北靖江县起义”。如果说《现代快报》报道所说“陆人达所在部队”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口述淞沪抗战》(一)刊登的“陆人达的《起义人员证明书》”就写得十分具体的了:“陆人达同志,原系国民党军队陆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四三五团通讯兵连连长,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在苏北靖江县起义,特此证明。”¹⁰与《靖江人民革命斗争史》对照,就可知道国民党军145师在渡江战役前驻守于靖江县八圩港。这样认定“陆人达所在部队”即1949年4月驻守于江阴对岸八圩港的国民党军145师。

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采纳“起义”的资料,还是“俘虏”、“投降”的资料呢?经过研究,决定采纳“起义”的资料。这是因为有关“起义”的资料,产生的时间比“俘虏”、“投降”的资料晚得多,其中的道理大家都会明白。比如某人被司法机关判了刑,几年后司法机关撤销了对此人的判决,我们难道还能说某人曾经判过刑是个犯罪分子吗?当然不能这样说了。到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申港、八圩港国民党官兵在1949年4月22日举行起义,而不是投降。

5、对罗瑞卿视察江阴黄山的时间是怎样产生怀疑的?

1998年11月出版的《芙蓉春秋》51页记载:196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来江阴视察。”这一内容属于《江阴市军事志》收录范围,因此,在2009年6月打出的初审稿上,有这样的记载:1963年4月,“罗瑞卿总参

谋长来江阴视察。”这样有根有据的资料,怎么还会产生怀疑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无锡市志》看到一条大事记:1964年12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抵无锡视察¹¹。一般情况下,《无锡市志》的记载并没有充足的、必然的理由可以肯定《芙蓉春秋》的记载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持保守的、懒于深究的心态,绝不会对《芙蓉春秋》记载的这条大事记进行考证研究。但是,我们想到正在编纂的《江阴市军事志》是一部由江阴市人武部负责、江阴各大驻军单位合作编纂的军事著作,出版后人们会将其视作权威的官方志书阅读与应用。如果记载的内容不符合历史真实,那么必然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参与编纂的人就对不起历史,对不起读者。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决定努力核实《芙蓉春秋》上的这条大事记是否真实。

首先,要知道《芙蓉春秋》这条大事记的来源。在市史志办地方志科副科长纪晓华的帮助下,我们复印到了多年前内部打印的《江阴市公安志》部分大事记,上面记载:“196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来江阴视察,当天离澄。县公安局按上级安排做好警卫工作。”¹²经过分析比较,可以看出《芙蓉春秋》上的内容来源于《江阴市公安志》。那么,编纂《江阴市公安志》的时候,这一内容来源于档案资料还是有关人员的回忆资料呢?如果是档案资料,必然会记到某一日,这条大事记只记到年、月,因此很大可能是个人提供的回忆资料。而回忆资料对某一事件发生的年、月、日比较容易记错。分析到这里,我们初步认为,《芙蓉春秋》上所记罗瑞卿视察江阴在时间上可能搞错了。

我们猜想,《罗瑞卿传》上可能会有视察江阴的具体记载。于是,我购买了《罗瑞卿传》、《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等传记书籍,却并未查到1963年4月罗瑞卿视察江阴的记载,只记着1964年12月5日罗瑞卿在南京。联系到《无锡市志》所记1964年12月7日罗瑞卿视察无锡,我们分析,1964年12月上旬罗瑞卿就在江阴周边进行视察活动,或许就在这几天内到过江阴。后来,军事志编辑室负责人符银芬直接打



电话给远在北京的《罗瑞卿传》作者之一张明哲请教，回答说：1964年12月6~9日，罗瑞卿视察太湖北走廊地形，其中的某一天视察了江阴黄山。这让我们很是兴奋。第一，证实了我们原先的分析是正确的。第二，我们可以放心地记上1964年12月6~9日中某一天罗瑞卿视察江阴黄山地形。为感谢张明哲对我们的帮助，军事志编辑室擅长书法的李春才挥毫书写了“黄田港口水如天”、“江阴天堑望无涯”等两幅作品，用特快专递邮寄北京。

三、考证纠错的几点体会

在编纂《江阴市军事志》过程中，我们对本地出版的史志著作所载史实核对了上百例，最后能够证实其错误的也有数十例。遵照江苏省军区姚金汝主编的指示，我们对纠正本地史志著作有代表性的史实错误以“编者注”的形式，简要说明考证经过及纠正这些错误记载的重要依据。这样做有利于读者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有利于他们继续深入考证与研究。我们认为，由于注重了考证，纠正了已版史志著作上的史实错误，客观上提高了这部军事志的质量。在考证纠错工作中，我们积累了几点肤浅的认识，如实记录于下，与史志界的同仁共同探索研究。

第一，我们分析了前志出现史实错误的原因

一是采纳的资料失实，史志编纂者又未能发现其错误。如1937年8月在“双山沙最狭处”构筑长江水下封锁线，其资料来源仅是沈松寿的个人回忆，在缺乏其他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就记载入志，结果出现了错误。二是个人回忆在具体的时间上容易出错。如江阴军管会成立时间，在已版史志著作中屡次未能正确记载，主要是采纳了个人提供的资料。试想，一个人要把几十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凭记忆正确地说出发生在何年何月何日，在许多情况下是做不到的。编史修志，应该注重使用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才能提高所记历史的正确率。当然，档案资料也有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记载，如“大跃进”年代的各种数据往往不可靠，但这仅是个案。三是采用的资料落后于时代。以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21军230师师长骆周能在申港是被俘虏还是起义就是典型一例。由于政

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不同，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评价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我们还是采纳原先的结论，那么所编纂的史志著作自然就跟不上时代了。从这个角度说，编史修志同样需要与时俱进，不能习惯于用几十年前的老眼光去看问题，选资料，写文章。

第二，编史修志应该注重核实与考证

编史修志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对收集来的资料，特别是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各种史志著作，常常是照搬照抄，这样做自然可以节省许多时间，而且总以为有根有据而感到满足。其实，无论是古代的地方志，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包括党史著作、文史资料，都有可能存在史实错误。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江阴史志错载渡江和要塞起义时间，曾经影响了许许多多读者，在他们的著作或文章中一次又一次地无意识地传播着错误的时间。即使像以严谨著称的家谱，同样也存在少量的错误记载。如解放前问世的南闸《里湾吴氏宗谱》，在《海军少将吴君煦泉传》中，说吴煦泉去广州晋见孙中山，孙中山委任吴为永丰舰（中山舰前身）舰长。为核实这一史料，我购买了《中山舰传奇》、《广州军事志》等书籍，从家中带去了《孙中山年谱长编》，查到永丰舰自1917年9月至1924年历任舰长的姓名，他们是魏子浩、毛仲芳、冯肇宪、常光球、欧阳琳^③，并没有吴煦泉任永丰舰舰长的记载。于是在编写《吴煦泉》传略时，不得不舍去吴煦泉曾任永丰舰舰长之说。还有要注意的是，在编写史志著作初稿时，一定要注明资料的出处，否则初稿编成之时，各部分的资料来源编纂者往往说不出来，对核对带来诸多困难。如《江阴市军事志》初审稿上，有一目题为《首次炮击日本海军》，上写1937年8月13、14、15日，中国海军在江阴长江江面上击退日军10艘军舰、数十架飞机的联合攻击。由于编写时没有注明资料出处，给核实带来很大困难。花了许多时间，才查到此说来源于《江阴文史资料》（第9辑）发表的瀛云萍文章《我参加江阴要塞抗战的回忆》。此文能否站住脚呢？我们查阅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等权威著作，均无此记载。其实，上海“八·一三”抗战刚刚爆发，日军不可能把战



场立即移到江阴这边来。经综合分析,否定了这一目的史料真实性。

第三,对历史的认识与把握不可能通过编一本书就全部完成

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尤其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历史,今人要认识它并非容易。我们通过种种努力收集到的资料,其中也有一小部分并不是历史的真实面貌。加上受到编纂人员的许多局限,最终编纂出版的史志著作,不太可能全部地展现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谁也无法保证某部志书没有重要遗漏,所记史料百分之百地正确。有了这样的认识,当读者发现某方面史料错误或记载不当时,编纂者就容易接受,不会对提出批评的人不满意乃至耿耿于怀。而且,发现某部史志著作存在错误,也不一定会降低编纂者的学术地位。例如上面提到的《芙蓉春秋》错载罗瑞卿大将视察江阴黄山的时间,作为该书主编的我,并没有同提出疑义的人去争吵。虽然1997年至1998年参与该书编纂的各位党史同仁都尽心尽力,但我们无法对每一条史料都从源头上去核实。如果要这样做,决非近2年时间就能完成的。相反,因为现在没有机会发动社会力量去发现和纠正《芙蓉春秋》上的错误史料,我倒是引以为遗憾的。事实上,对史志著作上的错误史料能否发现,发现后能否提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衡量一个地区史志著作普及的程度和鉴别史料真伪的水准。以1912年10月19日孙中山视察江阴要塞为例,因为章砚春1962年在《江阴县地方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发表《孙中山先生莅澄记》,把孙中山乘坐的联鲸舰写成“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路过江阴,检阅黄山要塞炮台”,以后江阴方面的文章,包括20年后内部出版的《乡土教材》,都沿续“顺流而下”说^②。这说明在这20年间,江阴的文史爱好者只是引用章砚春文章的史料,而未能去挖掘、考证和研究孙中山视察江阴要塞的新史料,因而未能将章砚春错记的“顺流而下”纠正为“溯江而上”。为了让江阴的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近一个世纪前孙中山视察江阴要塞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这次编纂《江阴

市军事志》,我们不仅按《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原样全文刊载孙中山《在江阴各界欢迎会的演说》,而且还全文收录了1912年10月24日《民立报》上发表的《孙先生西行记》。

当《江阴市军事志》送上级军事部门审核之际,我们并没有完全感到轻松,一个重要的感觉笼罩全身,那就是我们对本地军事历史掌握得太少了,在丰富多彩的长达数千年的江阴军事历史面前,我们参与编纂该志的每一个人,都只是一个小学生。

(作者:江阴市史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注释:

- ①《文史天地》2005年第6期14~18页;
- ②《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566页;
- ③、⑩《江阴人民革命史》203页、199页;
- ④《芙蓉春秋》4页;
- ⑤、⑦李正昌:《解放初期的江阴军管会》,见《江阴文史资料》第24辑226~229页;
- ⑥《江阴市志》31页,《澄江志》22页;
- ⑧刘瑞龙:《我的日记——淮海、渡江战役支前部分》245页;
- ⑨《江阴市志》31页;
- ⑪、⑭《暨阳档案——江阴人文掌故》144页,143页;
- ⑫鞠开:《在跟随粟裕的日子里》202页;
- ⑬《粟裕年谱》453页;
- 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342页;
- ⑯《靖江人民革命斗争史》180页,《靖江县志》27页;
- ⑰陆人达:《挥不去的痛》,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口述淞沪抗战》(一)55~64页;
- ⑲《无锡市志》(第一册)72页;
- ⑳《江阴市公安志》(内部打印稿)16页;
- ㉑《广州军事志》52页:《护法舰队各时期舰长姓名表》;
- ㉒《乡土教材》77页。



清道光七年(1827),苏州刻《沧浪亭五百名贤像》。

孔继尧绘,石蕴玉正书赞,谭松坡镌。
延陵季子为“五百名贤”之首,任延亦名列其间。

日前翻阅资料,看到《后汉书》上有“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之语,可以说,这是笔者现见有关“季子祠”最早的记载了。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后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一语出自《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的《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

现在我们一起看一下《后汉书·循吏列传》有关任延的部分记载:

任延字长孙,南阳宛人也。年十二,为诸生,学於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值仓卒,避兵之陇西。时隗嚣已据四郡,遣使请延,延不应。

更始元年,以延为大司马属,拜会稽都尉,时年十九,迎官惊其壮。及到,静泊无为,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



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掾吏贫者，辄分奉禄以赈给之。省诸卒，令耕公田，以周穷急。每时行县，辄使慰勉孝子，就餐饭之。

吴有龙丘苌者，隐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时，四辅三公连辟，不到。掾史白请召之。延曰：“龙丘先生躬德履义，有原宪、伯夷之节。都尉埽洒其门，犹惧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谒，修书记，致医药，吏使相望于道。积一岁，苌乃乘诣府门，愿得先死备录。延辞让再三，遂署议曹祭酒。苌寻病卒，延自临殡，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贤士大夫争往宦焉。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任延是个神童（任圣童），十二岁时，他就成了太学的学生；十九岁，就担任了会稽都尉一职。他上任后，别的事都没干，第一件事就是去季子祠祭祀延陵季子。还聘请了董子仪、严子陵等人，并以师友之礼相待。部属有贫难，他总是分出自己的俸禄救济他们。他裁减士兵，要他们耕种公家的田地，以便周济穷困之人。他每次到各县巡行，总是派人慰问孝子，并招待他们吃饭。

《后汉书》中还特意记载了任延拜访龙丘苌的故事：

龙丘苌是吴中名士。王莽篡汉时，就曾拒绝征召。任延尊重龙丘苌，视之为原宪、伯夷那样的高士，所以没有冒然征召，而是很恭敬地上门慰问，施医赠药。一年以后，龙丘苌主动拜见任延，表示自己愿意出仕、发挥余热。龙丘苌到任不久就去世了，任延又亲自前去灵前祭祀，三日没有升堂办公。从此以后，因此郡中贤能的士人都积极入仕了。

从任延礼遇龙丘苌的故事可以看出，任延的高士是非常尊重的，也因此得到了高士的认可。熟悉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严子陵在东汉建立后拒绝光武帝征召的故事，但他却原因在动荡的更始年间接受任延的聘请，这也足见任延的魅力。

任延事迹另见于《东观汉纪》，原文如下：

任延，字长孙，南阳宛人。更始拜为会稽西部都尉，年十九，迎吏见其少，皆惊。及到，澹泊无为，下车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时天下新

定，道路不通，诸避世江南者皆未还，会稽多士。延到，皆礼之，聘请高行俊乂董子仪、严子陵等，待以师友之礼。行县所到，辄使劳孝子，崇礼养善如此。建武之初，上书言：“臣贊拜不由王庭，愿收骸骨。”诏书征延，民攀持轂涕泣。

《东观汉纪》是由东汉官纂修的本朝纪传体史书。东观是洛阳宫殿中藏书、修史之处，故名。所记之事，起于光武，终于灵帝。编写始于汉明帝永平五年（62），到魏文帝黄初六年（25），历时约163年。经过班固、刘珍、边韶、蔡邕等数十位学者的努力，先后分4次撰修而成。《东观汉纪》在魏晋时，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其后，随着《后汉书》的流行，才逐渐散佚。清代姚之马因开始辑佚，仅成八卷。保存了范晔《后汉书》里所没有的材料，对范书有补充、参证作用。

《东观汉纪》的记载，比起《后汉书》，在某些细节上更为具体。比如《后汉书》只说任延出任“会稽都尉”，而《东观汉纪》则明指为“会稽西部都尉”。再比如，《后汉书》只说“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而《东观汉纪》则指出“下车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这对考证季子祠的位置和汉代祭祀季子的规模，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会稽郡始置于秦代，郡治吴县（今苏州），辖春秋时长江以南的吴国、越国故地。汉初为韩信楚国所领，后属刘贾荆国、刘濞吴国。七国之乱后，复置会稽郡。汉成帝时领二十六县，人口逾百万，为当时辖境最为广阔的一郡，隶属于扬州刺史部。东汉中期，分北部十三县置吴郡。会稽郡治所移至山阴（今绍兴），领十五县。三国吴时分会稽郡置临海郡（今浙江东南）、建安郡（今福建）、东阳郡（今衢州、金华一带）。西晋初会稽郡领十县，仅辖今绍兴、宁波一带。此后至南朝末年，会稽郡辖境不变。唐肃宗时改为越州，会稽郡不复存在。

以下为西汉会稽郡领县一览表，这一建制延续至东汉初年。此时为更始元年，仍为西汉旧制。

会稽郡郡治在吴县（今苏州），由东部都尉（亦称南部都尉）和西部都尉协助分别管理会稽郡的东南部和西北部。东部都尉、西部都尉的治所，史书犹在；而他们的辖区，史书无载。根据会稽郡建制可以推测，吴县以西的无锡、毗陵、曲



阿、丹徒等，应该都属于西部都尉所辖。

那么，任延祭祀的是江阴的季子祠呢？还是丹阳的季子庙呢？

我们不妨做如下分析：

一、释“祠”

《后汉书》作“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东观汉纪》作“下车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祠”都用作动词，意为前往祭祀。

《说文解字》：“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从示司声。仲春之月，祠不用牺牲，用圭璧及

县名	县治所在地	王莽改名	备注
吴县	江苏省苏州市市区内	泰德	郡治。东汉顺帝时入吴郡。
曲阿县	江苏省丹阳市一带	风美	旧为云阳县，顺帝时入吴郡。
乌伤县	浙江省金华市境内	乌孝	
毗陵县	江苏省常州市境内	毗坛	旧为延陵县，顺帝时入吴郡。
余暨县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境内	余衍	
阳羡县	江苏省宜兴市境内		顺帝时入吴郡。
诸暨县	浙江省诸暨市境内	疏虏	
无锡县	江苏省无锡市境内	有锡	顺帝时入吴郡。
山阴县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境内		故越王勾践之都城，在会稽山之北，故名山阴。东汉移郡治于此。
丹徒县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丹徒镇		顺帝时入吴郡。
余姚县	浙江省余姚市境内		
娄县	江苏省昆山市一带	娄治	顺帝时入吴郡。
上虞县	浙江省上虞市境内	会稽	
海盐县	浙江省平湖市一带	展武	旧为武原乡，有盐官。顺帝时入吴郡。
剡县	浙江省嵊州市境内	尽忠	
由拳县	浙江省嘉兴市境内		顺帝时入吴郡。
大末县	浙江省衢州市境内	末治	
乌程县	浙江省湖州市境内		顺帝时入吴郡。
句章县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王家坝村		
余杭县	浙江省杭州市市区内	进睦	顺帝时入吴郡。
鄞县	浙江省宁波市境内	谨	
钱唐县	浙江省杭州市市区内	泉亭	西部都尉治。有武林山、武林水。顺帝时入吴郡。
鄮县	浙江省宁波市境内	海治	
富春县	浙江省富阳市境内	诛岁	顺帝时入吴郡。
冶县	福建省福州市市区内		闽越故地。
回浦县	浙江省台州市境内		东部都尉治。东瓯故地。



皮巾。似兹切。”可见，祠的本义就是“春祭”，其后衍生为“供奉鬼神、祖先或先贤的庙堂。”

那么这里是本义还是衍生义呢？笔者认为是衍生义。原因有二：

其一、《说文解字》谓“祠不用牺牲”，而任延用中牢。按照颜师古的观点“中牢即少牢，谓羊豕也。”牛、羊、豕为“三牲”，祭祀时全用称“太牢”，只用羊、豕称“少牢”。任延用少牢祭祀延陵季子，与“祠不用牺牲”不符，所以这里的“祠”并非本义，应理解为“前往季子祠祭祀”。

其二、一作“遣馈礼”，一作“遣吏”，证明任延祭祀延陵季子，是派遣下属官吏、带着祭品前往季子祠祭祀。因为会稽西部都尉的治所在钱唐，与延陵相去甚远。任延刚刚到任，不便抽身，才会请人代劳。如果不是专程前往季子祠祭祀，而是随便搭个台，祭祀一番的话，就可以亲自祭祀了，不比派遣下属官吏代劳。

综合以上两点，任延到任后，即派遣下属官吏、带着祭品，前往江阴季子祠祭祀。祭祀所用牺牲为少牢，由此可见任延对延陵季子的尊崇之心。

二、释“延陵”

唐汉章、程以正两位先生合写的《季札葬地考》指出：

依据《路史》、《元和郡县志》、《常州府志》等书的记载可知：古延陵就是今天的常州，在春秋时称为延陵，汉时称毗陵，东晋时改称晋陵，隋时改晋陵郡为常州。至于镇江丹阳的延陵镇，其来历如下：西晋太康二年（281）分曲阿县而置延陵县，唐时为县治所在，宋时废县而为镇名。由此江阴（秦时属会稽郡延陵乡）称为延陵要比丹阳的延陵早整整500年。

《后汉书》和《东观汉纪》皆成“延陵季子”，

而此时正值两汉之交，尚无丹阳延陵之名，“延陵”一词，乃因袭延陵古邑之旧。此时寻找季子祠，必然是在延陵古邑的范围之内，不大可能前往几百年后才出现的丹阳延陵去寻找季子遗迹。

三、明先后

刘徐昌先生的《江阴延陵季子墓与十字碑撷谈》指出：

记载历代都有，而记载最早的是《皇览》一书。《皇览》成书于三国时期的220年~226年间，是魏文帝曹丕命刘劭、王象、桓范等人编撰的一部大型类书，是专供皇帝阅读的书，故称“皇览”。其记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至今吏民皆祀之。”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其墓在毗陵县的暨阳乡，而且官吏、百姓一直祭祀延陵季子。由此可知，季子祠最晚也应在三国以前就建立而成了，否则，人们就不可能将祭祀吴季子的活动形成习俗了。而有人认为江阴季子祠始建于东晋明帝太宁（323~326）年间，显然，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

由此可知，有关江阴季子祠明确的记载，早的约在220~226年之间，晚的也在323~326年之间。而有关丹阳季子庙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殷仲堪的《谒季子庙碑》，殷仲堪是孝武帝时人，约在373~396年之间，远远晚于江阴季子祠。而殷仲堪文中谓“讯遗踪于故老”，并未谈及季子墓。由此可以推知，丹阳季子庙是后世追慕先贤的场所，而江阴季子墓、季子祠才是延陵季子归葬之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任延上任后，派人来到江阴季子祠祭祀，这也是笔者所知有关季子祠最早的记载。

（作者：江阴国学研究学者）



江阴近现代名人与无锡的简要关系

朱呈鹏

江阴濒临长江，河道密布，手工纺织业发达，经济繁荣，精英迭出。它于无锡接壤，同为中国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源远流长，关系甚密。在无锡近代民族工商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早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无锡招商局就开办了无锡至江阴的客轮，江阴青旸、顾山、周庄等乡镇每天均有航船驶往无锡。1931年(民国20年)11月1日，锡澄公路筑成通车后，江阴与无锡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民众往来更为频繁、活跃。由此，江阴和无锡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近现代江阴涌现了许多著名人物，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较多江阴名人的成长过程中，因多种原因，均与无锡持有一定的简要关系，往往起着重要作用，留下难忘印象和深厚情谊。其中有的人竭尽全力在无锡经营工商业，或参与江阴与无锡间的商贸活动，交通建设；有的人在无锡认真就读小学、中学、中专、大学；有的人呕心沥血在无锡小学、中学、大学执教，培育人才；有的人在无锡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也有人在革命年代与无锡人志同道合，结为伴侣。综观上述江阴名人，他们为无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影响和推动了江阴经济社会的发展，显现了江阴与无锡的不寻常关系。

为给研究近现代江阴名人和江阴与无锡关

系的学者，以及相关爱好者提供简要资料，笔者依据《无锡名人辞典》，《百年无锡名人谱》，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无锡市东林小学、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等校史刊物，《江阴市志》，《江阴名人自述》，《魂归黄山陵》等书刊，从中择其影响较大的江阴名人，整理成文本，并按名人的不同身份进行分类刊载，以飨读者。

一、实业家

1.钱以湘(1857——1928)原名维崎，江阴城内人。1887年，应浙江湖州南浔顾勉之邀，去无锡鸿桥等地收茧。1889年(一说1890年)代无锡仁昌茧行在江阴青旸设分行，为江阴收茧之始。后在无锡合资开办澄丰缫丝厂。1908年与人集资创建江阴利用纱厂。

2.薛醴泉(1859——1929)，名宝润，以字行，江阴马镇北渚人。早年在上海开设咸康颜料行，专销德商颜料，获得厚礼。为著名“颜料大王”。1904年相继投资上海宝成纱厂(系无锡籍实业家匡仲谋创办)白银150万两、无锡振新纱厂50万两。1921年又投资无锡豫康纱厂50万两银元。

3.姜铭书(1866——1934)，江阴云亭人。1916年在江阴创设云锦布厂。曾开办来往云亭、无锡间“慧源”轮水上航班。

4.吴汀鹭(1870——1961)，名增元，以字行，江阴城内东大街人。1911年与韩燮安等人在江阴开设丰泰源钱庄，与上海、苏州、无锡等地钱



庄互通汇兑。1915年与郑国熙等人创办利澄内河轮船公司，开辟江阴至无锡、武进、常熟及周庄至无锡4条航班。

5.季希三(1872——1950)，江阴城内小庙巷人。幼时就读私塾，后被父亲送至无锡一家绸布店当学徒。他勤奋好学，平时留意学习，积累有关纺织技术，市场和经营方面的知识，后在江阴创办鼎升织布厂等企业。

6.葛凤池(1878——1962)，江阴青旸人。1896年入上海成康号，受托经营靛业，逐年扩大经营范围。后在无锡开设瑞昶润银号，又在青旸设瑞丰润油厂。

7.方寿颐(1888——1925)，江阴祝塘镇北街人。幼年就读私塾，家道清寒。15岁进无锡同和润钱庄当学徒。为人朴实勤勉，深受徽商董事赏识，数年后升任经理。1919年，与薛醴泉、贝润生、薛南溟等人集资140万元，在无锡北郊创设豫康纱厂，他任经理。

8.陈植三(1891——1952)，名纲，以字行，江阴夏港葫桥人。1930年在无锡省立教育学院教授法律，并任该院法律顾问。后与江阴士绅共同组建利澄轮船有限公司，航运于江阴、无锡之间。之后，又参与组建锡澄长途汽车公司。1940年春，与友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布业银行，任副总经理，并在无锡增设分行，以利业务发展。

9.袁国梁(1901——1971)，江阴南闸观山袁家村人。早年毕业于无锡私立公益工商中学，与无锡工商界关系密切。与人创办大通贸易公司、重庆福民面粉厂等企业。

10.邓仲和(1904——1983)，江阴北门外人。早年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今省锡师)肄业。曾在上海创办安乐棉毛纺织染厂，安乐纱厂。

11.唐子谦(1905——1979)，江阴周庄镇西街人。家境贫寒。14岁随父经商，后经营恒顺仁布庄。1942年联合江阴乡镇的钱恒丰、向仁记、协和森等土布商号，在无锡投资丽新纺织厂、福新纱厂、谦和钱庄等，对无锡纺织业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二、专家学者

1.许太和(1877——1938)，江阴北门许巷村人。早年拜当地著名拳师学习拳术，尤精于“仁

义派”少林拳术。1912年起在无锡、江阴小学任教。后在上海东亚体校、无锡私立辅仁中学等校执教。1923年春，代表无锡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武术大会，参加“少林拳术”的比赛，获得优胜成绩。

2.缪海岳(1878——1950)，江阴周庄河东人。曾任青旸中学、无锡私立辅仁中学、无锡美术专科学校等校美术国文教员。自幼酷爱书法，先攻柳、赵，后攻《十七帖》，以草书驰誉江南，国画亦有造诣。

3.周少梅(1885——1938)，江阴顾山人。自幼由其父传授琴技，长于演奏多种民间乐器，尤以二胡最负盛名。1906年，受聘于无锡荡口私立鸿模高等小学校，任国乐指导教员。其后在江苏省立无锡中学、私立无锡中学、省立洛社乡村师范学校等校任国乐教员。与华彦钧过往甚密，相互切磋，合作演奏。

4.陈经(1887——1970)，字谷岑，江阴夏港葫桥人。毕业于苏州优级师范学堂。初聘为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务主任，曾赴日本考察教育。1921年12月至1927年5月，1929年11月至1933年6月，相继任省立三师校长。曾创办省立三师附小，并在无锡洛社创设三师分部(后为省立洛社乡村师范学校)，颇有建树。

5.章绳以(1890——1969)，江阴城内大毗巷人。1905年至1908年在无锡竞志女校小学部求学，曾组织“天足会”，下乡宣传妇女解放。后考取北京女子优级师范学堂。1933年任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兼任竞志女子中学名誉校长。1935年任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劳作师资科主任，后晋升为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竞志女中校长。

6.周毓莘(1891——1952)，江阴璜土镇华庄村人。192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国后，曾任江苏省教育厅督学。1934年7月至1945年8月，任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校长。抗战胜利后，留在上海任中学教员。

7.刘天华(1895——1932)，江阴城内西横街人。1909年考取常州府中学堂。1912年随兄去上海，进开明剧社乐队工作。后因剧社解散，曾在江阴、常州等地中小学及无锡荡口私立鸿模高等小学校任音乐教员。后为著名民族音乐家，



音乐教育家。

8.承淡安(1899——1957),江阴华墅镇弧岱桥人。1920年参加上海中西医函授学习。1925年开始独立行医。1928年在苏州望亭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1930年,该社在无锡堰桥重建,参与研习者数千人,遍及国内和朝鲜、日本等国。1933年扩建成中国针灸讲习所,同年10月创办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针灸刊物《针灸杂志》。1934年秋赴日本考察该国针灸现状和办学情况。回国后,1936年7月创办针灸疗养院。1937年2月中国针灸讲习所更名为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1954年,承淡安任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校长。后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9.陈伯瑜(1900——1958),名宝琨,以字行,江阴长泾镇小庄圩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任长泾中学校长多年。1938年夏创办无锡黄土塘私立怀仁中学,并任校长,直至1951年1月。其间,添办高中,延揽教员,颇有建树,闻名澄、锡、虞三县。

10.王绍曾(1901——2007),江阴璜塘人。1927年起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恩师钱基博(系无锡人,著名文学家)的引导下,开始研究目录学。1930年毕业,由校长唐文治推荐,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后为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11.顾绶昌(1904——2002),江阴月城乡人。1917年夏入江阴礼贤高等小学校。次年转入无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今东林小学)。1919年夏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1936年9月赴英国留学。1938年回国后相继任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对莎士比亚作品颇有研究。

12.沈振家(1904——),江阴青旸人。早年就读于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毕业于东南大学政治系。曾任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训育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地政局顾问。

13.张大煜(1906——1987),江阴长泾镇人。1920年毕业于无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今东林小学)。后毕业于清华大学。他历任大连大学教授、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国防科

委十六院副院长等职。著名化学家,是我国催化科学、胶体化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4.巨赞(1908——1984),俗名潘楚桐,字琴朴。江阴要塞贯庄村人。1927年毕业于江阴师范学校。同年人上海大夏大学就读,其间参加进步活动。1931年春在灵隐寺披剃出家,取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不久,用笔名万钧在李澄原主办、无锡出版的《论学》杂志上发表了《评熊十力所著书》一文,对《新唯识论》提出批评。巨赞将此文寄给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熊十立,他并没有进行反驳,而只是复信说:“是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著名佛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15.金榜(1909——1985),江阴石庄马口村人。早年在江苏省立无锡中学(今省锡师)读高中。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1948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深造。1951年初回国,任山东工业大学教授。

16.吴新谋(1910——1989),江阴人。早年就读于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193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数学系。1937年公费留学法国。1951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17.王承绪(1912——),江阴三甲里人。早年就读于江苏省立无锡中学(今省锡师)师范科。1931年毕业后留在该校实验小学任教。后在浙江大学教育系学习。1938年赴英国留学。回国历任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教授,杭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8.徐中玉(1915——),江阴华墅镇人。1932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无锡中学(今省锡师)高中师范科。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后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文艺理论家。

19.钱保功(1916——1992),江阴城内大毗巷人。1931年至1934年就读于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47年赴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后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科院武汉分院院长。为著名高分子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其夫人华萼,无锡县下塘人,与钱保攻为省锡师同班同学,曾任中科院长春



应用化学研究所保育院院长，多次被评为省、市、区先进工作者。

20.许智宏(1942——)，祖籍江阴澄江镇，出生于无锡城。1956年毕业于无锡私立积余初级中学。1959年毕业于无锡市第二中学(今辅仁高级中学)。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随后，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为著名植物生理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三、革命烈士

1.周水平(1894——1926)，又名侃，号刚直，江阴顾山镇人。1917年毕业于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设六县讲习科。曾在铜山、川沙等地执教，积极宣传革命思想。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回江阴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在顾山镇组织佃户合作自救会，发动农民进行抗租斗争。因顾山地处江阴、无锡、常熟三县交界，当地许多贫苦农民报名参加该会，震惊城乡。由此，三县地主劣绅纷纷以“过激”罪名控告佃户合作自救会。同年10月18日，军阀政府以“宣传赤化，鼓吹共产”的罪名将周水平逮捕入狱。1926年1月17日，周水平在江阴被军阀孙传芳杀害。

2.高仁山(1894——1928)，原名宝寿，江阴城中人。1916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翌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教育系深造，结识同学陈翰笙(系无锡人，后为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人。1923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系副主任。1924年2月15日下午，曾在无锡县教育会演讲教育制度问题。1925年在北京创办私立艺文中学，并任校长。陈翰笙为校董会董事，顾淑型(系无锡人，陈翰笙夫人)任教务主任，陶曾谷(1902—1958系无锡人，高仁山夫人)负责财务。是年春，高仁山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于树德介绍，与陈翰笙一起加入国民党。1926年春，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委员兼主任，秘密从事国民革命。1927年1月15日，高仁山被军阀张作霖逮捕。1928年1月18日，被军阀杀害。

3.钱振标(1895——1928)，又名钱球仰、钱清泉，江阴澄江镇人。1917年毕业于无锡江苏

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设六县讲习科。后在江阴、丹阳等地小学任教。1925年3月，他由恽代英、侯绍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离开丹阳，参加赴北支部，去做政治工作。钱振标在丹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任教期间，常到无锡私立艺芳小学食宿。他在该校传播革命思想，了解无锡革命活动情况，不断提高时任校务主任的杨锡类的政治思想认识。通过工作，1925年春，他和陈叔璇介绍杨锡类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杨担任中共无锡独立支部书记，为党做了很多工作。随后，钱振标历任中共江阴县委书记、京沪特委军委书记等职。1928年11月25日在江阴牺牲。

4.孙逊群(1897——1927)，又名孙选、王津民，江阴中兴镇(今属张家港市)人。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春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任江苏省农运特派员，回江阴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6月16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孙逊群调至无锡，筹建中共无锡县委，任组织委员并代理书记职务。他到无锡后，在恢复城乡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同年9月至10月，孙逊群又任中共无锡县委代书记。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无锡举行农民秋收暴动。孙逊群多次参加县委召开的会议，研讨暴动准备工作，积极参与策划无锡农民秋收暴动。10月23日晚，孙逊群被捕，11月13日即在无锡被杀害。

5.陈叔璇(1900——1929)，又名陈明峯，江阴周庄镇人。早年就读上海东亚体操学校。1924年初，在无锡私立艺芳小学担任体育、音乐教员。该校校务主任杨锡类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陈叔璇常与杨交谈，志向一致。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和钱振标介绍杨锡类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他担任中共无锡党组织的联络、活动场所。陈叔璇积极参加无锡革命活动，主要有：(1)1925年4月5日，参加无锡各界人士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的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聆听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恽代英的演讲，加深了对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的认识。(2)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叔璇出席了无锡小学援助沪案协商会议，商讨募捐、宣传等事宜。6月25日，无锡沪案后



援会在公园召开市民大会。陈叔璇在会上发表演讲，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这时，他还在由锡社编印的《血泪潮》小报上发表《外国人不要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表明他的反帝决心、爱国热情。(3)五卅运动后，全国出现了崭新的革命情势。1926年7月，国民党无锡县党部成立，陈叔璇担任组织部部长；同年11月，国民党无锡市党部成立，他又担任宣传部部长，为发展国民党组织，推动国共合作做了许多工作。随后，他任江苏省农民运动特派员、中共江阴县委委员，常熟县委负责人、淞浦特委委员等职。1929年7月23日在江阴牺牲。

四、党政军干部

1. 张庆孚(1901——1968)，江阴城内南街人。1916年至1921年就读于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考入上海大学英文系。1924年1月1日，以上海大学无锡籍学生安剑平、糜文浩、薛成章等为主发动组织的中国孤星社宣告成立。随后，秦邦宪(博古)也参加了该社。时在上海大学学习的张庆孚亦是该社发起人之一，并被推为行政委员，积极参加活动。该社倡导“大侠魂”精神，口号是“救急地宣传三民主义，热情地走入民间，彻底地鼓吹世界革命，勇敢地身先响导”。为做好宣传工作，该社特地创办《孤星》旬刊。张庆孚在该刊上相继发表了《列宁有什么希奇》、《天平的良心》、《劳动节和小学教员》等。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林垦部办公厅主任，林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等职。

2. 俞百揆(1906——1989)，又名俞伯揆、俞揆生、黄慧之、俞冠群，江阴马镇人。早年毕业于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工科，即进入无锡实业中学(又名东吴大学附中)，担任木工科技术指导员。1923年冬，他由同事徐德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多种原因，直至1925年底才正式编入中共无锡独立支部。俞百揆曾任中共无锡独支委员、无锡地委委员、国民党无锡县党部、国民党无锡市党部工人部部长，常往工厂，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4月14日，国民党右派捣毁无锡总工会后，即转移至上海。自后，他历任中共苏州县委组织部长、沪东区委书记、沪中区委书记等职。1929年4月至1931年春曾在

苏联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1953年肃反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1986年平反。

3. 姜君辰(1904——1985)，江阴华墅镇人。早年在上海同济大学、法科大学学习。1931年起任《中华日报》国际版主编。1933年，与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均系无锡人)等人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参与编辑该会会刊《中国农村》月刊。1935年夏参与创办新知书店。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初，无锡旅外学生暑期服务社成立。该社为联络进步青年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特地举办名人演讲会。7月12日，姜君辰应邀来无锡进行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急转直下之欧洲政局》，内容精彩，听着无不感动。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革命社团组织无锡学社成员包厚昌、陶汝量等决定筹办无锡书店。姜君辰全力支持筹办无锡书店，负责联系上海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社，组织供应书报，先欠账，销售后再付款。他还建议采用集资入股的办法筹集资金，设200股，每股5元，自己当场认购10股。他为4月2日无锡书店开业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姜君辰历任中华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等职。为著名经济学家。

4. 张丰胄(1907——2005)，江阴长泾镇人。从小随父亲奔波，在社建模范小学毕业后，又在浙江温州完成初中学习。后回到无锡，先在私立公益工商中学读书，1924年高中毕业于私立辅仁中学。192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参事室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法律局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参事等职。

5. 张志强(1908——1994)，原名陈潮涌，江阴西门杏春街人。早年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在澄、武、锡地区担任领导工作，曾任中共澄武锡工委委员，澄、武、锡三县抗日委员委员会副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共澄武锡工委书记等职，领导人民进行对敌斗争，颇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江苏省民政厅副厅长、省农林厅副厅长等职。

6. 罗琼(1911——2006)，女，原名徐寿娟，江阴周庄镇人。1931年毕业于苏州女子中学师范科。后在上海青浦黄渡乡村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员。1933年，由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均



系无锡人)等人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后,罗琼即参加该会。同年,她用笔名徐洛在该会会刊《中国农村》月刊上发表《黄渡农村调查》。1935年5月5日,她与薛暮桥(新中国成立后,为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结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党组成员副书记、副主席等职。

7.田平(1913——),原名田见龙,江阴常阴乡人。早年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1931年辍学后去上海工作。1937年8月赴延安抗大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办公室副主任、外交部司长,驻日本大阪总领事,中国驻塞拉里昂大使等职。其夫人钟青(1927——),无锡北乡刘潭桥人,1943年参加新四军。1954年起,她任冶金部、国家建委、国家计委有色金属计划处副处长。后跟随田平从事外交工作。

8.王鹏(1917—1990),江阴利港人。1939年10月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锡西北一区区长、中共澄武锡工委代书记等职,常在无锡西北地区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1948年8月,他乔装商贩至无锡胡埭镇,建立隐蔽点,后在胡埭立人中学教工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1949年2月,他在锡西北地区举办秘密武工组和积极分子短期训练班,培养吸收骨干,策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镇江专署专员,江苏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等职。

9.严永洁(1918——),女,江阴河塘镇人。在就读无锡私立竞志女子中学时,思想进步,1936年8月参加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成立的无锡学社。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无锡青年界抗日后援团组织的抗日文娱宣传、慰问抗日受伤战士、突击救护伤兵等活动。同年11月25日,日军侵占无锡前夕,参加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经安徽到达江西南昌,参加新四军。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10.邢浩(1920—2010),原名邢春庭,江阴

要塞乡人。1938年参加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抗日救国运动。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6月参加江南抗日救国军(“新江抗”)。同年秋至1941年秋,他在苏西和锡南参加抗日战斗,如1941年夏在锡南龙王山参加反“扫荡”战斗。1941年5月至7月间曾在中共锡南西区区委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邢浩历任南京军区守备十一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南京军区守备二师副政委、政委,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上海警备区顾问等职。

11.藏晨光(1920—1992),江阴璜土镇人。早年就读于上海自强小学和振德中学。1940年1月,在家乡参加抗日运动,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4月,作为无锡市军管会的首批工作人员,渡江南下。他到了无锡后,相继担任中共无锡市委秘书,无锡市副市长,中共无锡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等职。1965年起在徐州市任职。1977年2月至1986年12月,调任无锡轻工业学院党委书记。1986年12月,他离休。

12.史大桢(1932——),江阴北门同兴里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就读无锡新庙前小学,无锡县立初级中学,1951年毕业于私立无锡中学。1955年毕业于山东工学院电机工程系,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历任水电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能源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电力工业部部长,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等职。为中共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13.吴新雄(1949——),江阴人。1977年毕业于南京化工学院。随后,曾任江阴氮肥厂副厂长,江阴化肥总厂厂长,江阴县副县长、中共江阴县委副书记、中共江阴市委副书记、江阴市市长等职。1992年4月后,他调任无锡市副市长、中共无锡市委常委、无锡市常务副市长。1997年后,任中共无锡市委副书记、无锡市代市长。1998年1月,任中共无锡市委副书记、无锡市市长。2001年6月起,他历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江西省常务副省长、江西省省长。为中共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

(作者:无锡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师生谊 战友情

——革命前辈管文蔚对钱振标烈士的缅怀

沈俊鸿

今年是建党 90 周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党的事业英勇献身。在我们江阴这块土地上，仅仅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时期这十余年间，就先后有周水平、奚佐尧、孙逊群、钱振标、茅学勤、陈叔璇、陈唯吾、朱杏南、蒋云等杰出的共产党员为党捐躯。

管文蔚同志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1949 年 4 月 22 日，他从靖江渡江，当晚宿营在青旸镇。他问当地的老百姓：“你们知道这里过去出过茅学勤和钱正表(即钱振标)吗？”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这位身经百战的革命前辈，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没有忘记为革命献身的烈士。30 年后，正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迎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时候，当我为了撰写钱振标烈士的传记而采访管文蔚同志时，我更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位革命前辈对烈士的深切缅怀之情。

那是 1980 年 1 月 22 日，按照省政协秘书长的安排，我和另外一位同志，于下午 3 时来到了坐落在南京市长江路 292 号的省政协，采访省政协副主席管文蔚同志。这里，解放前原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府。

管老那年已是 77 岁高龄。这位当年驰骋沙

场、叱咤风云的革命老前辈，身板依然十分硬朗，眉宇间隐隐然透出一股刚毅威武之气，谈吐豪放爽直。当我将钱振标烈士的一帧遗照和遗嘱的影印件递给他看时，顿时触发了他对烈士的深情缅怀。

他说，钱振标又名钱球仰，生前曾担任过江苏省省委委员，省委特派员。“五四”运动前后，他在管老的家乡——丹阳当过教师，管老那时是他的学生。管老回忆了当年钱振标带领他们上街抵制日货的情景。他告诉我们，钱振标后来是同夏霖、黄竞西等人一起，在丹阳由恽代英同志介绍入党的。

讲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管老似乎又回到了那腥风血雨的艰难岁月，他的神情显得严峻起来，语调也分外凝重。他说：“钱振标当时正在北方冯玉祥部队里担任党代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要冯玉祥将军队中的共产党人抓起来。冯玉祥没有听他，而是采取了礼送出境的办法。于是，钱振标回到南方。1927 年 8 月 15 日武汉发生叛变后，钱振标回到丹阳老学校找人，我正好也从无锡回到丹阳，夏霖等人也回来了。那时，大家都失散了，组织生活也不能过了，省委的大部分同志都被敌人杀害了。一天晚上，



我们在丹阳二小开了一次会，夏霖主持，钱振标和武进的恽逸群等八九人都参加了。以后，我们又恢复起党组织活动。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派王若飞到江苏。王若飞来后，派夏霖任丹阳县委书记，派钱振标回江阴当县委书记，恽逸群派往常州。后来，夏霖又被派往无锡当特派员，我就接任丹阳县委书记。钱振标即同茅学勤等人组织后塍暴动，搞起了武装。我们当时在丹阳也搞了暴动。此后，国民党悬赏捉拿钱振标。由于叛徒告密，钱振标被捕后牺牲在江阴。临刑时，敌人叫他跪下，他却毫无惧色地面对敌人，站着，所以子弹是从他的前额射进去的。”讲到这里，管老满怀崇敬地说：“钱振标死得壮烈，这是江阴的光荣。应该建个烈士纪念馆，给钱振标树个像在里面。这个人江阴要树起来。”管老还指出：“要用烈士的事迹教育年轻人，年轻人看了像就会肃然起敬，这是形象化教育。”

1993年9月5日，管文蔚同志在南京病逝，享年90岁。

1998年4月，管文蔚同志的夫人朱竹雯来到江阴。从她赠给我的《管文蔚回忆录》中，我发现管老在他的这部记述自己革命经历的回忆录中多处提及钱振标烈士。在忆及学生时代时，管老写道：“老师夏霖、钱正表等，思想很进步。我存有一些不理解的问题，向他们请教，他们都肯告诉我听。他们对我讲租界的由来，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夏霖、钱正表等老师还常给我们讲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中法战争、甲午之战……中国处于灭亡的边缘。”“拯救祖国的思想，开始在我心里孕育、激荡、萌发了。”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管文蔚同志之所以在学生时代便能接受进步思想，到后来投身革命，这同他的老师钱振标、夏霖等对他的引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记述钱振标的西北革命生涯时，管老写道：“钱正表于一九二五年夏，由李大钊派遣，去张家口，和宣侠父一起任中共特派员，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工作。同年，钱与宣去甘肃，钱以甘肃省军务督办公署政治处副处长的身份作掩护，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他与宣侠父、张一悟等创建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并发展了秦义贞等一百多人入党。”作为甘

肃党组织的创始人，钱振标与宣侠父、张一悟在那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这里，管老对于钱振标在西北地区的革命活动以及对党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写到钱振标、茅学勤担任京(宁)沪特委(又称苏常特委)委员时，管老特别指出：“钱正表当时是江阴县委书记，茅学勤是江南农民革命军负责人。”当年担任丹阳县委书记的管文蔚同志是历史的见证人，他在回忆录中明确地证实“钱正表当时是江阴县委书记”，应该说是确凿无疑的。关于钱振标被捕后的情况，管老是这样写的：“敌人抓到钱正表，真是如获至宝，赶紧解往江阴严加审讯。钱正表一口咬定自己叫金雨生，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软硬兼施，并叫叛徒来当堂指认和对质，叫钱正表的亲友到狱中劝降，种种花招都使尽了。钱正表始终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最后敌人说，只要他口头声明脱离共产党即可开释，钱正表仍然严词拒绝。结果，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江阴西门外君山附近慷慨就义。”写到这里，看得出，管老对钱振标在敌人面前所显示出来的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充满了无比景仰之情。在引录了钱振标写于狱中的一首小诗以及临刑前的亲笔遗嘱后，管老深情地写道：“钱正表是党的好儿子，毕业于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比我早几年。他在丹阳‘二高’任教时，与我才相识。后来，由老师而同志，而战友。今日回忆他这段历史，内心仍有余痛。”管文蔚同志的这部回忆录完稿于1984年，在钱振标牺牲已经半个多世纪后，他对这位亦师亦友的烈士依然是那样的情真意切，念念不忘。

时光流逝，1980年的那次采访距今已31年，管老逝世也已经18年，然而，当年面对面聆听他回忆钱振标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如今，每当我翻阅《管文蔚回忆录》时，管老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钱振标烈士的英勇事迹是撼人心腑的，而管文蔚同志——这位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对于烈士深情的缅怀、诚挚的敬仰令我终生难忘。是的，革命先辈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我们应该铭记他们。

(作者：江阴市政协学习文史委聘任委员)



缪荃孙与《常州先哲遗书》

刘徐昌

清末民初，江阴名士缪荃孙编辑了一部《常州先哲遗书》(以下简称《遗书》)。为该书雕版的是湖北黄冈人陶子麟，陶是清末民初四大名刻之首，其尤擅刻仿宋体；篆首刻字是阳湖的汪洵和史思绵，史幼习篆籀，喜欢研习周秦碑刻，所以，其篆刻亦很精美，由此可以看出该书无论内容还是印刷看都是极具收藏价值的。初编印行之始，就得到了文士们的极大赞赏和推崇，许多名士争相购买。无锡名儒钱基博得此书当年，喜得贵子，遂因书给儿子授名曰“钟书”，又名“仰先”，其书闻名当世由此可见一斑。

《遗书》的编辑起于光绪二十年(1894)夏六月，讫于民国四年(1915)冬，共收编书73种696卷108册，834.5万字，真可谓煌煌巨著啊！《遗书》第一编(第1册——第64册)成书于1897年，共花了四千八百余两银子。1907年再次编辑第二编，事至中途，不料辛亥革命事起，编辑工作只能中止，主编盛宣怀东渡日本，编辑兼校对的缪荃孙先生也旅居上海，“友人工匠风流星散”，到了1912年，缪先生按盛公意图，“就已刻者收束，只成此数，共订一百有四册(实为108册)”，到1915年冬才印行而告竣。

《遗书》体例按经、史、子、集编排。所选内容从时间上看始自梁萧统《昭明太子文集》，讫于清末。首种书为元朝江阴人梁益所著《诗传旁

通》，末种书是清朝时宜兴人吴仲伦的《初月楼古文绪论》。所选之书的内容、种类、体裁有文集、笔记、目录、年谱、语录、尺牍、杂钞、训诂释义等，所以有人称其为常州地区的“四库全书”。此称也不为过，因为编辑内容这样丰富的巨著，在常州地区来说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的。其选辑之精良，刻板之精美，校对之精细，就刻乡贤之书来说确实首创，所以湘中大儒叶德辉曾将《遗书》“列作刻乡贤之书之范本”。

常州府清时辖四县：江阴、无锡、宜兴、武进，所以武进盛宣怀自任刻资，令江阴的缪荃孙搜集并校勘，收录一府四县先贤之遗书而编辑成书。我们江阴共有19位古人的书收进了《遗书》，如宋朝葛胜仲的《丹阳集》、明朝李诩的《戒庵漫笔》、元朝时陆文圭的《墙东类稿》、明缪昌期的《从野堂集》、李应昇的《落落斋遗集》等都收入其中。这些书籍内容丰富、诗文精美，叹为观止。许多内容在其他古籍中难以看到，如葛胜仲的《丹阳集》共有诗408首，词63首，而《江上诗钞》只收录了59首。其《依韵和工部兄寻由里山泉眼》及《定山寺》《江上诗钞》均未收录。又如《江上诗钞》只收录夏树芳《輓繆西溪二首》，而缪昌期之《从野堂集》中还有一首夏树芳之《吊官谕缪生西溪》诗就没有收入，其诗曰：

有美天灵握绛螭，长身鹤立凤骨奇。



牛鬼蛇神驰文轡，洊登金马然青藜。
倏然猾人起诏狱，无端骯法囊三木。
不堪再读党人碑，智者吞声愚者哭。
吁嗟乎！

成连未死牙先喪，大江人立弥天浪。

像如此优美的诗歌，只能在原著中才能赏读到，而其他书籍就难睹其“芳容”了。

第二编原计划分为三集，共九十五种书，但因辛亥九月革命变起而中止，最后只能草草而成。我江阴共有八位古人之著作共 77 卷未能如愿收录书中，如明夏树芳的《消渴集》22 卷，清陈鼎的《东林列传》24 卷等。对这些未能如愿收入之著作，缪公深表憾意并寄希望于后生，他在《艺风堂文漫存一己丁稿三》中说：“变出意外，保护无从，方知前人珍弆不令人窥，不得谓人之失策，如夏树芳之《消渴集》，卷帙既重，后嗣亦颇不振，恐难再付剞劂，是亦作者之不幸……然同乡诸君好古而有力者尚不乏人，庶而续之，尤拭目而望焉。”

先生编辑《遗书》呕心沥血，吃尽辛苦，筚路蓝缕，八方收罗，或采之于国有藏书，或访之于私家藏书，或追踪于民间，或寻觅于书肆，采访既得，详加校勘，字字句句，精研细核，其功夫之深，怎一“辛苦”了得！凡收录之书大多有一题跋，虽大多署名盛氏，实皆缪氏之手笔，此可以从跋中内容可知。

在收罗古人遗著的过程中，先生大概也尝过“闭门羹”的味道。有些书痴只知“珍爱”古籍而不肯展示予人，往往以“没有”两字一推了之，所以先生深发感慨曰：“亦有过于珍弆锢篋幽楹，人有求者，坚称无有，宁饱于虫鼠或投诸水火，不使流传。”这种人名为“深爱”，实为“深恨”。此种行为实“与人有深仇宿怨”。因为有些古籍已成孤本，如能借阅刊印，就会“发扬光大”，大行于世，如若深藏，秘而不宣，或有目无文，或文目全无，这样，古人辛苦著作，消灭于此人手中，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是个大大的悲剧。

缪先生编辑《遗书》之初衷，并非如现代某些书商一样谋盈利，而是上为重振乡邦文化，下为后生进修垂范，他认为古人尽一生精力，辛苦好不容易写成了书，但岁月悠悠，经虫蛀水

浸，兵燹毁损，侥幸而存，为数不多了。如果再不将这些遗存编辑出版，它们行将湮灭。所以他要不辞辛苦，传书传人，“萃前辈之精神，为后人之模范，使文学之乡处处能传其先哲。”由此可见，缪先生之精神堪为后世之敬仰！

缪先生校辑《遗书》之认真，不仅体现在校对原文的字句方面，有时还深为作者其人之品质及其浸透于文章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将其人其文的精神品质详述于跋语中，所以有些先哲的遗书的跋语，其实就是“史太公”、“史臣曰”之类的评语，这可以从明缪昌期之《从野堂集》及李应昇《落落斋遗集》的校勘跋语中看出。如他在缪昌期之《从野堂集》的跋中说：“（缪昌期）先生大节凛然，文笔亦朴实淹通，可传可读。当其下笔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故得祸亦最酷。”这里缪荃孙先生用点睛之笔将缪昌期之人品、文品一一评点出来，说他气节凛然，文章如其人朴实无华，而又深博通达。又如缪先生在李应昇的《落落斋遗集》的跋语中说：“其（魏忠贤）势如大火之燎原不可向逆，仲达（李应昇字仲达）忠诚耿耿，独蹈危机而不悔，其忠真不可及。仲达与缪当时（缪昌期字当时）至戚，平居往还手札以大义相切磨，先后就逮，同死诏狱，而明社稷亦屋（终止之义）矣。”也就是说李应昇看到魏阉当道祸国殃民，他挺身而出，弹劾阉党。平时与缪昌期切磋时弊的来往信札也收入其中，李之屈死狱中，大明的社稷也不久随之终止。缪先生不仅在评论文章，而且在歌颂作者之精神。为了使李应昇先贤的精神永世传承，缪先生知道了《落落斋遗集》自崇祯甲申年刻印后“版久不存，世人亦鲜有藏者”，在李之遗书行将湮灭之时而刻之，“足以慰忠魂于九原。”

总之，缪先生的跋语不是一般的评论版本、文章的跋语，而是兼重阐述、评论作者人品的佳评。

缪先生呕心沥血，十年辛苦，辑印煌煌巨著，其书其人，精神伟大。《常州先哲遗书》的编行出版，同时也将我们江阴先哲们分散的著作汇聚成珍，而不至于散失。它使我们江阴文化积淀得更加深厚，这也是对我们江阴历史文化的一大贡献。

（作者：江阴市二中退休教师）



拜谒吕斯百墓

陶 泓



因为一直想为乡贤先辈吕斯百先生写点什么，我一向十分注意对吕先生的有关情况和资料的收集。

2010年11月6日，我专程来到北京，寻访吕斯百先生的墓地。那天，妻与我同行。

我是从2005年第5期《美术》上知道吕先生的墓地是在京西万佛华侨陵园的，但这个陵园具体在哪里，心中一点也没数。到了北京，我几经周折，没有找到正确的地址（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万佛华侨公墓”的说法不准确所致）。于是，我在北京地图上找，在北京西边的区域寻找与“万佛”相似的名称，终于在门头沟区看到

有一个“万佛堂”，我想，这也许就是我要找的地方。于是我们乘地铁2号线到最西边的“苹果园”站，准备出了苹果园站再往西找。一出苹果园站地铁站，一看，站上有个931路公共汽车站，上面第24站写着“华侨陵园”，华侨陵园，华侨公墓，义同字不同，我确定，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

11月6日，农历是10月初一，据同乘公交车的北京老大妈说，这是当地一个类似“冬至”的重大节日，因此有好多人去墓地祭扫。931路车站人满为患，人们看见一辆车来了，就争先恐后地拥过去，拼命地挤上车去，虽然有个女服务员在维护秩序，但好多年轻人根本不管不顾。我们好不容易挤上了车，站在拥挤的车厢里，一路颠簸，终于来到了华侨陵园站。

华侨陵园，全称“北京万佛华侨陵园”，属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在陵园的外面的路旁还有一块“万佛园”石碑，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往北直通陵园。陵园坐落于北京西山九龙山旅游风景区，毗邻潭柘寺、戒台寺、西峰寺等文化景点，是集墓葬纪念、旅游观光、文化展示等为一体的园林式墓园。陵园坐北朝南，从山坡建起，一直往山上延伸，这里山势平缓，坟茔分布在高低错



落的山地上。陵园的规模十分宏大，占地 657 亩。园内建有亭台楼阁、假山喷泉，拱形石桥，水泥道路纵横交错，平坦的石阶布满墓区；园内环境清幽庄严肃穆，苍松翠柏绿树成荫，四季花草鸟语花香。华侨陵园建于 1994 年 10 月，是国家民政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北京香港合作企业。陵园建有宏福、宏怡、宏安、贵安、荣和、吉祥、智瑞和同生 8 个墓区，每个墓区又辟有小区，如吉祥区中又辟有仁寿园、名人园等。

吕斯百先生的坟茔就在吉祥区的名人园内。在这里安葬的都是一些我国的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经济建设、军事学科等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如陈景润、吴运铎、王朝闻、李苦禅、臧克家、新凤霞和吴祖光等，著名画家有吴作人、萧淑芳夫妇，吕斯百，王临乙、王合内夫妇，罗工柳，艾中信，程永贤等。每个坟茔占地一两个平方米，坟茔与坟茔之间留有较宽敞的空地，空地上绿草茵茵。吕先生的墓在吴作人和王临乙之间，吕墓的左前方是吴墓，右后方是王墓，3 个生前好友、同道知己活着时心心相印，故去后阴宅毗邻，一线相连，也可算是一件称心乐事。名人墓的每个墓碑都各有特色，有的立着夫妇相依的雕像，如吴作人、萧淑芳；有的是浮雕，如王临乙、王合内夫妇；有的在石碑上镌刻一句话，如诗人臧克家火苗形的红色墓碑上刻着他的手迹：我/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下面塑着一部平摊着的诗稿，诗稿上塑着一支横放着的笔，等等。

我们在吕先生的墓前敬献了一个小小的花圈，然后擦拭了一下墓碑，细细的端详起上面的内容来。吕斯百先生的墓碑比较朴实，就像他的为人、他的作品一样。墓碑与底座全部采用黑色大理石，我用手估量了一下，墓碑高 170 厘米，宽 80 厘米，厚 20 厘米，侧面和顶部有线刻藤萝花卉，竖在高约 30 厘米的底座上。墓碑的下方缀着一个用白色大理石刻成的花环，上方用黑体字并排刻着两个人的名字：

吕斯百 1905—1973，马光璇 1914—1996。

接着是用仿宋体刻写的碑文（格式不改）：
在这新落成的墓碑中，安息着 20 世纪近代油画的先驱、中国美术教育史上的著名美术

教育家。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资深教授吕斯百，和其相伴终生的中国近代著名的法语专家，南京大学外语系资深教授马光璇夫妇的二位英灵。

吕斯百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

马光璇教授离开我们也已八年了。

先走的是那样委屈和突然；

后走的又是那样寂静和孤独。

时光流逝，二位老人远离人间已很远很远，多年来尚在远处的亲人始终不能忘怀对他们的思念。随着与日俱增的岁月，他们的业绩与品格，他们的音容美貌和身影，更加梦萦着亲人，他们的事迹永驻人间。正值 21 世纪的山花烂漫时，把二位从南京迁至北京立碑于“名人墓”群中，同生前友好相伴，圆生前的夙愿，以示永久的纪念。

安息吧！

义女 沙娜
侄 学明

2004.5

墓碑的背后自上而下刻着两位教授的主要经历：

吕斯百

1905.10.15 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父亲小学教师，母亲务农。

1913—1921 年 早年家乡求学。

1920—1926 年 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美术科毕业。

1928—1934 年 留学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毕业，学习绘画。

1934—1949 年 回国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教授，执教十五年。

1949—1950 年 华北革大学习。

1950—1957 年 创立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任主任、教授，执教七年。

1957—1966 年 重返故里在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从教九年，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生平作品堪为中国油画的经典。

1966—1973 年 文革中不堪受冤，梦碎故园。

全国第四届政协委员，江苏省第二、三届人



民代表,九三学社南京分社第四届委员,第五届副主任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三届常务理事,美协江苏分会副主席。

马光璇

1914年7月22日生于无锡市,自幼随母赴法国、比利时。

1921—1927年 早年里昂、比利时求学。

1927—1934年 比利时、英国学习文学。

1935—1942年回国后在重庆从事法文编辑及对外法语广播,报道抗战新闻。1937年与吕斯百结为伉俪。

1942—1944年 重庆国立艺专、中央大学外语系任法语副教授。

1949—1987年 南京大学外语系著名资深法语教授。辛勤耕耘四十余年虽桃李满天下,却又孤寂生活了三十三年。

1996年4月4日 驾鹤西归寻亲人。

1938年参加“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1934年参加“中国国际妇女会”,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

首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法文版。

我把碑文抄完了,妻也拍了一些照片。于是,我们告别了“名人园”,踏着整洁的小道,走上了回程的路。

(作者:江阴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

江阴博物馆参加 良渚论坛·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三届年会

12月20日,良渚论坛·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三届年会在杭州余杭良渚开幕,长江流域两大史前玉文化展开首次对话。本届年会规模大、规格高,是玉文化研究领域的一次盛会,来自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江浙皖三省文博界以及全国各地知名考古专家、学者140余人参与。



会议期间,以“争奇斗艳,交相辉映——长江流域两大史前玉文化的首次对话”为中心学术议题,通过专家交流研讨,进一步挖掘中华玉文化传承体系及精神内涵。江阴博物馆副研究员翁雪花参加了这次年会、提交论文并在大会作交流发言。
(雪花)



陈继儒与江阴名士

江 沙

澄江人物

陈继儒(1558—1639)，文学家、书画家。字仲醇，号眉公(也作麋公)，又号白石山樵。明朝松江府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家住小昆山。幼颖异，工诗文，善书画，嗜奕棋，得同郡徐阶器重。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三吴名士争着要和他结为师友。他29岁时，焚儒生常穿戴的衣冠，隐居小昆山之南，表示绝意科举仕途。他倡议建庙祀二陆(陆机、陆云)，乞移四方名花，广植堂前，说：“我贫，以此娱二先生。”因名“乞花场”。

无锡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聘请他去，婉言谢绝。父母亡了，葬辰山麓。在东佘山建房子，闭门著书。短文小词，都很有风致。书法学苏轼、米芾，对苏、米墨迹最为喜爱，虽然是残碑、纸角也必搜采，亲手摹刻，成《晚香堂帖》及《来仪堂帖》。所画山水，空远清逸，松江博物馆有《潇湘烟雨图》1幅。所画梅竹，点染精妙，名重当时。用水墨画梅，乃其首创，曾编《陈眉公梅花诗画册》，为后世所法。传世作品有《梅花》、《梅竹双清图》等，(现藏故宫博物院)。另有《梅花图》8

页(藏于日本国立博物馆)。书法传世作品有《行书半研斋诗》、《行书李白诗》等(现藏故宫博物院)。曾评批《西厢记》、《琵琶记》、《绣襦记》等。并善鼓琴，订正琴谱，名重一时。

其一生藏书颇富，对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释、道等书，无不研习，博闻强识。曾延请一些穷老书生，寻章摘句，按部分类；而后摘取其中琐言僻事，编订成《宝颜堂秘笈》457卷，远近争相购写。每天有人前来征诗文，客常满座，片言应酬，都满意而去。闲时与僧道等游，尽情胜迹，吟唱忘返。董其昌特筑“来仲楼”，请他去居住。先后多次被推荐，朝廷下诏征如，都以病辞。于是“眉公”之名，倾动全国，远及少数民族土司等，皆求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以“隐士”高名，周旋于大官僚间，时人颇多讥评。但对地方利弊，人民疾苦，多有建言。如阻止当局勿搞扩建郡城的大工程和免除县民缴解王府禄米的徭役等。歿后，葬于东佘山。

著有《陈眉公全集》(60卷)传世。辑有《通纪会纂》、《国朝名公诗选》(12卷)、《古今诗话》



(8卷)、《爽心笑谈录》14卷、《尺牍双鱼》(19卷)、《致富奇书》(4卷)等,主纂《崇祯松江府志》。^①

陈继儒与董其昌和江阴名人夏树芳、徐霞客有深交,他同夏树芳“得交三十载”、“年年二三月,瞻对读书台”。有诗为证:

奉怀陈仲醇山居

吾爱希夷子,顽仙隐敝庐。
九峰堪跌荡,三酒自居诸。
好鸟林间弄,奇花象外舒。
宁辜鱼腹简,不应鹤头书。

处士梦崖客,余山独擅名。
笠亭高卧石,秘笈可连城。
霸略能戡世,坤藏善隐身。
坚辞州里辟,生怕晚猿惊。
异书不可读,之子独探源。
得交三十载,如佩五千言。
要眇天门关,灵奇鬼斧翻。
彩毫千气象,诡动客星骞。

天涯真莽沆,诗酒共徘徊。
屹古风云破,论交金石开。
移琴尝命驾,泛雪权频回。
年年二三月,瞻对读书台。^②

陈继儒与董其昌是同乡、知友,陈继儒可能随董其昌到江阴,据《乾隆江阴县志》载:董其昌在江阴云亭镇西南的庆云庵和毗山上的毗山寺(能仁寺、中山寺)读书,有诗赠夏茂卿(树人)。那么陈继儒也一定到过江阴云亭的庆云庵和江阴毗山上的毗山寺,因为夏树芳在这里办私塾。陈继儒与董其昌究竟谁先到江阴,这有待进一

步考证。

徐霞客母亲 80 大寿时,陈继儒专门题写长篇《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见晴山堂石刻 24 页)。徐霞客母 81 岁仙逝时,董其昌撰并书了《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见晴山堂石刻 42 页)。夏树芳为徐霞客请陈伯符、张灵石画的《秋圃晨机图》题诗写赋。

下边我将陈继儒、董其昌、夏树芳、徐霞客 4 人的生卒年月、年龄对比,说明徐霞客与他们 3 位的确是忘年交。

夏树芳:生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卒于明崇祯八年(1635),享年 85 岁。

陈继儒:生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卒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享年 81 岁。

董其昌: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卒于明崇祯九年(1636),享年 81 岁。

徐霞客: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卒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享年 51 岁。

以此推断,徐霞客小夏树芳 35 岁;小陈继儒 28 岁;小董其昌 31 岁。所以我认为凭徐霞客的才学才有可能与他们成为忘年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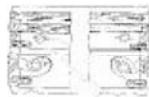
拙文仅写了陈继儒与时江阴人夏树芳和徐霞客的交往,至他对江阴文化的影响还待进一步探讨。

(作者:原江阴市云亭中心小学校长)

注释:

①资料引自 2009 年 9 月第六版采国科本 0273 页。《松江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8 第一版,卷三十一,人物 1005 页。

②引自《江上诗抄》卷三十六 352 页



霞客高趣 介立兀傲

——徐霞客、李寄诗歌及思想之比较研究

翁雪花

徐学研究

徐霞客是我国明代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留下的《徐霞客游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地理学著作，更是一部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山水散文集，除了游记外，徐霞客还为我们留下了38首诗歌，这些诗歌的数量虽然不多，却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极高的艺术水平。

生活于明清之交的李寄，是徐霞客的第3个儿子，也是江南文坛很有声名的饱学之士和诗人，李寄寄人篱下，不能恢复徐姓，毕生过着独身不婚、僻处山野的孤寂生活。《江上诗钞》录有其所作诗140余首，加上其见于《二介诗抄》中的诗，李寄传世的诗不会少于300首。比之徐霞客存世的诗，李寄诗是比较多的，笔者在研读李寄诗歌的同时，将其与徐霞客诗歌做了初步对比。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讨李寄与徐霞客诗歌特点及其思想艺术。不到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寄情山水，理想与现实的对比

徐霞客散文自具特色，立意高、格调新、尚自然，又继承了前人重视锤炼，讲究音乐感等好传统，可称之为“独树一帜”。由于徐霞客是布衣旅行家，科学家而兼文学家、诗人，他的思想感情比较单纯，那就是对旅行考察事业的执着追求，对祖国山川和亲友的深沉热情。综观其现存的山水诗，诗中除自然景物的描绘之外，不太联系社会现实生活，往往只是在赞赏之余抒发一点感受，聊表一下心志而已。这点很有山水诗派的鼻祖谢灵运的风格。很大一部分是描写山水景色的。他一生鄙视科举，朝夕与祖国的山山水水相对。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美妙神奇，使他深深陶醉，爱得刻骨铭心。于是形诸笔墨，并以诗的形式加以咏叹与赞颂。《徐霞客游记》^①后所附的《游桃花涧》、《鸡山十景》等诗，不是对客观存在的简单描摹与复制，而是经过仔细的观



察、鉴赏、感受，从山水景物的审美品格中筛选出最富特征的、最感人的美质，与自己的思想感情溶合蕴酿而成，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结晶，读来生动感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诗言志”。诗歌直抒胸臆，最能看出一个人的胸襟抱负和理想追求。徐霞客诗可考的达110首^②，多数均已散佚，存世38首。除《哭静闻禅师》6首外，其余几乎全部都是歌咏山水景物之作。因为长期在外旅游，饱览大好山河，因此徐霞客胸襟开阔、反映在他的诗上则是多喜运用夸张、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刻画太阳、大海、白云、瀑布、雪景的壮观。且看“蓦地兜罗成世界，一身却在玉毫巅^③”之白云；“珠玑错落九天影，冰雪翻成双壁喧^④”之瀑布；“北辰咫尺玉龙眠，粉碎虚空雪万年^⑤之积雪，气势磅礴，堪比李白。而“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⑥”“绕屋梅花香更清，当窗竹影云俱轻；梅香宜月竹宜雨，一时雅致谁与并^⑦”这类佳句，融梅、竹、雪为一体，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无不表达了作者坚贞高雅的思想风貌。至于“种来香雾三千界，削就云根第一株^⑧”“幻出烟萝傍玉京，须知片石是三生^⑨”更是描绘出世外仙境，飘渺世界。这是一种历练，在踏遍山水的辛劳中，在蓦然回首的慨叹里。因此，笔者认为徐霞客的诗是一种理想主义的释放，是磊落不凡情操志向的表现，是李白浪漫主义诗情的延续，是儒释道性灵的释放。因此，读徐霞客的诗要先让思想驰骋，让梦想插上翅膀，随着作者的笔墨去领略大写意的境界。

综观李寄的诗，思想内容比较丰富，艺术手法也比较多样，基调则低沉凄切，极少欢快高昂的篇章。从写得较多的抒情诗看，很多都是借景抒情的，写得情景交融，意境浑成，往往情深意浓而能以简淡的笔墨勾勒，表现出一种“寓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韵味^⑩，耐人寻味，富有魅力。由于其诗数量多，涉及面广，有感时、叹世、咏史；有记游、随感、杂咏；有赠答、抨击、赞颂。同样是写景的诗，李寄更擅长于将星点物件写入诗中，仿佛是一副白描，优雅含蓄。“山家多在白云闲，曲径芳离信步穿。乍霁乍阴峰自好，或啼或默鸟皆然。调人小犬衔衣惯，昵客飞花点帽偏。最是村村如画处，门前绿柳系渔船^⑪”“牧

笛入青烟，渔父眠白昼。水歧欲问人，倒撑一篙就^⑫”。笔者以为读李寄的诗适合在星星寥落的月夜，在冷着风、冷着雨的寂静中感受不一样的飞花溅玉。总之他是一个不得志的诗人，易代的悲痛，身世的不幸，经历的坎坷，形成了他诗的独特风格。

与其父徐霞客的诗相比，李寄的诗虽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审美和立意上还是秉承了乃父遗风。一是都喜用律诗。徐霞客存世38首诗中，律诗31首，其中七律24首，五律5首，五言排律2首，另有七言古风2首，七绝5首，李寄诗较多不太好统计，单以《停车集》为例，十四首诗中，律诗11首，其中五律6首、七律3首、五言排律2首。另有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各一首，五言十句古体诗1首。二是用词考究，赋有音韵美。律诗是一种既讲平仄，押韵，又讲对仗的诗体，故写作较难。而排律在诗歌创作中素称难工，古人多以善写排律为标榜，杜甫、李商隐等都曾为写排律而下了不少功夫。以李寄的《绮山访依上人不遇》^⑬和徐霞客的《游桃花涧》^⑭为例，同样都是一首五言排律。徐霞客的《游桃花涧》是一首长达21韵的五言排律，这首排律写得极有气势，不仅对仗工整，描摹生动，而且一气呵成。如写涧水的狂怒声势连用了八句：“层层声捣石，矫矫势垂天。吼虎深藏峡，狂龙倒挂川。怒疑连壁坠，宛似趁风旋。玉迸丝丝立，珠倾个个圆。”由远及近，由全景到特写，写出了一位旅行家独特的审美观。李寄的《绮山访依上人不遇》是一首12韵的五言排律，该诗中，李寄继承了其父擅长写景，观察细致的特点，“暑月寒侵帽，晴天雾满堂。山禽随意啭，野果逐时香。涧滑泉争响，林深叶嫩黄。渡谿因卧柘，植槿即围墙。藤古疑松柏，犹疑似鹿麋。虎溪空贮月，灵隐自成章。拂石留名字，寻樵问酒浆。锡飞何太远，三点菊花汤”一连串的“暑月寒”“晴天雾”的虚写，“山禽啭、野果香”的实写，继而“涧中泉、山中藤”一道来，从一种幽幽隐居，空旷无人的境界突然转入凡世，以“三点菊花汤”结句，让整个诗充斥着不知人间天上的独特氛围。

二、志趣高远，奇人和山人的追求

徐霞客是明代的大旅行家，生平足迹，踏遍国内名山大川。在明代的交通条件，爬山涉水主



要是靠两条腿，艰难可想而知。于是对徐霞客的出游，就有许多类似神话的描写，如《江阴县志》就是这样写的：“(徐霞客)出游，东南佳山水，如东西洞庭、天日、雁荡，俱穷其胜。其游也，从一仆或一僧，携一杖一袱被，不治装裹粮，能饥，数日，遇食即饱，绝壁丛箐，攀援上下，捷如飞猱。每行数百里，即燃松拾穗，走笔为记。”可以“数日不食”，而又“攀缘上下，捷如飞猱”。简直把他写成武侠小说中具有“绝顶轻功”的一流人物了。

而事实上，徐霞客的旅行，充满着艰苦，非有卓绝的毅力无法完成。象徐霞客初游雁荡山有为寻龙湫，带断之历险，再如登嵩山太室绝顶，入石峡，滑不留足，仰望夹崖逼天之惊心，非常人能完成。明代书画家文震孟非常佩服徐霞客，称他为“古今第一奇人”。而江阴名士沙张白在劝友徐介立复姓书中也称“霞客高趣”。因此徐霞客不仅在现世被称作奇人，在当朝亦有着不一样的作为。

徐霞客虽然存世诗很少，但由于他深得族中诸父辈的器重和诸兄弟的爱戴，也为当时的一些名流学者，如高攀龙、文震孟、黄道周、唐泰等人所推重。他还与临海王紫芝、陈函辉、黄岩吴澹人、夜郎杨龙友、浪穹何巢阿、长洲周光祚、陈仁锡、罗浮郑鄮、吴门项煜、三湘李子渔、天门张来初、峨嵋刘伯重、闽莆黄若木结为密友，他们或砥砺学行，或相互唱和，创作了不少名篇佳作。陈木叔《客还草》纪游十九首引说：江阴友人徐霞客赋性简远，作人落穆。霞客心坦自旷，致静自贞。《十日前与吴澹人谈徐霞客雅游而霞客邮书适至因作诗兼讯杨龙友》说：一雨连三雨窗坐，长日长安无过卧。诗云独寐有寤言，天末怀人亦功课。忽忆江上徐霞客，此时深山煮白石。更忆玉堂吴澹人，起草挥毫岸其帻。因之远忆夏黄公，铁人能御列子风。因之近忆杨龙友，手弹五弦送飞鸿。返而自忆陈木叔，简韵题笺裁尺牍。寂寂作此寄阿谁，云有幽人在空谷。门前剥啄遽之使，开缄贻我琅玕字。一居江南一塞北，有想无因各称异。异者偶记十日前，屈指怪事及两贤。丹阳道上追兰棹，太华峰头载藕船。世上奇人孰胜此？每举幽芳似季子。雅游韵语与清音，自是南州产高士。先生山斗世所尊，烟霞之

外皆素臣。我将此意语龙友，当今海内尚有人。

李寄出生于明代万历末年，当他还在母胎的时候，悲凉的命运就降临到李寄及其生母身上。关于他的身世，江阴光绪县志有如下的记载：“母周氏，徐弘祖妾，方孕而嫡嫁之，以育于李氏，故名李寄；又以介两姓，历两朝，故自名介立。性颖异，好学，少应郡试，拔第一。既而悔曰：‘奈何以文字干荣哉！弃去。奉母居定山，终身不娶。母卒，隐由里山之山居庵，号由里山人。’”¹⁵江阴志书和徐氏谱牒这样写道：“李寄，字介立；母周氏，徐弘祖妾，方孕而嫡嫁之。以育于李氏，故名李寄；又名介两姓，历两朝，故自名介立。”李寄生母周氏，由于宗法社会正妻的反对，把“方孕”婢妾的她逐出了徐门。李寄本人也在《昆仑山樵传》中介绍自己：“昆仑山樵李介，字介立，号因庵，江阴人，性耿直，不能谐世，恒困于衣食，好山水，将遍游天下，不登昆仑不止，故自号昆仑山樵。”李寄还用过其他名号，如萍客、瓮里书生、白眼狂生、三因居士、复阳子、由里山人等。李寄所用名号，多少反映了他对身世、命运、社会满含悲愤不平的创痛和心态。因此，身世、命运注定李寄虽有着和其父徐霞客一样的志向和情趣，却缺少实现理想的条件和氛围。比之其父徐霞客的“奇人”，李寄更是隐居由里山的“山人”，虽然也有不登昆仑不止的志向，但很多时候，生活对于他更是一种无奈地选择，而这却并不影响“山人”向“奇人”看齐的努力。因此沙张白对其评价是“足下好读书，好远游，畏恶俗，人敝屣，富贵与人交不以盛衰存亡易其心，凡此皆霞客之所长而足下克继其续”¹⁶。

三、真情重义，君子对君子的承诺

徐霞客最重感情，忠肝义胆，对人一片至诚。最著名的是徐霞客和黄道周、静闻之间的友谊了，充分体现心真、意诚、情挚。

黄道周先生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6年)比徐霞客年长一岁，他平日择友极为严格，对人从不轻易赞许称道，但对徐霞客则备加称赞，说他们俩之间是“死生不易、割肝相示”的挚友。而徐霞客对黄道周先生的道德文章早已钦佩得五体投地了，他久闻黄道周先生在朝廷敢与魏忠贤之流抗争，为了维护师道尊严，敢于平步进殿讲经筵，这些事都使徐霞客神往已久，早



已目为师长了。

历数徐霞客和黄道周之间的交往，他们总共有过四次会面^⑩。其一、“初识墓前，相倾相倒”。崇祯元年(公元 1628 年)戊辰四月，以“文章风节高天下”的黄道周先生正在漳浦县北山，为他的父母亲墓庐守制，而徐霞客已“母丧服阕”，徒步三千里，专程造访黄道周先生于墓下。这两个嵚奇磊落的男子汉，“一揖登堂，便相倾倒”，深夜长谈，意趣相投，从此便引为知已了。

其二、“徐追黄，丹阳沽酒对饮”。崇祯三年辞岁迎春之时，黄道周先生服丧期满出山，携眷北上。路经毗陵，过访好友郑鄮，然后单车就道，继续北上。刚好这时徐霞客也来拜访郑鄮，知道黄道周刚走，便雇船追赶，一直追到丹阳。两人逆旅相会，“沽酒对饮，且饮且题诗”。

其三、“寄情山水，相伴相游”。崇祯五年壬申春正月，黄道周先生因为挺身而出，疏救旧辅钱龙锡，崇祯皇帝“疑为诋毁曲庇”，降三级调用。“先生遂更三疏乞休。”束装将行之际，他骨鲠在喉又上《放门陈事疏》，谏皇上“小人勿用”。又被说是“滥举逞臆”而“削籍为民”了。二月，先生挂冠去都，于南归途中访徐霞客于江阴。他们俩“自春徂秋，亦随意放浪山水”，《年谱》记载，他们遍历了黄山、白岳、九华、皖台、匡庐诸名山胜地，黄道周先生本来就是个酷爱山水的人，因此跟徐霞客正是志同道合，这次的欢聚，遂了两人相约共游的夙愿。

其四、“黄追徐，大峰携手同游”。崇祯六年癸酉，七月间，徐霞客游罢五台、恒山，第三次入漳，访黄道周先生于漳浦北山，不遇而返。他前脚刚离去，黄道周先生后脚就到家了。这次轮到黄道周先生追徐霞客了。这次行踪，不见于《日记》而见于他们俩唱和诗的序跋中。黄道周先生在《分阅十六韵》诗序中说：“徐自毗陵来访予山中，不一日辄搜奇南下。觅篮舆追之百里乃至，相将于大峰岩次。”

以后黄道周被谴入狱，徐霞客派长子徐屺去大狱探望黄道周先生，并赠寒裘一袭。徐屺来回奔波三个月，回来向父亲禀告黄道周先生在狱中的苦情。徐霞客听罢，“据床浩叹，不食而卒”，时为崇祯十四年辛巳正月，享年方五十六岁。翌年，黄道周先生出狱了，闻噩耗，遣人捎去

《遗奠霞客寓君长书》给徐屺“缙绅倾盖白头者多矣，至于皭然物表，死生不易，割肝相示。墨人已歿，郢匠辍斤，即令台宕华峨起于左右，仆仗履甚健，亦岂乐自独从之乎？”诉说他的悼念衷情。

静闻是迎福寺高僧莲舟的弟子，“禅诵垂三十年，刺血写成《法华经》。”圆寂于广西南宁崇善寺后，霞客挥泪写下悼诗：“晓共云关暮共龛，梵音灯影对偏安。禅销白骨空余梦，瘦比黄花不耐寒”。“可怜濒死人先别，未必浮生我独还！含泪痛君仍自痛，存亡分影不分关”。“黄菊泪分千里道，白茅魂断五花烟。别君已许携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鹃”。“一簣难将余骨补，半途空托寸心盟。别时已恐无时见，几度临行未肯行”。“一番魔障一翻愁，梦寐名山亦是贪。并不及泉无论九，河难复渡尚呼三”。无穷无尽的悼念与哀思，满纸血泪，读之催人泪下，撕肝裂肺，心胆俱寒。好个“别君已许携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鹃”，如此交情，如此承诺，真君子所为！

李寄的诗中也有许多反映友情、亲情的诗，无论是《喜友人至》的“得君有幽兴，竟夕暑相忘”^⑪表达出友人至相谈甚欢而忘高温酷暑的情景，还是《思亲》中“白云亲不在，寒食墓谁临”^⑫的对母亲逝去难耐的思念之情。虽然比之徐霞客，李寄的一生缺少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介两朝，立两姓，注定李寄的一生是悲怆又充满着浓重的传奇色彩，但在行为上，李寄耿直、坦荡、重承诺与徐霞客如出一辙。他早年亦重“帖括”(科举论试文体之名)之学，30 余岁时曾应郡试，竟获第一，但不久又放弃举业，李寄反对异族暴虐统治，誓志抗清复明，但清廷官员赏识其才华，赠书邀游，他却守志不渝，决不当清朝的官。他也象其父一样，性喜山水，遍历天下名山大川，把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悉发为诗歌。当清军高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进入江阴城，江阴义民在陈遇明、阎应元等率领下抗清时，李寄积极在城东组织援助，时时关注着战事。在得知江阴义民喋血抗清八十一天而失败的信息后，他愤怒之极，酗酒而跌倒在花山上，幸被乡人发现救回才免于一死。此后则隐居于九莲庵，埋头整理编辑其父的《徐霞客游记》。得悉其父的游记手稿因战乱流失于宜兴，他便徒步专程



去求取。

李寄一生未负乃父。他身世悲惨，境遇坎坷，性格出俗不群；他天资颖异，好学能文，品行出类拔萃；他不追求功名富贵，一心向学，潜心著述。著有《天香阁文集》十五卷，《历代兵鉴》一百二十集，《随笔》十六卷，《舆图集要》四十卷，《秦志摘要》三十卷，《艺圃存稿》六卷，《诗》二十四卷。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为《徐霞客游记》的保存、流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李寄对父亲徐霞客深有感情，对《游记》的散失十分痛惜，曾设法四处搜集，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从宜兴史夏隆处得到曹骏甫的抄本，但经涂抹删改，已非庐山面目。从此，李寄在山居庵对手头的几个《游记》稿本进行认真细致的校勘、补充、订正，他一边翻来覆去地查对、比照季会明和史夏隆、曹骏甫等删改过的抄本，一边又从“日影中照出原本，一一录之”，终于在“滇游日记”中补入《游太华山记》、《游颜洞记》、《盘江考》等季本没有的内容。此本被认为是后来流传诸版本之祖。

几百年过去了，再看徐霞客和李寄的关系，除父子之间的血肉亲情，更象一种文化的传承，是君子对君子的承诺，无需言语，令人感动。

（作者：江阴博物馆副馆长 副研究馆员）

（上接第 11 页）

作为江阴市的老博物馆在各方面都可以主动性加强联络，开展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服务，深入基层做好服务工作。为江阴收藏家、企业家提供技术和理论支持，民间和企业依靠博物馆实现理论支持，博物馆借助企业形成良好合作，争取获得资金和藏品的捐赠，建立桥梁形成互补。

4、要加强区域的合作，形成多渠道的互补。

县市级博物馆在人才、经验、技术、藏品等方面都没有省市级博物馆来的完善和丰富，加强馆际间的交流十分必要。一方面在队伍建，经验、技术上不仅可以学习和借鉴，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交流中可以形成藏品的互补。另外，在交流中学习，在学习中交流，可以提升队伍的素质，提高活动的档次，拓展服务的质量，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馆际交流，取长补短，像依托常

注释：

- ①上海古籍出版社《徐霞客游记》
- ②朱惠荣《诗人徐霞客》
- ③徐霞客《鸡山十景·云观》
- ④徐霞客《鸡山十景·瀑布腾空》
- ⑤徐霞客《鸡山十景·雪观》
- ⑥徐霞客《题小香山梅花堂诗·得横字》
- ⑦徐霞客《题小香山梅花堂诗·醉中漫歌》
- ⑧徐霞客《题小香山梅花堂诗·得壶字》
- ⑨徐霞客《题小香山梅花堂诗·得横字》
- ⑩薛仲良《徐霞客家集·李寄的诗》
- ⑪李寄《附游集·访穹窿白马寺道出湖山闲》
- ⑫李寄《附游集·自阳山至玄墓圣恩寺四十里山水之作》
- ⑬李寄《停车集·绮山访依上人不遇》
- ⑭徐霞客《游桃花涧》
- ⑮光绪《江阴县志》卷 18《人物隐逸传》
- ⑯沙张白《劝友徐介立复姓书》
- ⑰《徐霞客年谱》
- ⑱李寄《偕隐集·喜友人至》
- ⑲李寄《鸣蝉集·思亲》

熟，我们在防霉防蛀上运用了中医药配方，不仅减少了原有防霉防蛀产品对文物的伤害，更保护了操作人员的伤害，我们的标本养护依托上海科技馆，不仅得到了有效保护，更节约了经费。馆际的交流、区域的合作还能带了更多的技术支持，学习先进经验，对藏品的研究、活动的创新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通过交流，宣传了江阴的文化，提升江阴的社会知名度，为城市文化服务，为江阴的经济建设服务。

博物馆只有不断的完善自我，主动融入到社会发展、公众需求中，不断适应时代需求，提升服务品质，才能解决目前萧条状态，才能在城市文明、文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江阴博物馆陈列宣教部主任）



中国文物保护先驱者——刘半农

唐雷霞



西北考察纪念邮票

1934年7月14日,文学家、语言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刘半农,因在内蒙古

团纪念邮票”,是由刘半农的儿子刘育伦捐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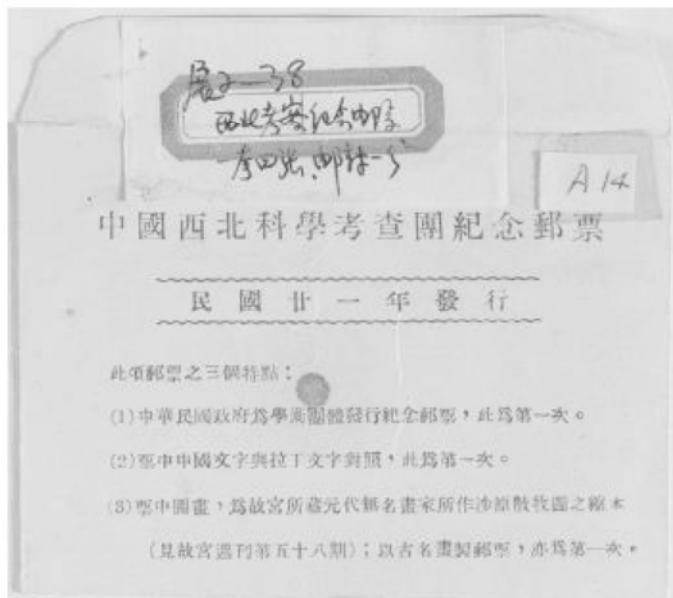
考察时感染回归热,溘然长逝。刘半农是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白话诗歌的拓荒者,同时他博学多才,在书法、摄影、考古学等方面也有突出的造诣。

1989年,刘氏兄弟纪念馆筹建时,刘半农子女将他们保管的刘半农的遗物无偿捐献出来,以此举让更多的江阴人深入了解刘半农,共同来缅怀和学习这位江阴人民的骄傲。其中有他研究语音学亲手创制的语音实验仪器,如乙一、二声调推断尺等;有他创作出版的文学作品,如刘半农1934年1月至6月的《日记》、《欧游回忆录》等手稿;也包括刘半农的相机和摄影作品,打字用的法文打字机等,每一件都记录着刘半农不凡的人生轨迹。其中还有一套十分珍贵的“西北科学考察



“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左右为嘉禾，四角印面值，图案下面有中文和拉丁文字对照，全套4枚同图。1分桔黄、4分橄榄绿、5分玫紫、1角深蓝。这套“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是为纪念中瑞两国学者成功联合科学考察西北，同时也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筹集经费，由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出具公函送交通部核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邀请国立北平艺专教授杜万里设计，由财政部印制局以雕刻版印制，于1932年6月3日正式发行。画面采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反映西北风光的中国名画《沙原散牧图》（也称《平沙卓歇图》，作者佚名）。邮票封套上所印的说明列举了此项邮票的三个特点：(1)中华民国政府为学术团体发行纪念邮票，此为第一次。(2)票中中国文字与拉丁文字对照，此为第一次。(3)票中图画，为故宫所藏元代无名书家所作沙原散牧图之缩本（见故宫周刊第五十八期）；以古名画制邮票，亦第一次。这三个第一足以证明这套邮票在我国邮票发行史上的特殊地位。而这套邮票另外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刘半农为维护中国主权，保护祖国历史文化的卓越贡献这一历史事实的实物见证。

1926年底，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华与北京政府协商，想去中国西北进行他的第五次中亚考察，为了阻止斯文·赫定的单独考察，北大考古学会与其他学术团体于1927年春创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委派刘半农、翁文灏、马叔平三人与斯文·赫定谈判，力争将考察置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控制之下。曾在欧洲留过学的刘半农成为此次谈判的主力，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经过十余次的协商，最终订立合作办法十九条，由中瑞两国学者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随后刘半农被任命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常务理事长，即最高负责人。1927年5月，“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北京出发，正式投入科学考察。刘半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中国学术界第一次争得了应有权利。从这次中瑞成立联合考察团开始，凡是外国来中国进行



西北考察纪念邮票邮封

考古发掘或科学考察，都要签订协定，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监督。

斯文·赫定这位声名在外，曾发现楼兰古城的著名探险家，是第一位同意与中国学术界合作的西方探险家，他以平等对待中国科学家的合作态度，得到了刘半农和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对他的谅解和尊敬。刘半农在与这位瑞典学者长期的斗争与交涉中，也逐渐互相了解，并建立了一定的友谊。斯文·赫定也非常欣赏和敬佩刘半农的才华、为人和爱国主义精神，俩人因而成为一对忘年交。他们还曾一起提议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甚至刘半农的离世也与他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1934年6月，刘半农受国际地理学会之邀代表中国学术界参加为纪念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寿辰而编印的一本世界性的论文集，决定抱病利用暑假赴绥远、内蒙古一带考察方言民俗，不幸感染了回归热而撒手人寰。斯文·赫定在得到刘半农突然逝世的消息后，满怀悲痛，深表悼念。

早在欧洲留学期间，刘半农就对西北文物有了接触。在伦敦学习期间，曾陪同蔡元培调查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物。转学巴黎大学后，还利用业余时间抄录了法国国家图书



馆藏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 104 种，并辑成《敦煌掇琐》，成为中国第一部敦煌学著作。而伯希和正是当年刘半农博士论文答辩时的主考官。1925 年，刘半农学成回国，继续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也开始了他保护中国文物的事业。尤其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创建之后，分别代表官方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和代表非官方的“文物维护会”也相继成立，刘半农担任了“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和“北京文物临时维护会”负责人，更是开展了大量保卫西北文化遗产的斗争。

1928 年，隶属美国纽约天产博物馆的“中亚考察团”在团长安得思的带领下，拿着只是允许打猎的护照，又一次在内蒙古一带强掘史前遗址，盗取大量文物，打算从北京运往天津出口，途中被刘半农所在的古物保管委员会查到。由于当局的软弱只扣留了其中一部分文物，但同时和他们订了协定，“此后如再往内蒙一带发掘，不得自由行动，须先与中国学术团体接洽，双方订立办法，经由中国政府批准后，方可实行”。但到 1929 年春，安得思思想再去内蒙古，他一方面假装与中国学术团体接洽，另一方面又坚持不按平等协商的原则办事，还怂恿北京各鬼子报，大骂刘半农所在的“文物”、“古物”两会，“妨害文化”、“是中国人不懂科学的表示”。刘半农撰文《北旧》，披露事件的始末，痛斥其强盗行径。

1931 年，法国“黄种巡察团”假借与中方组成“一九学术考察团”之名，想在新疆塔里木盆地挖掘盗窃中国文物，并发生了法方违约殴人事件。刘半农在《质问法使参赞韩德威先生》一文中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德威就法方报载对此事件解释中的种种漏洞，问得法方哑口无言。并在另一篇《介绍黄种巡察团》的文章中，介绍了法

方人员的身份及履历，揭露了黄种巡察团成员绝非学者，而是一群以考察为名，行侵略之实的帝国主义分子。撕下了其虚假外衣，将事实昭告于天下。

20 世纪上半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是政府腐败无能的年代，刘半农等中华文化保护的先驱们，与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生死较量，以他们的真实行动争取了中华民族应有的基本利益，并以犀利的笔锋和直观的语言，直击敌人的痛处。虽然他们的努力因为国民政府的软弱，不能完全阻止帝国主义的入侵，但在一定程度上为帝国主义的盗窃活动设下了障碍。以实际行动唤起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的觉醒。刘半农在侵略者面前的铮铮铁骨，为维护祖国主权而竭尽全力的精神，直至今日仍应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作者：江阴博物馆藏品保管部)

参考资料：

《刘半农文选》，198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瑞岳编

《刘半农评传》，1990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徐瑞岳著

《刘半农研究》，1987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徐瑞岳编著

《民国人物传》，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宗志文、朱信泉主编

《刘半农传》，2007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朱洪著

《刘半农传》，2001 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赵沛著



辛亥革命时期的江阴

贡金城

辛亥革命

值此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回想起七十年前的少年时候在纪念周上领读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壮严肃穆情景；重读《江阴市志》中的大事记和《孙中山先生在江阴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以及有关回忆录；对照一百年来，民主社会的风风雨雨，真是感慨万千。无锡的“光复门”以及江阴的“中山公园”和“文明广场”，都是无锡和江阴广大人民永远深切怀念孙中山先生的见证。辛亥革命时期江阴人的自治，以及中山先生关于“江阴文明”的讲话，尤其津津乐道，至今犹有深意。

一、历史背景

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即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和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开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其宗旨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后孙中山先生又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会上公推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主持东京本部的会务工作，重点在于发动武装斗争。

宣统三年辛亥岁八月十九日，即西历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于武昌起义，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宣布独立，反对清政府。

黎元洪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向清廷开战。清廷请出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和钦差大臣，专道前来武昌镇压义军。武昌义军因孤立无援而告失利，但是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南方的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等十一个省市，纷纷宣布独立，反对清廷。由于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以这次独立行动又称为“光复”。原来大清国使用黄龙旗，而起义者尚未明确标志，因而暂时都以白旗为号。江阴同盟会人在11月8日发动各界人士，公推长江水师协镇刘廷柱为军政长，推前清知县刘敬焕为民政长，成立江阴军政府，并在全城遍竖白旗，宣告响应独立。继而组织公团以安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历史性的政治真空期间，这个地方自治组织，即江阴公团，存在九个多月，成效卓著。

11月10日，各省代表公推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次年元旦，即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总统府，正式莅职，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

袁世凯用北洋军镇压了武昌起义以后，掌握了清朝的军政大权，萌发了篡政夺国的野心。首先向南方革命人士表示赞成共和，愿意倒戈反帝，但是推翻清廷以后，要由他出任总统。孙



中山先生等考虑到当时的南方力量还很薄弱，不足以抗衡北洋军，就同意了袁的意见。袁就指使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哗变，通电独立，响应南方号召，反对帝制而建立共和政府。这时清廷内外交困，无力支撑下去，因而在宣统三年丁亥岁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皇帝下诏书宣布退位。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北京。政府主要官员大都由北洋军与同盟会成员出任。袁世凯要南京留守黄兴整编南方各军，黄兴也认为既已成立民国，南方各省军队也宜相应裁减。

民国元年（1912）8月，中国同盟会与其他四个小党派联合组成国民党。而袁世凯则联合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进步党，以与国民党相抗衡。民国二年（1913）10月，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改内阁制为总统制，集大权于一身。任命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铁道部长，黄兴为川粤铁路督办。在此期间，中山先生曾访问江阴并发表了演讲。

然而居心叵测的袁世凯终于在民国四年（1915）12月，废除民国而改称中华帝国，建元洪宪，自称皇帝，因而孙中山、梁启超等纷纷组织护国军讨袁，南方各省宣布独立，即使北洋派也酝酿倒袁。次年（1916）3月22日，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就取消帝制，宣布恢复中华民国。而江阴的著名人士南菁书院掌教章际治，积极反对袁世凯称帝，充分表现了江阴人民的忠义气节。

二、江阴公团

辛亥革命之前，团结在反对清帝的旗帜下的党派会盟甚多，其总部大都设在上海的租界内，以便活动。江阴有孙中山的同盟会、黎元洪的共和党、以及社会党和共进会筹组支部。其中同盟会已经在黄山炮台、电雷学校、长江水师、陆军内部有支部，城区则由邢绍基等人组织支部，借县城隍庙的后房为会址。1912年8月，江苏省政府派同盟会人洪钟来任县知事，这里民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任县长。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城隍庙西厅即桐梓堂开支部会议，公推洪钟为名誉部长，县人祝丹卿为正部长，钱伯钧、章砚春为副部长，邢绍基、郑志任总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江苏省响应号召，反对清帝，宣告独立。11月8日，江阴同盟会人和各界人士聚集到已废的江苏督学察院内开会，成立江阴军政府，公推长江水师协镇刘廷柱为军政长，江防营标统徐继斌为副，并在城内遍插白旗，宣告“光复”。接着又成立江阴公团以维持地方秩序。公推前清末任知县刘敬焕为民政长，地方人士吴汀鹭、章际治、郑粹甫为财政长。由陈砚香、陈慕周、郑立三任总务，陈鲤庭任审判长，陈唯生任检察长，冯涤斋为警务长，章逸三为庶务会计长。

其时，清帝逊位，中央和地方各级衙署，都等候民国政府派员接收、改组。其间有几个月的真空时间，处于无政府状态。江阴公团只是一个地方自治组织而已，所以刘敬焕出任民政长，只是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因而除了根据公团决定签名之外，不献一策，平时仍旧到江阴旧县衙门（地点在县湾街）住宿看守，以等待新政府派员接收。章砚春先生在《江阴光复记》中写道：“遇有军、民两部相关事务，刘、徐两人辄来公团协商。双方水乳交融，毫无间言。”这就是“和平过渡”吧！

最为棘手的军饷问题，也被公团顺利解决了。清时，江阴驻军甚多，有长江水师、要塞炮台、长江营湘军。清饷已断，民国军饷未定，军心浮动。然而公团财长挺身而出，如期照发，决不短缺，因而军心大定，地方安宁。

是年初，大水三日夜，低洼之处，尽成泽国，哀鸿遍野，公团先办急账，然后赴沪募捐，民生大定。

1912年8月，省里派洪钟来任民政长，建立民政署（县政府），这是民国第一任县长，前清知县刘敬焕卸职离任他去，江阴军政府与江阴公团同时撤销。至此，江阴人民的惟一一次自治政府，历时长达九个月左右，宣告圆满终结。充分显示了江阴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自治能力，并不一般。民国期间的县政府就设在东大街上的旧学使署内。

三、中山莅澄

《江阴市志》在大事记中写道：“民国元年（1912）10月19日，孙中山乘‘联鲸’号兵舰，由上海来江阴视察炮台，应江阴国民党和社会党



人邀请入城，在桐梓堂发表演说。晚六点，乘舰去镇江，并且收录了《演说》全文。《江阴文史资料集粹》则收载有两篇相关文章，其一是当年记录曹一尘写的《民元国父莅澄史话》，原载于1946年的《民锋日报》与《江声日报》联合刊上，另一是当时朗读欢迎词的章砚春先生写的《孙中山先生莅澄记》，二文内容基本一致。

曹一尘说道：“民国元年，国父孙中山先生任全国铁路督办，分赴各地视察。是年秋，视察江阴要塞，乘联鲸兵舰，由黄山港江滨登陆，（今文明广场就在其附近），随从者仅马君武氏一人。时江阴县知事为洪钟（字声如），警务科长陆宸卿（尚未设局），商会总理吴汀鹭、国民党江阴支部理事长祝丹卿，副钱伯钧、章砚春，暨地方士绅（南菁书院掌教章际治等）齐集黄山炮台欢迎，并以江阴至无锡建筑铁路为请，原呈由祝丹卿领衔，当而递呈。”恭请先生入城，到县城隍庙的桐梓堂内演讲。仪式简单隆重，接待也仅黄烧饼和馒头二品，先生对几文钱一件的烧饼备极赞美，二色点心，各尝二件。堂内阶下，挤满听众。先生讲演一个多小时，始终精神奕奕，谈笑风生，而听众动容，掌声不绝。晚六时许，会议结束，先生乘舰上溯省城镇江。

先生讲演全文约三千余字，言简意深。曹一尘写道：“按当时情形，确宜建马路，不宜建铁路，一语道破，听者恍然，咸佩服国父之见解及理论超越常人。”实际上这是一次越级请愿，要求建筑锡澄铁路支线以发展江阴经济。先生却从小处着想，晓以大义，简单而圆满地答复了这个“请愿”，并且还宣传了“当家作主人”的大道理。

先生说道：“今年是民国成立的第一年，我们推翻了专制政府，改建了共和民国。……从前的专制国是皇帝的国家，现在的共和国是人民公有的国家。……但是我们做主人翁的，要晓得做主人有主人的资格，有主人的学问，有主人的度量。一国的人民都有一定要尽的义务，大家尽了义务，方能算是主人。”这些话，至今犹有深意。

先生谈到铁路时说：“兄弟曾听得外国的一个博士说，一国文明的起点，全在人民知道修路。外国人常说中国很野蛮，他就是从中国没有

马路（公路）、路政不讲究看出来的。倘是没有造马路，就是有铁路，也不能发达的。”还算了一笔细账，造铁路大约要化一百六十万元，而造马路三十万元，可以大大减轻地方负担。所以又说：“诸君既要想法替江阴的交通生色，不如筑一条大马路。做成了全国的一条模范马路，给大家做个榜样，叫全国的文明，从江阴发起，这就是兄弟今天对诸君最大的希望。”

“全国的文明，从江阴发起”，是九十九年前中山先生对我们的期望。回忆七十年前，在母校振华小学的纪念周上领读“总理遗嘱”的庄严肃穆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千，而又欣喜非常。

民国十七年（1928），县内筹建公路，到解放前，境内有锡澄、常澄等线共51.7公里。到1987年为止，干、支线公路达241.317公里，还有高速公路，乃至铁路。真是大路大富了。今年8月20日在江阴召开了“2011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交流年会”，宣布：江阴再获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第一，实现“九连冠”。

四、南菁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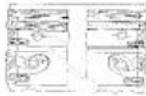
清光绪八年（1882），江苏学使黄体芳在两江总督左宗棠等的支持下，创办了一所两江名校——南菁书院。崇尚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忠义气节，试行古学今学兼习的新式书院模式，开展教学相长、自由研习的学术风气，不但名动一时，至今犹有学习价值。培养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人才，堪称中华文明的一朵奇葩。辛亥革命时期的表现也颇足称道。兹据赵统著《南菁书院志》概略介绍如下。

在书院领导中间，缪荃孙与章际治的学术造诣都很高，而且也是师生关系，然而在“反袁称帝”的态度上截然不同。民国三年（1914）要求袁世凯总统称帝，并发动全国各界名流共同上书敦请。江阴缪荃孙大史参加了劝进，而书院监督（时称南菁为高等文科第一类学堂）江阴人章际治却坚决拒绝。缪先生晚节不保，为时人所垢病，因而郁郁以终，而章先生却始终为人所尊敬。殊不知缪先生曾经叱责康梁变法为妖孽，自然也就赞成袁氏称帝了。

南菁书院的学生中间，不少人对辛亥革命抱支持态度，对袁氏称帝坚决反对。

吴稚晖，名敬恒，在书院求学时名朓，以字

辛亥革命



行，武进雪堰桥人。1905年在英国伦敦会见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1912年建立民国以后，不肯做官，却组织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二批学生有六十余人，其中就有邓小平先生。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海外，袁氏失败后方才回国。

庄蕴宽，武进人，书院优秀生，清拔贡，官广西梧州知府。既崇尚洋务，主张实业救国，又同情革命党人。1903年任广西龙州边防督办，创办广西陆军测绘学堂、广西政治学堂和步兵教导团，请书院同学同盟会人钮永建、秦毓温等来主持教学。这些新学、新军，后来都成为后清革命的基本力量，甚至在讨袁中也起了重大作用。1903年，先后以经济支持吴稚晖流亡日本，并掩护黄兴等逃出镇南关（今称睦南关）。深为孙中山、黄兴所器重，辛亥革命时参加上海光复、江苏独立活动，1912年元旦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府以后，任江苏省都督（省长）。杨度等的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时，庄任北京总统府的肃政厅肃政使，上书袁世凯，反对称帝。

钮永建，上海松江人，在书院求学时与吴稚晖、孙擦一为莫逆交。1903年留日时，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黄兴等130余人签名参加。回国后应广西边防督办庄蕴宽之邀，任边防大营总文案兼教导团团长，后又筹备广西陆军小学，创建广西新军。以事不密，流亡海外。武昌起义后，回到上海，组织义军进攻驻宁江南制造局（生产军火武器）的清兵。事败，到松江老家成立松江军政府，宣布独立，配合上海起义。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钮为参谋本部参谋副长，以助理黄兴。袁氏阴谋称帝时，钮随孙辞职，组织二次革命，钮以总参谋长身份组织敢死队，在上海围攻制造局长达七昼夜之多。事后，流亡海外，继续倒袁。

李平书，上海宝山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派任上海机器制造局提调后，倡导上海自治。蔡元培先生在其墓志铭上写道：“创上海地方自治，为全国倡。辛亥，上海响应革命，以其智且勇，指挥赞助，迅奏厥功，奠定东南大局，保全无数民命与物力。”

白毓昆，南通人。在南洋公学、北洋政治学堂任教时，年青学子例如中共领导人李大钊等

曾其薰陶参加革命者甚众。武昌起义后，在滦州发动起义，动摇京师。

张一麐，苏州吴县人。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幕僚。袁任总统时，张出任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后反袁称帝。

秦毓鎏，无锡人。早年参加华兴会，民国元年任总统府秘书、无锡民政长，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时被捕，入狱三年。

五、黄帝纪年

中华文明古国历史悠久，为世界各国所尊重。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热爱中华，在引进西历的同时，提倡了双日历制度和夏历纪年法，为继承、捍卫和发扬中华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清光绪三十二年（1908），在日本建立中国同盟会之时，创办了《民报》，由章太炎担任此机关报的主编，就发起了关于夏历纪年的讨论，都认为应以黄帝元年为夏历纪元和干支纪年法。由于夏历是以阴历为基础的阴阳合历，对农事、航海和人民生活使用非常方便，是世界上一种相当完善的历法。始于夏朝，但是纯阴历，以后商、周、秦都各有历法，汉初承用秦制，采用颛顼历，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方才开始使用新的夏历，一直沿用至今，人民称便。

由于五帝年份分歧较大，因而黄帝元年也就有多种说法。孙中山先生坐任临时大总统的日子为西历1912年1月1日（今称公历），而夏历在当时则为清宣统三年辛亥岁十一月十三日。那么夏历纪年又是那年呢？当时《黄帝魂》认为是夏历4622年，《江苏报》认为是夏历4402年，而《民报》则认为是4609年，因为他们对黄帝元年的说法各不相同。

现就《民报》主张谈谈他的折算方法。其与公历的折算方法极为简单，然而必须注意，夏历年近岁底之时，公历先增加了一年。所以宣统三年丁亥的折算年份是公历1911年和夏历4609年丁亥，而民国元年壬子的折算年份却是公历1912年和夏历4610年壬子。换言之，夏历的折算年份较公历多出2698年。今年是公历2011年，折合夏历4709年辛卯岁。然而辛卯岁十二月初七，已是公历2012年1月1日了，因而实际年份要比折算年份大一年。

（作者：原上海电力学院副教授）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先生到江阴

陆云湘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 1911 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社会上和海外事务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辛亥革命一词最早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 1912 年 6 月,收录了 1911 年 10 月 11 日至 1912 年 2 月 12 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将“辛亥革命”用于书名中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

辛亥革命期间奔赴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 1911 年 10 月 9 日至 1912 年 2 月 13 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1919 年 8 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12 年 10 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见》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门名词,沿用至今。总之,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中华民国的诞生,也就没有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提倡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他告诫爱国将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912年10月19日，孙中山先生乘“联鲸”号兵舰，由上海到江阴视察黄山炮台，他应江阴国民党和社会党人士的邀请，并以轿相迎入城，在庙巷的桐梓堂发表演讲，演讲中他提到，来到江阴接到一信，提议从无锡横林到江阴建造铁路一事，孙中山先生解释说：“因为造一里铁路，照沪宁铁路的样子说起来，每里要花四万多块钱，全程岂不是要花一百六十万么？若是造公路，每里要多不过五、六千块钱，大概有了三十万总可以了。所以他劝导江阴各界人士，还是建造公路为好。……诸君既要想方设法，替江阴的交通生色，不如筑一条大马路，做成全国的一条模范马路，给大家做个榜样，叫全国的文明，从江阴发起，这就是兄弟今天对诸君最大希望。”孙中山先生演讲后，于是当晚六时许，江阴各界人士仍以轿相送，而后登舰去镇江。孙中山先生到江阴，并作了演讲，给江阴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是对江阴人民的极大鼓舞，在江阴的历史上增添了重重的一笔，堪称：百世流芳。

民国十四年(1925)，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江阴南菁、励实学校学生会捐建孙中山先生

纪念塔，该塔建在原江阴寿山公园。民国十九年(1930)更名中山公园，今忠邦亭的西侧，塔座、塔高总高度近八米。以青砖砌成，水泥石灰抹面，塔座为八角形，塔身为四方形，下宽上窄，各面均有“孙中山先生纪念塔”的字样，并署上两校校名，塔四周有8根花岗石立柱，围以铁练护栏，在风雨中展示了七十七年。2002年原孙中山先生纪念塔被拆除，在同一中轴线上北移80步，寿山脚南45步的中心点上，新建了一座汉白玉质地的孙中山先生纪念塔，塔座、塔身、总高度、形状、字样与原塔基本相近。

一代又一代的江阴人，崇敬历史伟人孙中山先生，纪念历史伟人孙中山先生。永远不忘辛亥革命后诞生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到过江阴，并对江阴各界人士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针对交通筑路一事，倡导：“叫全国的文明，从江阴发起。”这句话含义深刻，永远激励江阴人民开拓创新，不断前进。

(作者：江阴市原文化局文化科科长)

2011中国·徐霞客学术研讨会在江阴召开



翁雪花和德国学者 bianca、沈俊鸿、陈锡良会议期间在徐霞客故居前合影

2011年3月28日上午，“2011中国·江阴徐霞客学术研讨会”开幕。来自意大利、德国、台湾、香港、大陆等地的国内外“徐学”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同探讨徐霞客精神以及在当代的意义。中国徐霞客研究会会长、原地矿部副部长张宏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徐冬青，副市长袁秋中出席开幕式。江阴市博物馆副研究员翁雪花提交论文并作为江阴代表上台做了学术交流和发言。

(雪花)



江阴城南的老街旧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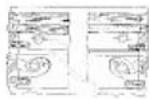
车导明

在城市的建设改造中，原来的那些年代久远的老街、古巷和旧屋，正在逐渐减少，终至趋向消失。我市拆迁中的南门，曾经是江阴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他为江阴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创造了昔日的辉煌，也曾多次遭受战火兵灾的浩劫，战乱痕迹，至终犹存。江阴广大百姓，对于南城一隅的那些起源于明代、破旧的老街、旧屋，河流和桥梁，经历了太多的往事和见闻；萦绕着太多的怀念、眷恋之情。希望下面的一组照片及其说明，能够唤起我们的记忆，让我们静静地来重温那已经离去的城南旧貌，细细地来领略那不可再创造的历史积淀，深深地来感受其所蕴涵的那份无可比拟的凝重感和沧桑感。

一、江阴南门外高明桥(简称高桥)下的石子街。旧时，在这条街上，形成了规模盛大的土布市场，这里曾经是江阴城乡众多纺织户的原料供应地和土布产品的销售窗口。当年，久负盛名的江阴民间纺织产品——线呢、杜布和兰花布等，大部通过这里销至各地，甚至远销海外。



二、石子街中段，旧时这里市面繁荣，店铺林立，有多家颇具规模的纱号、布庄和颜料店；有茶馆、酒肆、书场、鱼摊和肉铺；还有何家的铁匠铺、小林根的咸货行以及唐、戚两家酒坊，丁、庄、邓三家米行；更有多家专为织布机制作“竹筘”的“扎筘店”……每日早市，街上人流如潮，人声鼎沸，买卖兴隆，热闹非凡。



三、石子街上段。左侧是王亦旦经营的“王仁记布庄”旧址。王出生于书香之家，这位儒商经商致富后，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曾出资、出力在高明桥东堍的法喜庵（三官堂）中，创办了澄南小学。王亦旦又是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沈鹏的外祖父。与王仁记布庄相邻的老屋，是与郭沫若、成仿吾和郁达夫等同为创造社骨干成员的作家叶鼎洛的旧居。



四、石子街中后段，这里是周守衡经营的“周隆泰”油坊和南货号的旧址。当年“前店后坊”的“周隆泰”，占有 5 开间、6、7 进的房屋，总面积约有 2000 余平方米。后周家的“油车屋”为南郊唐家村的唐阿春、唐阿洪俩弟兄租赁，在此经营颇具规模的酒坊多年。



五、周家内宅一角



六、石子街中后段，右侧石库门内是周少山经营的天伦布厂旧址，周曾一度担任江阴花纱布同业公会之会长。这里也是周少山之长子周文楷的出生地。周文楷于上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获得经济博士学位，后任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为著名的华裔美籍经济学家，他还曾受聘于两届美国政府商业部，担任经济顾问。周生前数次偕夫人和子女返乡省亲时，都在此老宅中盘桓和会见亲友。



七、石子街中后段，这里是郭炳荣经营的同裕布厂旧址，同裕布厂的后门紧靠运粮河，河边建有混凝土结构的码头，街上居民称它为“郭家码头”。郭家与街上其它早期的工商业业主，所经营产业和殷富的家业，均毁于日寇侵占江阴的兵灾中。





八、石子街后段,这里向东(右)有一支街,在支街的巷门外,有座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园通庵,由此向东南可去板桥和花山嘴。左侧门户内的大片老屋,为江阴望族邓氏之老宅,也是邓传楷的出生地。邓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在大陆时,他曾供职于外交、教育两界,去台后,生前曾担任台北省教育厅厅长、教育部次长和澳林匹克主席等职。



九、石子街西侧的运粮河,此河随长江而潮流、潮落。旧时,河深流急的运粮河也是连通长江与江南大运河的百舸争流,异常忙碌、拥挤的河流。



十、旧时,这里被称为“三角潭”,是运粮河(左)、东转河(右)和新开河(前)三河的交汇处,也是端明桥和高明桥构成的“八字桥”的原址。每当夏秋汛期的早晨,通江之水随涨潮从端明桥西的新开河汹涌涌入,在河中形成急流和许多漩涡,此时成百上千的过江船只竞相穿过桥洞,进入险象环生的三角潭的情景,异常惊险且

壮观。此时,船家在此弄潮航行,确是对他们的技术、勇气和力量是一次考验。两座古老、雄伟的石拱八字桥,已于上世纪 60 年代拆除。



十一、东转河以及河边的河东街。旧时这里是江阴兴旺发达的造船业所在地——古老的滩船帮和浪船帮的旧址。在工商业改造中,船帮里的大部业主和众多船匠,转入扬子江造船厂,为本乡造船业作出了贡献,由此,这里昔日的滩船帮和浪船帮,堪称是江阴造船业的发祥之地。



十二、端明桥西之新开河,是连接北门和南门水路的古老人工河。旧时,这里(右侧)设有轮船码头。那种由汽轮拖拽木船的航船组合,是当时江阴与无锡和常熟之间,客、货主要交通、运输工具,民间称它为“跑风”。每日随潮水涨落、早出晚归,始终顺潮行驶的“跑风”,是当年新开河和运粮河上的一道风景线。在轮船码头旁,有家颇有名气的包子铺,因其原址曾经是个“坑缸”,故南门居民戏称它为“坑缸板上的馒头店”



十三、运粮河西侧的埠下街，为一条“半边街”。北起端明桥，南达五云桥，整条街在旧时是纤夫拉船行进的河边“纤道”。在街的中段有座黄公祠，祠旁有驻节亭(接官亭)，是前清县太爷率众迎接学政大人来江阴上任的地方。这里曾经也是“二月初八”集场的所在地。



十四、位于石子街街尾的五云桥，疏浚中的运粮河。河之东畔的一片，称为“仓基”，在清咸丰年前，为“江南粮仓”所在地，这也是运粮河得名之渊源。五云桥建于清嘉庆年间，桥上环洞南北两面，东西两侧刻有楹联。南联曰：“桥卧长虹

亿万姓咸歌利济；江澄净联百千年常庆安澜”；北联曰：“建一邑之鸿规会其有拯；乐四民之利济惠节无疆”。该桥已列为我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五云桥已彻底修缮，被修得十分美观、漂亮，犹如一件年代久远破旧的古家具，被翻新并涂刷了油漆。



十五、南门外的忠义街，位于东转河西，故旧时原称“河西街”，这里南连八字桥、石子街和埠下街。向北通过“平冠桥”，可进入城门上砌嵌有“忠义之邦”四个大字的江阴城的南门(朝宗门)



(作者：原江阴驻京联络处主任)



花山与余城古城遗址



唐汉章

夏商周三代属于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也是中国区域文化相交汇融合的时代。考古学把这一时期的江苏大致分为太湖、宁镇和徐淮三个文化区域，然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太湖地区夏、商、周时期文化面貌的认识，仅限于上海的马桥文化，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但这二支文化还不能涵盖这一段历史空白。花山与余城古城遗址的发现解决了这一考古界的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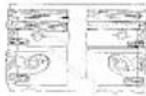
花山遗址与余城古城遗址，位于江阴市云亭镇花山村境内。其西为花山，北为绮山，东为毗山，南为较平坦的平原。烧香河（今称为白屈港）由北向南从两遗址中间穿过，河东岸为余城古城遗址，河西岸即为花山遗址。考古发掘证实，花山遗址和余城古城遗址是同一时期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

1998年12月初，江阴博物馆考古人员下

乡作调查时，在花山村配合锡澄高速公路建设进行大面积平整土地的汤家村自然村周围，发现排列有序、数量较多的火塘遗迹，并采集到一些陶片、豆足及陶拍残件。时隔不久，又在高速公路东侧的薛家村村南平整土地现场发现大量印纹陶片，器型十分丰富。经进一步调查，这一遗址范围很大。其北至花山自然村南，东至烧香河，西达峭岐钓台村，南一直延伸到烧香河的一条支流，面积可达几十万平方米，为一处大型古文化遗址。因其位于花山东麓的花山村境内，故命名为“花山遗址”。

同年12月18日至30日，由南京博物院、无锡博物馆和江阴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开探方18个，探沟2条，发掘面积近500平方米，出土陶片上万片，修复陶器80件，种类有红陶、灰陶、黑皮陶、硬陶、原始瓷等，而以红陶数量为最大，其中夹砂陶多素面，

文化
遗
产



泥质陶则多梯格纹、云雷纹、曲折纹；灰陶多泥质陶，纹饰亦以梯格纹、云雷纹为主。这些陶器器型丰富，有鼎、釜、甗、罐、鬲、盘、豆、匝及陶拍、陶纺轮等等。除陶器外还出土有石斧、石锛、石凿等石器，青铜冶炼块和掘铜三足陶勺。

在花山遗址发掘的同时，考古队对烧香河东岸的高家墩进行了调查。这是一处明显高于四周的一块台地，尤其是南端有一条东西向高突出地面数米，西即为烧香河，东亦有一条南北向内河，其南北各有一条河浜伸向高地东侧。名为高家村的自然村座落高地中心稍偏北的位置。2000年初春，经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考证，是一座古城遗址。原先余城只是江阴云亭镇的一个行政村名，这时才明白所谓的高家墩实际就是江阴史志缺载的余城古城遗址，终于解开了这一千古之谜。

余城古城呈长方形，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约400米，总面积约32万平方米。余城东、西、北城墙均已不存，经对南城墙解剖可知余城城墙采用“墙壕并重”的堆筑方法，即以一层沼泽稀泥间一层黄土逐层堆筑而成，墙体宽、高多在10米以上。墙外经取土形成壕沟，蓄水成为护城河。现在的烧香河和东边的一条河都是原先的护城河，城南和城北虽然护城河填塞成农田，但护城河的痕迹十分明显。

考古专家们认为，余城与常州武进境内春秋末期的淹城，共同代表了长江下游战国之前未被中原夯筑法取代的一种筑城模式，比之时代较早的武进寺墩遗址的围壕，代表了真正意义上城的出现。余城为青铜时代长江下游第一古城。

余城西边的花山遗址及其城址周围遗存，实际是城内和城外的关系。根据出土器物判断，余城主体可相当于马桥文化。马桥文化是存在于夏商时期的一支文化，因首先发现于上海的马桥而得名。考古专家们根据余城和花山遗址出土的许多口沿内敛的陶豆，与其它遗址所出类似陶豆和原始瓷豆的形态相比较，其年代可以肯定要晚到西周，这就意味着余城遗存的发生时间可以早到夏商，而其下限，则已达西周。它同江阴许多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的土墩墓中所出原始青瓷豆，存在着直系血缘般的文化联

系。如果把苏南地区的土墩墓视为吴文化的遗存，这一意义非常巨大，它填补了太湖地区早期吴文化的空白。

关于吴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吴文化，泛指吴地的文化；狭义上的吴文化，则指先秦吴国的考古文化。从商末太伯建“句吴”到公元前473年夫差被越王勾践所灭，传21世，延续约近700年。吴国晚期的遗址到目前为止，在苏州、无锡都有发现，而早期吴文化遗存在太湖地区几乎还是空白，尤其是泰伯奔吴和立国之地也仅限于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

相传周初，周天子长子泰伯为避王位携弟仲雍奔荆蛮，建立了吴国。关于泰伯奔吴的首奔之地，存在着多种说法，较为集中的是荆楚说和太湖流域说。而太湖流域说又有宁镇说和梅里说（即今无锡梅村），而梅里说又占了上风。虽然此说在《史记》等古籍有所记载，然而由于缺乏考古成果的实证，因此这一说受到考古界的质疑。

花山遗址和余城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实物，为泰伯奔吴提供了新佐证，早在周初泰伯奔荆蛮前的夏末商代，余城就已经存在了。而在山观的望海墩、周庄的倪家巷，甚至江阴老城区“澄江福地”都采集到与花山遗址和余城遗址时代一致的陶片，说明当时这一带已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而且已有较好的原始社会形态，因此筑城用于生活或用于防御，意味着它是荆蛮人建立的一个古代方国古城，为周初泰伯奔吴奠定了坚实基础。

《吴越春秋》记载：“泰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余城面积与此记载几本相符，也符合周礼关于侯国筑城规制，又说“外郭三百余里（一说三十里），名曰故吴墟，人皆耕田其中。”外郭三百余里之说似不可信，三十里倒还可能，山观望海墩、周庄倪家巷、江阴老城区均距余城二、三十里。

在花山遗址和余城出土的诸多陶器在浙江肩头弄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湖南岳石文化、上海马桥文化、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中都找到了渊源关系，证明古时江阴地区是东西南北文化交汇之地，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然而其中的素面鬲与绳纹鼎和甗等陶器均不见于其它文化，



而与泰伯老家陕西周原出土的同时代陶器明显相关联,透出从北方所带来的文化气息,这些陶器的文化因素是泰伯从中原带来的,只有这样才能解说这些陶器千里迢迢出现在这里的原凶。

为什么泰伯、仲庸会选择江阴作为落脚之地?有专家研究认为周人为良渚人先祖蚩尤之后,他们回到江南一为寻根,二为拓展周朝疆域。他们断发纹身,入乡随俗,得到荆蛮人拥护,献城作为勾吴立国之都。这与古籍记载的“泰伯奔吴,有蛮人千余家来归附”相合。在余城西不远有一处钓台古迹,建有姜太公庙。姜太公80岁时在渭水边为周文王访得,拜为丞相,后助周武王起兵伐纣,完成兴周大业。泰伯及其后人既是周人之后,当然不会忘记这位功臣,建庙祭祀亦在情理之中,这就不能理解在这偏僻之地有这样一座庙宇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江阴是泰伯奔吴首先落脚之地,余城应该是泰伯利用荆蛮方国城所建立的吴国早期都城,早期吴文化的发源地。后来,随着吴国不断强盛,疆域的扩大,吴国都城才逐步南移无锡、苏州。至于有学者认为“吴国都城是由今陕西城固向湖北秭归、江陵,湖南宁乡,江西樟树、余干,安徽休宁,浙江安吉,江苏丹徒、苏州越城等处逐渐迁徙的。”这一说有点离谱,无人能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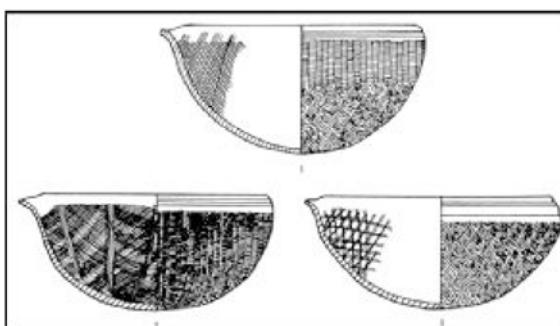
花山遗址和余城古城遗址还反映了良渚文化的信息。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江南的一支文化,其高超的制玉技术和墓葬级别的差异,显示出良渚人等级观念,“已隐现国家雏形,初露文明时代曙光”,它的影响及其广泛和深远。从横向看,其影响范围遍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石峡文化等等,甚至远到陕北延安地区都发现过大量良渚式玉器。从纵向看,夏商周时期诸如高台基宫殿建筑,琮、玉、圭、璋等瑞玉的使用,以至青铜礼器广泛使用的饕餮纹等,都可以追溯到良渚文化。然而辉煌的良渚文化在4000年前突然消亡,使江南古文化发生近200年左右的空白。多少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良渚文化受灾北上以后,便在江南地区就此消失了。然而花山遗址中让我们发现了良渚文化的踪影,从而证实良渚文化的主体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良渚人的部分后裔还顽强地

生活在江阴地区并依然发挥着作用,这对良渚文化的后续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花山遗址出土陶器中的澄滤器有153件个体,一个遗址能出土如此之多,数量远远超过了长江下游江南地区诸遗址。这些澄滤器以泥质红陶最多,共有145件,而黑皮陶仅6件,泥质灰陶仅2件,装饰均以梯格纹为主。而其形制大体一致,均为带流、敛口、弧腹、圜底,口沿以下布满纹饰,内壁刻划规整有序的若干道,若干道复线凹槽纵横交错成菱形图案。

澄滤器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崧泽文化时期,江南地区的上海青浦、江苏常熟、浙江嘉兴等一些遗址均有出土,在江阴周庄的龙爪墩崧泽晚期文化遗址中,亦出土过一件。这件澄滤器与花山遗址所出澄滤器外形基本相仿,只是素面无纹饰,小平底,尖窄流,内腹刻线简单稀疏。

关于澄滤器的用途,考古学家们认为这是一种原始的酿酒器。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偶然发现粮食和野果可以酿酒,便制造出这种专门的酿酒器。当食物在澄滤器发酵成酒,饮用时顺槽和流可以轻易地倒出饮用。在花山遗址与澄滤器同出的还有一件漏斗状陶器,可能两者配套使用。



花山遗址出土的澄滤器

据此,江阴的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而至3000多年前的夏商时期酿酒技术已相当普遍。那个时候酒已成为先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从而创造了酒文化。而从另一个方面则印证了当时的原始农业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先民们已有了剩余的粮食,才能用来酿酒。



铜箭镞



铜块



铜勺

从花山遗址的一条灰沟里还出土一件保存完好的亚洲象臼齿化石。在余城遗址西北角发掘出400多平方米干栏式建筑遗址，柱洞排列有序，这么宏大的建筑遗址在同时代遗址中也极为少见。人们可以想象，那时曾生活在江阴地区的纳玛象也许已消失，而亚洲象却仍生活在这里，由此证实当时的江阴地区水草肥美，原始森林茂盛，生态环境优美，先民们住在干栏式房屋里与万物生灵和谐共存，由此促进了人类自

身的发展。

从花山遗址出土的青铜冶炼工具三足掘铜陶勺和青铜渣，证实江南地区的青铜文明在夏商时期已经起步，而从余城出土制造精良的青铜块和镂空箭簇说明，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了一定程度。从而改变了当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候，江南地区还处于茹毛饮血蛮荒时代的旧论。人们在研究中国青铜文化起源的时候，必须正视江阴花山遗址和余城遗址出土的这几件青铜实物的重要性，而给予一席之地。

花山遗址和余城古城遗址的文化虽然有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具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内涵，考古专家们认为用“余城遗存”来表达该遗址的特点。余城遗存的发现，为解决太湖地区周代与马桥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线索，至春秋战国时期，应为吴越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同时由于花山遗址和余城遗址的发现，弥补了江阴乃至太湖地区夏商文化的缺环，使江阴7000年人文历史一脉相承。

(作者：江阴博物馆原馆长)



江阴姓氏源流考略(八)

刁文伟

谱牒研究

十一 吴氏

吴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前十位的大姓，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二。江阴的吴姓也为大姓之一，在江阴分布很广，各地皆是。

吴姓的来源也很复杂，但最普遍的说法是出自姬姓，以国为氏。商末，泰伯、仲雍奔吴，建立了勾吴国。周朝建立以后，封周章为侯，遂改国号为吴。春秋时期，吴为越所灭，其王族支庶之子孙便以国号“吴”为姓，泰伯成了吴姓的得姓始祖。其它吴姓的起源如出自颛顼帝时期的吴权之后裔；出自有虞氏；出自夏代少康时著名弓箭手吴贺之后裔；以及民族融合而产生的改姓、赐姓等等。尽管很复杂，但笔者所查阅的诸多《吴氏宗谱》无一例外皆为泰伯之后。

江阴吴姓目前有谱可查的有十三支之多，现分别介绍如下：

一、延陵吴氏

宗谱有：

1、《延陵吴氏宗谱》，清·同治七年(1868)木活字本，清吴森榕等修纂，十四卷，上海图书馆藏。

2、《延陵吴氏宗谱》民国三年(1914)木活字本，二十卷，首二卷，22册，堂号“让德堂”。山西家谱协会、美国犹他家谱协会收藏。始迁祖为宋代吴梓，北宋庆历(1041—1048)中自延陵迁居江阴。故这支迁入江阴的时间有近千年了。

二、后底泾吴氏。

宗谱有：

1、《后底泾吴氏宗谱》十九卷，首末各一卷，20册。清·光绪十三年(1887)木活字本，清·吴鑑清等修纂。2、《后底泾吴氏宗谱》25册，民国三十八年(1949)铅排本，民国吴增甲修，堂号为“源德堂”，苏州图书馆、九如堂皆有收藏。始迁祖吴源，南宋咸淳间自无锡梅村迁居江阴后底泾。

三、夏浦吴氏。

宗谱有：

1、《延陵夏浦吴氏宗谱》光绪十五年(1889)



木活字本,20册,清吴竹贤等修纂,江阴博物馆藏。

2、《延陵夏浦吴氏宗谱》民国十八年(1929)木活字本,民国吴希敬等修纂,二十八卷,首一卷,22册,上海图书馆、江阴博物馆藏。二谱堂号俱为“观止堂”,始祖为吴源,宋·咸淳间自无锡梅里迁江阴后底泾,始迁祖吴海,明代自江阴城东后底泾迁至本邑夏浦。

四、青阳吴氏。

宗谱有:

1、《延陵吴氏续修宗谱》十卷,清·吴邦法纂修,光绪七年(1881)木活字本,共十册,堂号为“至德堂”。

2、《延陵吴氏续修宗谱》十册,民国·吴凤照纂修,民国十三年(1924)版本,堂号为“至德堂”。这两套宗谱俱藏于吉林大学,始迁祖吴格,字迪民,元末自锡邑梅里徙居江阴花塘,后迁青阳。查阅《青阳镇志》中称现在青阳吴姓来源有二:其一为元代从无锡迁来花塘(今属月城),后裔吴胜楚移居青阳,指的就是这支青阳吴氏。

五、璜村吴氏。

宗谱有《澄江璜村吴氏宗谱》十册,民国二十四年(1935)木活字本,堂号为“至德堂”,民国·吴顺根修,苏州图书馆、山西家谱协会、九如堂、江阴档案馆俱有收藏。该谱的新修谱《吴氏大统宗谱澄江璜村支谱》于2008年修成,八卷十册,江阴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俱有收藏。

据该谱吴洪铨(十七世)撰《存惠公派澄江璜村支系繁衍概况》云“宗自梅里泰伯延陵季子之后,奉唐末后梁吴存惠为上祖,传至宋末吴泳,已迁至松江,历四世,其一支由松江迁毗陵,再经五世至吴慎于明初永乐年间由毗陵迁至澄江璜村,为澄江璜村吴氏始祖的由来,至今璜村吴氏分为六房,繁衍至二十二世,六百余年”。该支吴氏主要分布于江阴南闸、夏港之璜村、虞家村等地。

六、顾山(平江)吴氏。

宗谱有:

1、《顾山吴氏宗谱》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吴毅廷主修,十二卷,附老宅支谱一册,堂号为“滋德堂”。顾山吴良元收藏、张耀宗抄本。始迁祖为泰伯、仲雍之八十六世孙富二公吴

启于元末明初为避张士诚乱,自平江(苏州)迁居江阴顾山之北后长。

2、《顾山吴氏宗谱长泾邵巷支谱》一册,2006年新修本,堂号为“至德堂”。源流情况为泰伯八十六世孙吴启(富二)于元末明初自苏州迁至顾山之北后长,再十世吴睦由顾山徙长泾邵巷上……”。由此邵巷为顾山(平江)吴氏的分支。

七、顾山(休宁)吴氏。

宗谱有《顾山吴氏宗谱》清·光绪元年(1875)木活字本,1册,清·吴人鋐修,堂号为“崇让堂”,顾山吴起凤藏、张耀宗抄本。第一世吴应会,字景素,安徽休宁县泰溪上村人,四子,其中二子有智、有信奉母迁江邑顾山,时间为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

八、顾山(陈巷)吴氏。(七房庄吴氏)

宗谱有:

1、《延陵吴氏宗谱》三十七卷,民国三年(1914)木活字本,二十四册。民国·吴肇桐修,堂号为“让德堂”,常熟博物馆藏。系出自泰伯、仲雍之七十四世吴重,字富二,号士宏,居伞墩,元至正间遭张士诚部将朱定之害,留下八岁遗孤吴世铭,由姑父陈子章收养,改姓陈姓,居江阴南街,至八十二世吴元城,字君守,嘉靖年间倭乱,宅屋被毁,遂卜居顾山北麓,筑居二十余亩,名陈家巷,至清代初期,恢复吴姓。笔者在介绍陈氏源流的时候,专门介绍过三块出土于黄山南坡的明代墓志铭,其中陈辙、陈惟父子的墓志铭就明确记载了由吴改陈姓的经过。

九、南街吴氏。

宗谱有:《江阴吴氏宗谱》五卷,首一卷,清·吴鸿甲纂修,光绪二十二年(1896)木活字本,共二册,堂号为“九如堂”,无锡图书馆藏。始迁祖为吴嘉言,原安徽休宁人,清初由浙江嘉兴迁江阴,居城内南街。

十、严渎吴氏。

宗谱有:

1、《严渎吴氏宗谱》四十卷,清·同治八年(1869)木活字本,二十八册,清·任震初修纂,堂号为“思敬堂”,历史研究所收藏,历史研究所还藏有光绪二十七年版本。

2、《严渎吴氏宗谱》二十二卷,民国三十四



年(1945)木活字本二十二册,民国吴松如修纂,堂号为“三让堂”,上海图书馆藏。始迁祖吴谦,元季时自荆溪入赘江阴,洪武初卜居严渎,自后又分居顾山南市、东街等地。

十一、二侯吴氏。

宗谱有:《吴氏宗谱》十二卷,十二册,民国二十五年(1936)木活字本,民国·吴纪培主修,堂号为“至德堂”,江阴九如堂收藏,始祖为吴革,字洪量,后九世吴良佐明太祖定天下,封江阴侯,为江阴始迁祖,其子吴侑从祀延陵祖庙,世居夏港,孙海山公入赘华氏,世居前栗山之北后栗山,为后栗吴氏始迁祖。

十二、昆山吴氏。

宗谱有:《吴氏宗谱》2005年新版本,共十一册,吴会昌主编,堂号为“三让堂”,江阴档案馆藏。据沈国清撰《续修毗山三让堂吴氏宗谱序》云“一世祖吴范,时称‘八行先生’,其儿子仲基、仲达昆仲俱登绍兴进士。仲达为暨州同知,籍于江邑,十六传而至庠生吴师中,卜居于昆山西麓,为昆山吴氏始迁祖”。迁至昆山的具体时间应该是明代。

十三、峭岐笆斗桥吴氏。

宗谱有:《中华吴氏大统宗谱》2004年版本,一册,江阴档案馆藏。其序言《重修笆斗桥吴氏家谱序》云“清·康熙年间,始祖景荣由桐岐(青阳镇)吴家村迁居峭岐笆斗村,生三子,称大房、二房、三房……”。这支吴氏来自无锡,据《吴氏宗谱》(无锡图书馆藏,1951年铅排本)载:“宋代太一、太二、太三为锡山本支,传至八十五世逐渐分支,其一支迁至桐岐。”峭岐笆斗桥即为其分支。

因资料尚未公开而无法得知其源流的吴氏情况:

1、华西村个人收藏《吴氏宗谱》一套,公布的材料称其堂号为“三让堂”,二十二卷,二十二册,民国三十四年(1945)版本。笔者据此判断该谱与严渎吴氏家谱很相似,应该是同一谱。

2、华东村个人收藏《吴氏大统谱》,堂号为“至德堂”,民国版,缺少部分,仅公布的这些信息尚无法判断其概况。

3、《吴氏周庄倪家巷支谱》林龙森主编;《吴氏(云亭支)宗谱》1996年版,一册,吴俊标主

编,皆为新修本,因未见宗谱,故无法得知其概况。

上述列举了有谱可查的江阴目前吴姓各支,共计有十三支。下面,笔者结合文献再对这十三支吴姓再做进一步的考证:

延陵吴氏、后底泾吴氏、夏浦吴氏、顾山(陈巷)吴氏这四支应归属一支,始祖皆可追溯至北宋庆历年间迁至江阴的吴梓,延陵吴氏是总根,其它三支为其支系。缪荃孙《江阴续志·氏族志》中提到了江阴的六支吴氏,其中有三支出自该家族,与家谱的记载的是相吻合的。如提到“后底泾吴氏”——“吴梓,宋时由山东徙江阴,奉延陵祀。吴石绍兴辛未进士……吴源咸淳戊辰进士官江淮道,始由夏港迁城东后底泾,清初吴士心为杨文定受业师,有高行……吴增甲癸卯进士官编修”;“夏浦吴氏”——“吴石之兄铎生子博古,后分二派,一居夏港,一居大桥镇七房庄……”;“七房庄吴氏”——“邑城内小校场有延陵季子分祠,系七房庄吴氏奉祀……吴聘珍清光绪壬寅举人”。

查阅明·崇祯《江阴县志》,卷三宋甲科:“吴石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吴博古为绍兴二十七年进士。”叔侄俩人皆中进士,可见其家族在当时是何等风光。后底泾始迁祖吴源为咸淳四年进士。光绪《江阴县志》有载。另外,笔者所列的夏浦吴氏有别于缪氏《氏族志》中的夏浦吴氏,虽然两者同根,但毕竟各有所指,还是有必要澄清一下为好。顾山(陈巷)吴氏为缪氏《氏族志》中的七房庄吴氏之分支。陈惟大墓志铭曰:“君本同邑吴姓,为宋侍郎博古之后,吴孤育于陈,遂袭陈姓……”;陈辙墓志铭曰“其先本吴姓,出泰伯之后,至宋南都有讳博古者,登王十朋榜进士,官至侍郎,实处士远祖也……”始祖为泰伯七十四世吴重,迁顾山陈巷为八十二世陈(吴)元城。有关延陵吴氏的介绍,江阴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江阴著姓望族》中有沈俊鸿先生撰写的《季札后裔后底泾吴氏》一文,对后底泾吴氏的源流情况作了很详实的考证,在此不再赘述。

“二侯吴氏”在缪氏《氏族志》中记载较为简略:“吴良与弟桢先居安徽定远县昌义乡,为明太祖勳臣。良封江阴侯、晋江国公;桢封靖海侯、



晋海国公，遂居江阴，建祠虹桥。良孙亮·太祖命入监读书，不愿仕，归隐于江阴之西崇教里。”虽然地方文献记载太过粗略，所幸《明史》对此兄弟二人的记载甚为详实，至于野史、笔记中的记载更为后人称道。《江阴著姓望族》中程以正先生撰《江阴二侯吴良、吴桢世家》一文，对二侯吴氏的源流与事迹作了详实的考证。江阴博物馆藏有一方明代墓志，志盖曰“大明海国吴六公子墓铭”。志文曰“大明海国景六公子墓志铭，公子姓吴氏讳渊字彦深，世为凤阳府定远县人……定帝业、克常州、守江阴、因家焉。及海内定鼎，授清海侯爵禄，追封海国襄毅公，先考禧二府君由功臣长子随侍东宫，出入禁闱，授西安护卫镇抚，后调云南攻取蛮寨，建功立业，升明威将军陆凉卫指挥佥事……生公昆弟三人，长兄季善，袭先考前职……公生于洪武己巳三月十一日，卒于正统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三……生男一人曰绍，女二人……以是年五月二十五日葬于江阴县顺化乡黄山之原，次兄彦博涕泣而铭”。志主为吴渊，其父为吴祯长子，袭爵，生有三子，志主排行第三。墓志铭将吴桢这支的大致情况说得很清楚。很显然，二侯吴氏中吴桢这支是居住在江阴城内，繁衍下去了。因为未见到谱牒，最终的去向尚不清楚。九如堂藏《吴氏宗谱》，乃二侯吴氏中吴良这支的谱牒。其序言：“后栗吴氏从明室元勳江阴侯良嫡孙海公为始迁祖。”其父为吴侑。按缪氏称“良孙亮不愿仕，归隐于江阴之西崇教里”，海山公即为吴亮，目前保存下来的谱牒仅为吴良之孙吴亮这分支。而吴桢分支未见有谱牒。江阴博物馆藏吴六公子墓志铭，将吴桢的世系介绍的很清楚，并且准确性很高，结合程以正文，吴桢的世系为：

吴祯——吴忠——
(世袭长子) ——吴季善(袭爵)
——吴彦博
——吴彦深(渊)——吴绍

墓志出土黄山南坡，应为家族墓地。

“顾山吴氏”：缪氏《氏族志》中云：“元明之际平江吴渊因避张士诚之乱迁居江阴顾山”。《江阴著姓望族》中张耀宗先生撰《工商致富发家的顾山吴氏》，对这支队初迁入江阴的吴氏作了最全面的介绍，在此笔者不再赘述。

“南街吴氏”：缪氏《氏族志》中云：“吴嘉彦本安徽休宁县庠生，清初由浙江嘉兴迁江阴，居城内南街。吴鸿甲，光绪丙戌进士，官刑科给事中。”此记载与家谱材料极为吻合。吴嘉言，地方文献中有记载。

“昆山吴氏”：按其序言第一世祖为吴范，其二子仲基、仲达昆仲俱登绍兴进士，在查阅光绪《江阴县志》选举甲科：“吴仲基，字叔行，迪功郎，宣和六年进士，吴仲达，字仲容，青阳丞，绍兴五年进士。”昆山吴氏始祖在江阴文献中确有著录。两者之间的差异在登仕的时间，方志上为宣和六年和绍兴五年，家谱上俱为绍兴进士。其它记载都相似。

江阴博物馆还收藏了一方宋代吴氏墓志铭，年代为北宋早期，志主为江阴葛氏家族中葛官、葛密之母。她所处年代显然要早于上述介绍的十三支吴氏，但这支吴氏的源流因无谱牒和文献资料，情况无法得知了。

(作者：江阴博物馆副馆长 副研究馆员)

参考书目：

《顾山文献录》，张耀宗著，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谈二胡在江阴的嬗变

邵振良



二胡演奏 (黄丰 摄)

二胡又名“胡琴”，这是一种人人熟悉的乐器。它的改进、发展，以至登上大雅之堂，都与江阴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胡产生于 1000 多年前的唐朝，当时称作“奚琴”，是我国最重要，也是人们最为喜爱的民族乐器。根据北宋陈旸在他所著的《乐书》中记载：“奚琴本胡乐也”，就是说“奚琴”的发源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后来流传开来。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有诗说：“中军制酒饮旧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可见胡琴在唐代就已经流传并被人们重

视。到了宋代，胡琴又取名为“嵇琴”。宋末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记载：“‘嵇琴’本嵇康所制，故名‘嵇琴’，二弦，以竹片轧之，其声清亮。”就是说，那时的二胡，不用马尾作琴弓，而是用竹片轧弦，发出声响。

到了宋代，出现了以马尾做弓的二胡。大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八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弦，只用一弦终其曲”。嵇琴高手徐衍在宫廷宴会上，由于演奏太投入，居然把嵇琴的一根弦拉断了，“二胡”成了“一胡”。在古代，人们都把拉断弦看作是“凶兆”，在宫廷出现这样的事更是严重，弄的不好就会被皇帝杀头。徐衍急中生智，面不改色，手中的弓不停，指不乱，竟然在剩下的单弦上继续拉奏，直到把曲子演奏完毕。徐衍独弦奏曲，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取决于他的机智和对乐曲乐器的精通。从此以后，独弦演奏便被确定为嵇琴的演奏技巧

非遗拾珍



之一，沈括称徐衍演奏的独弦曲为“一弦嵇琴格。”沈括还在《梦溪笔谈》卷五中记载：“马尾胡琴随汉东，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说明在北宋时已有了马尾的胡琴，上面徐衍拉的单弦嵇琴很有可能已是马尾作的弓。元朝《元史·礼乐志》所载“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进一步阐述了胡琴的制作结构。

从元代开始，“嵇琴”这一乐器名称渐渐被“胡琴”所替代。甘肃敦煌石刻中飞天手持胡琴的图像，明代《麟堂秋宴图》中所画的胡琴，与今天的二胡形状已很相似。到了明清时代，胡琴已普遍用于各种戏曲伴奏的民间器乐的合奏，并且演奏技巧有了很大的提高。近百年来，二胡的演奏更是进入了兴盛时代，逐步成为江南丝竹等民族乐队中的主奏乐器。并逐步繁衍成二胡、粤胡、中胡、京胡、坠胡、四胡、板胡等不同类型的胡琴大家族。

但是胡琴的发展历史是缓慢的，自元朝至清末民国前，变化不大，没能在胡琴曲目建设、乐器制造和演奏技术上作出更大的突破。当时，二胡这件民间乐器根本不能与琵琶、古琴等乐器相提并论，往往被认为是“不可登大雅之堂”，只能算是玩具琴或者是在街头巷尾酒肆茶楼卖艺的“叫花子琴”。不能用于独奏，也根本没有二胡独奏曲，主要用于戏曲音乐及曲艺音乐的伴奏。基本上使用一个把位（上把位），在伴奏音乐中若出现超越一个把位的乐音时，使用翻高八度或降低八度的方法演奏（俗称老少翻）。在许多地域性的民间器乐合奏曲中，二胡也是沿用这种方法。

20世纪初，二胡在江阴得到了跨越性的发展。江阴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对二胡的演奏开始了从一个把位到三个把位的演奏探索。20世纪20年代，中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江阴人刘天华，对二胡的演奏更是作了大胆的创新，他所创作的二胡练习曲和10首二胡独奏曲把二胡的音域扩大到四个、五个把位，创造了四把位、五把位的演奏手法。并吸收了西洋弦乐器的一些演奏手法，使二胡的性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大大提高了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从此，二胡摆脱了原来仅处于伴奏、合奏的地位，成了一件具有

特殊韵味的可以进行独奏的乐器。从20世纪初起，在周少梅、刘天华、刘北茂等一批音乐家的努力下，二胡艺术有了重要的改进和创新，登上了音乐艺术的大雅之堂，开创了二胡艺术的新纪元。

周少梅（1885—1938），名守逢，号少梅，江阴顾山镇人。中国二胡音乐的拓荒者。他出生在一个琴师家庭，8岁就学会了演奏二胡、琵琶。青年时代就成为江南知名的“丝竹能手”。22岁起就先后在无锡荡口华氏鸿模高等学校、无锡第三师范、省常州五中、武进女子师范等学校担任30多年国乐指导老师、音乐教员。他在当时社会上鄙视民族音乐的历史条件下，以非凡的胆识，率先将二胡的形制进行了改革。二胡由琴筒、琴杆、琴轴、千斤、琴弦等组成，改革前的二胡为“一把头二胡”，琴杆长76cm，周少梅设计把琴杆改进为81.5cm，并加大了琴筒，更换了琴弦，使二胡的音量、音色有了很大的改进。他还将在前人局限在二胡上把位的演奏，扩展到上、中、下三个把位来演奏，使二胡的音域范围得到了充分扩展。周少梅的这一改进轰动了当时江南琴坛，被誉为“周少梅三把头胡琴”。为适应这种改良胡琴，他还编写了《乐乐集》、《国乐谱》、《戏曲谱》三本曲谱集，作为教材。当这些训练曲目中出现了逾越把位的乐音时，便注明移其他把位，并注有移把的指法等。在二胡主要演奏技法上，周少梅还形成了连弓、顿弓、连顿弓、颤弓（抖弓）、甩弓（小抖弓）等右手技法；颤音、滑音、泛音、垫音以及揉弦、拨弦、弹弦等左手技法。当时在常州五中工作的刘天华也被周少梅这种改革深深吸引，积极向他学习“三把头”胡琴。从此以后，“低庸下品”的二胡有了很大的发展。江南民间器乐和地方音乐早先运用“托音胡琴”的较多，自周少梅开始改用“主音胡琴”。刘天华向周少梅学习，后来把主音胡琴的定弦法带入了高等学府，使这种演奏方法在专业队伍中继承了下来。周少梅率先将丝竹名曲《六板》改编为《虞舜熏风曲》，成为近百年来第一首二胡古曲；他还先后在无锡、苏州、常州等中、小学校教授二胡，使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第一次登上了学校讲坛，培养了二胡演奏的人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少梅的种种创举，实为



难能可贵。因为正是这些创举,为后来二胡从长期处于伴奏乐器升华到一种完美的独奏乐器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周少梅还利用教学之余,收集流行于江南一带的民乐、戏曲音乐,进行改编整理,编写了《国乐曲谱》、《顾山清明曲》、《划龙船曲》、《苦中乐》、《苦中行》等二胡曲。1925年至1932年在无锡活动的几年期间,他还常同阿炳(华彦钧)在一起交流切磋二胡、琵琶技艺;1917年至1922年年轻的刘天华曾向周少梅学过二胡、琵琶,特别是学习了他改编的《虞舜熏风曲》中三把头胡琴的技艺,这对刘天华后来二胡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刘天华(1895—1932),字寿椿,江阴澄江镇西横街人,中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家,中国现代二胡音乐的奠基人和胡琴艺术的开拓者。他一生致力于“中西揉合”以“改进国乐”。他不但广泛学习各种民间音乐,继承了“周少梅三把头胡琴”技艺,还刻苦学习了小提琴和西洋作曲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对二胡的定弦、音域的扩展、演奏技巧、训练等进行了全面的重大改革。首先明确二胡使用国际标准音高定弦法,结束了长期以来二胡以固定音高的主观随意性定弦方法,采用固定音定弦法,将二胡的内弦定为D,外弦定为A,使二胡的定调趋向科学,音调得以统一。这一创举大大提高了二胡的艺术表现力,使二胡的地位从伴奏提升到独奏的领域,登上了音乐的大雅之堂。

刘天华在1915年完成了处女作《病中吟》初稿,这是二胡历史上第一首由作曲家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它的出现,为二胡艺术的全面、迅速、高水平发展,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同时带动了其他民族乐器,诸如琵琶、古筝、笛子等的创作、表演、教育传承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刘天华还首创谱写了47首二胡练习曲,从简到繁,由浅入深,有目的地训练各种弓指法。

在二胡的发展历程中,刘天华是第一位把二胡列入高等艺术院校的正式课程的音乐导师,培养了一代优秀的二胡传人。他谱写的《光明行》、《良宵》、《病中吟》、《闲居吟》、《空山鸟语》、《光明行》等10首二胡曲,不仅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而且为二胡曲的创作,提供了典范经

验。他的这一创举,促成了一个崭新的二胡专业学派。因此,刘天华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直接和间接地培养造就了储师竹、蒋风之、陈振铎、刘北茂等一大批卓然不凡的二胡演奏家、二胡教育家。他们沿着刘天华开创的道路,努力从事二胡教学、演奏和创作,涌现了一批二胡演奏人才和二胡曲作品。如今,刘天华的二胡曲仍然是海内外二胡教学的重要文献和音乐会的经典曲目,仍然是中国音乐宝库中的一份宝贵财富。

刘天华对二胡发展的贡献:(黑体为刘天华的创新)

1、伴奏—独奏—有乐队伴奏的二胡演奏—二胡协奏

二胡发展史:2、民间口传心授—二胡曲谱—独奏曲谱—高等院校学科之一

3、一、二把位—五把—七把

刘北茂(1903—1981),江苏江阴澄江镇人,刘天华的胞弟,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受其兄刘天华的影响,他在二胡演奏、教学、作曲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倾注毕生精力,取得累累硕果。培养了很多二胡音乐家,作品有《汉江湖》、《小花鼓》、《前进操》、《太阳照耀到祖国边疆》、《漂泊者之歌》等100多首二胡曲,也大大推进了二胡的发展。

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江阴市十分重视二胡事业的发展。首先加强了二胡资源的保护。江阴市名贤研究院对周少梅、刘天华历史文化名人资源进行整理,并通过结集出版书籍、开展研讨活动、举办纪念活动等手段,向全市人民广泛宣传先辈的民乐和二胡音乐成就。修缮建设一批民乐和二胡音乐名人故居和纪念馆,充分挖掘保护文化名人和文化遗产,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刘天华故居及其延伸建筑光明园由市政府投资500多万元,进行整体修缮和建设;在新建的博物馆内建成了刘氏兄弟业绩馆;2008年1月,包括民乐和二胡音乐名人的《江阴名人馆》建成对外开放;2008年11月3日著名的民族音乐家、二胡演奏家、改革者周少梅故居和纪念馆在其家乡江阴顾山镇建成对外正式开放;座落在兴国园扩建的西园内的展示江南丝竹发展历史和二胡音乐名人事迹的《江南民族音乐博物馆》已经立项筹建。另一位



著名的民族音乐家郑觐文的故居和纪念馆也即将在其家乡澄江街道筹备建设。

其次是对二胡传统的弘扬。在江阴的城市建设中，江阴市人民政府充分利用二胡音乐的元素，让二胡音乐的形象溶入城市建设让人们的心中。一是投资6亿多元建成了天华文化中心和刘天华广场。天华文化中心广场更是以刘天华主雕塑、民族音乐柱、琵琶湖、光明塔和《光明行》五线谱石级等组合而成。充满了民乐和二胡音乐情韵的天华文化中心位于城市客厅的主要位置，成为向世人集中展示城市文化的主窗口。二是民乐和二胡音乐的景观布满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城市西大门有抚琴而静思的刘天华雕像，有修缮一新的刘氏故居，有以二胡名曲《光明行》命名的光明园，从景点设置到命名处处体现着民乐和二胡音乐；从城市东区的名人文化带，到城市之北的黄山湖公园，在诗情画意的环境里，悠扬的江南丝竹和二胡名曲一直是公园的背景音乐。

2005年江阴市拨出专项经费，出版了《江阴历史故事》集，其中详细讲述了发生在郑觐文、周少梅、刘天华等民族音乐家身上的故事；2000年拍摄了电影故事片《刘天华》；2006年协助中央电视台完成了《中国音乐百年》民乐部分的拍摄工作；2007年中国江阴刘天华研究会在江阴挂牌成立，将出刊《刘天华研究》。

第三，加强了二胡人才的培养。1985年，江阴市天华艺术学校创办，至今已发展成为特色鲜明、设施完备、师资力量雄厚的民营特色学校。20多年来，培训民乐人才2万余人，3000多人次分别获得市级以上各类艺术奖项，上百名学生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艺术院校。以学校为主要载体组建的天华艺术团，现有团员近200名，乐团已8次进京演出，6次亮相中央电视台，并先后成功出访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和中国台湾，尤其是2003年在被誉为“世界最高音乐圣殿”的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功献演“天华之声”中国民族交响音乐会，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进入金色大厅演出的市(县)级民乐团。

江阴近年来涌现了“天华民乐团”、“周少梅

国乐社”、“江阴市文化馆少儿艺术团民乐队、丝竹乐队”、“红太阳民乐团”等各级民乐队伍50余支，遍布全市各个乡镇、企业、社区、学校、家庭，队员涵盖了各个阶层的不同年龄段，而且在逐年增长。由江阴市文化部门授牌成立的国乐社有二十多个。全市有各类艺术培训机构10多家，学习民乐的人数已达数万人，每年参加民乐（包括二胡）考级的学员已近5000人。尤以学习二胡的人数最多。

近年来，江阴先后向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各类艺术院校输送了100多名优秀学生，其中赵志坚、蒋煜琪等人在全国青少年二胡比赛中获奖。

2000年拍摄电影故事片《刘天华》最后结束的场面，需要几百人来演奏《光明行》，当导演大着胆子提出这个要求时，没想到一夜功夫，江阴文化和教育部门就集中了300多位拉二胡的孩子，在300多把二胡壮丽感人的《光明行》乐曲声中，影片把刘天华的二胡情结演绎到了极致，把电影的主题推向了高潮。由此可见，在江阴这块美丽的土地上，二胡音乐的文化底蕴是多么的深厚，长江后浪推前浪，江阴的二胡新秀人才辈出，二胡事业后继有人。

1995年以来，江阴市已成功举办了10届全国青少年民族乐器（包括二胡在内的）演奏比赛；1999年我市还与中国乐器协会联合举办中国民族乐器制作大赛，促进了民乐事业的发展；定期举办“天华故乡民乐风”大型音乐会，成为检阅民乐事业的盛会；经常性开展的自娱自乐的广场民乐活动，深受群众的喜爱；同时，国内外的民乐团频频来我市交流演出，有效促进了我市民乐事业的蓬勃发展。2007年江阴市成功举办了“中国江阴刘天华民族音乐节”，以后每两年举办一届。另外通过中国江阴刘天华研究会的挂牌成立和《刘天华研究》的出刊等一系列的举措，加强国内外民乐界和二胡音乐界的交流、合作，从而推动江阴民乐及二胡音乐艺术研究向更高层次演进。

二胡艺术，在江阴得到了蓬勃发展，将会更加繁荣！

（作者：江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2011年考古资讯

周庄镇庙墩土墩墓钻探及抢救性发掘

2011年2月,受文广新局委托,考古部征集从2月20日至3月12日对庙墩进行考古勘探。庙墩位于东林村仲家巷村村南的平地上,平面形状近似长方形,为三级台地,最高处距现在地面约3米,墩体占地面积为5548.5平方米,墩顶坐标为东经 $120^{\circ}24'143''$ 、北纬 $31^{\circ}53'199''$,海拔高度9米。



此次考古勘探采用每隔1米探孔的梅花探点法布探孔,范围为墩体全部,来了解该墩的地层结构。该墩地层按照土质土色可分为6层。在该墩东部缓坡采集的2个原始瓷碗,东面缓坡③层覆盖的区域是墓室的所在地,但是由于后期破坏,墓室及随葬器物已不存在。综上可以判定庙墩是个春秋时期的土墩墓。

在钻探过程中,在墩东南接近干涸水塘处发现一处合葬墓,呈南北方向排列,竖穴无椁单棺,棺木为楠木条拼合而成,已开始腐烂变形。墓主尸骨都已经腐烂,仅存一些已呈黑色的麻布纤维。棺内出土陶罐2个、青花瓷碗4个。从出土瓷器形制、青花纹饰判断该合葬墓的时代为明代晚期。

青阳悟空寺塔基清理



2011年8月15日开始,为了配合青阳镇政府建设观音文化博览园这一工程建设,受江阴市文广新局的委托,江阴市博物馆考古部对塔基进行恢复性清理。在清理中发现塔基八角形基础内侧保存完好,外侧的石基础东面的两条以及北面的两条均已不见。西面保存完好,南面略有缺失。塔基外的铺地青砖及条石踏步尚存,唯北面已经不完整,且都有隆起变形的情况。七口大缸的地层及缸体基本保存完好,但地层出现了隆起塌陷的现象,缸体有破损、变形的情况。中心地宫发掘区内基本保存完好,发掘区的四壁及底都已清理出来,北壁内凹、下陷,底部有晚期堆积,因较深未清理到底。地宫的盖石已断裂、倾斜,地宫的四壁围石保存完整。

通过清理发现,与2003年发掘时的原貌相比,目前的塔基保存情况不容乐观,缺失、变形、碎裂等现象较为普遍,亟需要采取措施进行加固和整修。

考古资讯



五里亭明墓发掘

2011年5月25日,江阴市博物馆得到110通知,澄江街道西郊五里亭经济适用房工地发生古墓被挖事件。被挖的墓葬为土坑竖穴砖室墓,内有木棺。文物为木棺内出土,计有破残的锡质明器20件、铜镜1面、残破的木梳1个(无法复原)。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看,该墓年代为明代晚期。



江阴青山在历代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所葬的墓区,该墓位于青山的西北角,从地理位置看,应属于普通墓葬区。从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判断,规格不高,平民墓的可能性较大。

江阴利港镇宋墓发掘



10月26日,江阴市利港镇兴港路教育中心工地,发现夫妇合葬墓一处,江阴博物馆进行了清理。两墓并排而建,头向北,外为砖室券顶,内为木棺,从东至西编号为M1、M2。M1棺木朽坏,墓主只存头骨,砖室北壁有2个壁龛,随葬器物倾倒在北壁和木棺之间,出土陶罐1、器盖1、陶灶1。M2无壁龛,无出土物。另外在墓旁采集到白瓷碗底1、团花形青铜镜残边1,应该出自这两个墓。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看应为宋代墓葬。

青阳镇悟空村明墓抢救性发掘



2011年3月与4月,江阴市青阳镇悟空村路修建时两次发现明代墓葬。这两次发现的墓葬共7座。第一次发现4座,南面的两座为夫妇合葬墓。墓向均为南北方向,土坑竖穴,外为石椁,内置木棺。共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银器等十余件器物。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断,下葬年代为明代。第二次发现墓葬三座,位于第一次发现的墓葬西部约30米,已经在上世纪中叶平整土地中被村民破坏,通过村民口述与《长泾夏氏宗谱》的记载,判断为夏氏涤塘墓地,墓主为夏谅、夏谅妻邹氏与夏谅母李氏,第一次发现的墓葬与第二次发现的墓墓向相同、年代相近,且相距不过三十米,有可能属于同一个墓群。

(周利宁)



2011年文博大事记

大事记

1月

10日 江阴市博物馆在金银玉石馆举办“范遥青竹刻展”，25日结束。

28日，江阴市博物馆在陶白书画馆举办“翰墨书画苑藏品展”，3月28日结束。

2月

12日上午，全市专题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建设推进会在市政府第一会议室召开，正式启动全市专题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建设。

22日，周庄庙墩钻探，基本了解庙墩的堆积情况，该墩为春秋时期的土墩墓。3月31日结束。

25日，南通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在江阴博物馆举办的“南通、苏州锦绣神针刺绣展”结束，该展览自2010年11月30日开始，为时近三个月。

本月开始，核查全市文物普查文物点数量，修改了文物点GPS数据，确定本市上报文物点的数量确定为317个。至7月20日，完成江阴市文物普查工作报告初稿。

3月

6日，乌克兰国家博物馆馆长、美院院长、美术家等参观刘氏兄弟故居。

8日，江阴博物馆对徐霞客故居晴山堂石刻进行修复保养，11日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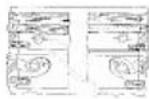
18日，中国音协二胡学会副秘书长杨光然、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乔建中等参观刘氏兄弟故居。

26日，江阴博物馆在奇石馆举办“文艺复兴图片展”，至7月30日结束。

28日，江阴博物馆在书画馆举办“何鸣先生花鸟精品画展”4月28日结束。

23日，对青阳镇悟空村明代墓葬进行考古发掘，4月2—6日再次发掘，共出土了铜镜3件、白瓷碗2件、簪2件等文物。

24日，按照省文物局、省公安厅《关于开展



全省博物馆安全检查专项活动的通知》要求,市文广新局、市公安局对江阴市博物馆安防情况进行联合检查。

28—29日,威尼斯政府代表团应邀访问江阴,参加江阴徐霞客国际旅游节相关活动。双方就交流和合作编译意大利语版《徐霞客游记》和拍摄《徐霞客与马可波罗》纪录片等项目达成了初步意向。

4月

11日,完成全市各博物馆、纪念馆2010年度博物馆年检工作。

15日,沈鹏艺术馆举行开馆仪式。

19日,按照中宣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文化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通知要求,完成对全市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实施和新增情况的调查和统计。

21日,市文管办邀请文保专家对市级文保单位顾山红豆树树体的保存情况进行调查,制定方案,当月完成对树体的加固支撑和抢救保护工作。

24日,全国人大常委、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参观刘氏兄弟故居。

26日,江阴博物馆科研部对馆藏大炮进行养护,30日结束。

27日,江阴博物馆文物普查员赴南通参加为期两天的文物普查工作报告培训班,学习文物普查工作报告写作要求和方法。

29日,无锡市公安局、无锡市文化局、江阴市文管会、江阴博物馆对刘氏故居安全检查。

30日,江阴博物馆在金银馆举办“李伟紫砂展”,5月15日结束。

5月

7日,上海科技馆对我馆自然标本馆进行养护,并对5件剥皮标本进行了全面修复。11日结束。

9日,组织乡镇文化中心主任、文物保护业余监管员进行文物保护知识培训,增强文保工作者的专业素养。

18日,江阴市博物馆在服饰馆举办“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专题展览“博物馆与记忆”,6月17日结束。

“江阴博物馆馆藏古代金银器展”作为江苏省文物局2011年精品文物巡展项目之一赴连云港展出。并于“5·18国际博物馆日”开展,展出时间一个月。

25日,澄江街道西郊五里亭经适房工地发生古墓被挖事件,文管办联合市博物馆考古部前往现场实地勘查,并积极配合公安部门,提供文物鉴定等专业协助。

28日,在要塞司令部旧址举行纪念刘半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龚振东副市长出席,市文广新局、市文联、暨阳名贤研究院及地方文史专家参加座谈。

江阴博物馆赴北京进行馆藏刘氏兄弟文物的复制工作。

6月

11日,江阴市博物馆在陶白书画馆举办“沈克山水画展”,14日结束。

15、16日,谢辰生、张忠培、马自树、杨志军等国家名城委、国家文物局专家领导以及清华大学李秋香教授参观丰硕紫檀博物馆、沈鹏艺术馆、徐霞客故居,对我市文博工作提出宝贵建议。

18日,江阴市博物馆在陶白书画馆举办“云峰画苑及江阴精品展”,7月5日结束。

7月

11—13日,意大利纪录片摄制组完成合拍纪录片《徐霞客与马可波罗》江阴部分的拍摄。

12日,省公安厅、省文物局联合检查组对市博物馆进行安全检查,下发《关于要求市博物



馆进行安防整改工作的通知》，加快落实整改。

12日，接受省公安厅、文物局、无锡公安局、文物处、文广新局、江阴公安局、文广新局等有关部门来馆进行馆风险等级及安防系统达标检查。

15日，江阴市博物馆在陶瓷馆举办“陈嘉庚珍藏外国文物精品展”，30日结束。

20日，市文管办下发《关于加强博物馆藏品档案设置和规范馆藏文物对外借展工作的意见》，规范博物馆藏品档案建设和对外借展工作。

28—29日，市文管办、市文化综合执法大队、文保专家对全市重要文保单位、控保单位进行巡查。

8月

14日，江阴博物馆接收夏港文化中心捐赠的由毛泽东签发的朱杏南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18日，市文广新局、市宗教局、悟空寺、青阳镇、市博物馆召开泗州大圣宝塔遗址的抢救性保护协调会。

24日，江阴市博物馆与江阴市钱币学会联合举办“薛耀基钱币收藏展”，9月15日结束。

20日—27日，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对江阴第七批文保单位开展测绘工作。

9月

1日，根据省文物局通知要求，配合“文物保护单位开放利用标准”课题研究，完成对全市各级文保单位基本情况的全面调查梳理。

2日，江阴博物馆与吴江博物馆联合举办“铁血丹心显风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书画展，22日结束。

15日，完成2011年度文博优秀论文征集工作，共上报3篇文博论文参加无锡市文化遗产局初评。

22日，刘氏故居负责人应邀参加李岚清在南京举办的个人书法、篆刻、素描艺术展开幕式。

26日，江阴博物馆馆藏金银器赴仪征博物馆展出，10月23日结束。

26日，刘半农外孙女、刘小慧三女儿方摹文夫妇（美籍）回家乡参观刘氏兄弟故居。

24日，江阴市邮政局与江阴集邮集报协会在博物馆举办集邮集报展，10月2日结束。

10月

8日，江阴博物馆在陶白书画馆举办“大雅堂故宫复制画展”。

10日，江阴博物馆对城东街道长山烟墩江南重工工地墓葬进行清理，出土春秋、汉代文物20件，为春秋时期的大型土墩墓，14日发掘工作结束。

11日，完成沈鹏艺术促进会年检。

12日，第七批文保单位标志牌投入制作。

17日，市文广新局会同市公安局对市博物馆安防整进展情况进行复查。

18日，江阴博物馆在陶白书画馆举办许达常秦书法展，23日结束。

21日，无锡市公安、文物主管部门对市博物馆进行安全检查专项活动第二轮“回头看”工作。

23日，江阴博物馆馆藏金银器赴盐城博物馆展出，11月12日结束。

26日，江阴博物馆对利港镇兴港路利港教育中心工地古墓葬进行清理，出土陶罐、铜镜等文物，为宋代砖室夫妇合葬墓。

完成对江阴蚕种场辅房屋顶维修。

11月

4日，日本天华二胡艺术学院46名师生专程来澄参观刘氏兄弟故居，缅怀刘天华业绩。

“翰墨飘香书画展”（2011年全国近现代当代名家作品展），14日结束。

大事记



21日，夏港万安桥修缮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文广新局检查市级文保单位学政节署仪门管理使用情况，发现租用商户存在改建门窗、线路隐患、乱设广告牌的现象，联合旅文公司督促其15日内整改。

22日，与南京博物院签订编制《祁头山遗址保护规划方案》合同，正式启动祁头山遗址防护规划编制。

26日，江阴市委宣传部、现代快报、江阴博物馆联合举办“墨彩飞扬——2011—2012首届江苏艺术名家精品全省巡展暨江苏实力书法提名展”。

省文物局、省公安厅批准市博物馆安防设计方案。

12月

7日，江阴博物馆在陶白书画馆举办“当代名家丁仲修书画精品展”。12日结束。

8日，周庄赵宗藻旧居举行修复开放仪式。

11日—12日，江阴博物馆与上海科技馆动物标本养护专家合作，对我馆动物标本进行了

一次全面养护，并将三百件浸渍标本的药液更换为国际上最先进的环保型药水。

13日，华士中医药博物馆举行开馆仪式。

15日，举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论证会，邀请地方文保专家提出修改意见，形成最终稿。

15日，江阴博物馆赴无锡博物院进行近现代文物的定级工作。

14日，江阴博物馆在陶白书画馆举办“张国图国画展”，24日结束。

19日，省政府下发《省政府关于公布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其中我市锡澄运河南北新桥、私立尚仁初级商科职业学校、广济古泉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7日，司令部旧址文保所举行全市乡镇文物保护工作座谈会，市文广新局钱晴副局长出席，各乡镇文化中心主任、文物保护业余监管员参加会议。

28日，无锡市文广新局副局长高燕、无锡文管办主任李鹏程来澄调研。

29日，徐霞客欲在市级文保单位马镇大桥旁建造新桥，市文管办会同专家现场查看并提出意见。

(整理：宋荔、王晓娟)